2023年经济如何回归常态 18
中国式私募监管再探索 26
航运业："空箱"背后的巨变 52
移动通信寻找新大陆 60
类器官会替代动物实验吗? 66
高校再布局 73

财新周刊

Caixin Weekly



重塑金融监管

加强综合监管，注重行为监管，
强化消费者保护和地方金融监管，
努力斩断金融腐败

P.32

改造科技部：瘦身放权"加帽子"

P.44

创设国家数据局：让数据成为生产力

P.47

2023年 第10期 3月13日出版
总第1046期
邮发代号：32－235
ISSN 2096-1251
定价：人民币40元 港币60元 www.caixin.com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最新封面报道｜重塑金融监管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加强综合监管，注重行为监管，强化消费者保护和地方金融监管，努力斩断金融腐败



2023年3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了这个方案。

文丨财新周刊 霍侃 张宇哲 王石玉 全月 王力为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再度面临一次大手术。

2023年3月7日下午，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受国务院委托，根据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就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下称"方案"）向大会作说明。3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方案。

这一轮机构改革，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被置于首位。在具体13项改革内容中，有6项涉及金融监管改革，包括横向优化"一行两会"之间监管职责划分，纵向理顺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体制，以及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监管机构的单位性质从过去"参公"的事业编制转为正式的公务员等。

从方案来看，最大的变化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上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称"国家金监总局"），负责除证券业外的金融业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部分职能划入其中。

中国人民银行也将迎来1998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调整，聚焦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金控集团等机构的日常监管职责剥离，并入国家金监总局；同时，延宕几年的分支机构改革终于落定：撤销大区分行、恢复省级分行，取消县级支行。

中国证监会由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强化资本市场监管职责，划入国家发改委的企业债券发行审核职责，统一负责公司（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

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形成"一委一行两会"的格局，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国务院金融委"）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与主要的宏观审慎监管；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以"谁发照、谁监管"为基本原则实施机构监管。在此模式下，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的职能分散，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各自设立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局。随着十年前影子银行的兴起，资管市场横跨了金融的各个子行业，监管真空随即出现，虽然2018年4月央行领衔两会出台了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初步化解了影子银行的风险，但以机构监管为主的监管架构仍然亟须变革。

中信证券、国泰君安等机构认为，此次金融监管改革，意在厘清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以及包括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内的行为监管的关系，建立职能清晰、分工合作、兼顾安全和效率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从全球来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均由央行负责，但对于微观审慎监管应该如何安排，目前存在多重模式。2023年1月履新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主席的欧达礼（Ashley Alder）对财新表示，目前海外模式中比较合乎监管逻辑的，一是分离行为监管与审慎监管的"双峰"模式；一是中央银行加大一统的综合监管机构，央行仅负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参见本刊2023年第5期《全球金融监管架构"双峰"隐现》）。前者在英国、欧盟乃至美国近年来监管体制的变革中都有所体现；而中国这次的机构改革的逻辑更多体现的是后者，但也适时强化了行为监管，并尊重了公开市场的监管特色，保留了独立的证监会。

此外，本轮改革也致力于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深化地方金融监管改革，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

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同时明确，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局、金融办的牌子。

“无论人民银行自身的机构改革，还是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来压实地方监管主体责任，本质上还是如何厘清中央和地方的金融事权关系的问题。”一位资深监管人士向财新分析说。

另据财新了解，此次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方案的是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在政府机构改革之外，中共中央的机构改革层面就金融业管理还有大动作。

3月8日，央行行长易纲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机构改革方案时表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为化解风险提供有力保障。

一位地方资深金融监管人士表示，有关方案符合目前“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的导向。

这次的机构改革的内容与力度颇有令人意外之处，在方案正式公布之前，即使是监管机构本身对此也知之甚少。

据财新多方了解，此次方案制定主要由深改办和中编办负责，其间虽约谈了不同部门的监管官员，但由于相关议题关系到监管机构及人员的切身利益而严格保密。“以前各部委经常针对一些议题充分讨论，讨论得很细致很深入，但很多问题很难达成一致，一拖再拖，最终往往改革力度小于预期。”一位曾参与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起草的资深监管人士认为，此举是为了改革能够超越部门利益。

据财新了解，在方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第二天，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均冻结了人事关系，等待机构改革的“三定”方案（定机构、定职能、定编制）。目前方案提到的一些内容如何落实也有待观察，比如在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的过程中，是否要将监管机构下属的金融企业从监管机构中全数剥离，涉及金融基础设施怎么办等。

方案公布后，易纲、央行副行长刘国强等人在政协参加了相关讨论，在充分肯定此次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的同时，也提醒要稳妥处置相关问题，并建议合理设置改革过渡期，不宜太长也不宜太短。



2018年3月14日，北京，市民在银监会牌匾前拍照留念。根据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将不再保留。



2023年3月9日，北京，工作人员和市民陆续到银保监会办公楼前拍照留念。时隔五年，位于北京市金融街15号的鑫茂大厦又将迎来换牌。五年前是从银监会、保监会换成银保监会；这次是从银保监会换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一次机构改革解决不了全部问题。从目前看，资管市场的统一监管问题仍未能破题，金融巡视所暴露的金融腐败、监管俘获，甚至上升到形成了金融利益集团的高度，令高层震怒，可能也要从机构改革之外寻找解决方案。

改革永远在路上。在新的监管架构之下，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如何更顺畅地协调监管工作？如何真正提升监管专业性、有效性，切实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好金融消费者权益？如何让金融监管回到"守夜人"的职责上来，让金融有效地服务好实体经济？这些仍是永恒的话题。

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时隔五年，位于北京市金融街15号的鑫茂大厦又将迎来换牌。五年前是从银监会、保监会换成银保监会；这次是从银保监会换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据方案，国家金监总局将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负责除证券业外的金融业监管。肖捷表示，此举是按照党的二十大的明确部署，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统筹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风险管理和防范处置，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可谓是统筹行使微观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职能。

与银保监会相比，国家金监总局增加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

此次调整之前，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分为两部分。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2020年9月答记者问时介绍说，人民银行主要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对金融控股公司开展持续监管；金融管理部门依法按照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对金融控股公司所控股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同时，相关部门之间建立跨部门工作机制，加强监管协作和信息共享。

具体而言，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下设金融控股公司处，牵头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监管，包括基本规则拟订、监测分析、并表监管。

2020年9月，央行发布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下称《金控办法》）规定，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监管，审查批准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换言之，对于金控公司的"准入权"在央行。截至目前，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招商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已先后获得

央行发放的金控牌照。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以及民营集团万向控股有限公司设立金控公司的申请正在受理当中。

此外，2023年2月央行发布的“1号令”《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央行对金控公司的关联交易实施监督管理，但金控公司或附属机构属于上市公司或金融机构的，需相应遵守证监会、银保监会的管理规定。

不过，《金控办法》只适用于非金融机构实控的金控公司，对于银行保险业机构因跨行业控股形成的金融集团，仍由银保监会负责监管。

对于金控公司这类金融混业机构的监管，各国的监管模式不尽相同。例如，遵循“统一监管”原则的新加坡，将金控公司的监管整体纳入负责金融监管、执行中央银行功能的新加坡金融监管局（MAS）。

美国对于金控公司的监管模式与中国类似，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并行。美联储仍然保留对于所有金控公司宏观层面上的监管职责，负责对金控公司法人主体进行监管，并且对金控公司附属的、不受其他联邦或州立监管机构管辖的非银子公司负责。如果金控公司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评级下滑，美联储可对该机构采取矫正性措施，包括中止不达标的金控公司或其附属机构。而美国的金控公司旗下子公司仍沿用分业监管模式，由各监管职责部门负责。与中国略有不同的是，在美国的分业监管模式下，除了按照机构牌照接受监管，也要服从功能监管，即参考金融行为的功能，而非金融机构的性质。

在最新公布的方案中，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划入国家金监总局。接下来将涉及哪些部门职责和人员的调整，还待方案落地过程中进一步细化。

对于这一调整，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分析称，金控集团其实主要来自银行保险系，而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中央级金控集团，原本也不在人民银行的管辖范围内。所以，这一调整的实质性影响有限。

此外，方案还提到加强国家金监总局的风险管理和防范处置，这一职能是否涉及专门的部门设置，与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定、存款保险制度等职能如何分工协调，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密切关联，人民银行相应的监管权未来如何实现，与监管部门的信息如何有效共享，均有待厘清。

统一金融消费者保护

成立国家金监总局的另一大亮点，是统一了此前分散在“一行两会”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以加强行为监管。

在金融市场中，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是重要的参与者。随着近年来相关纠纷增多，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成为行为监管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但长期以来，国内缺少一部适用于全市场各类产品、市场参与者的“金融消保法”，也没有一个独立的监管主体来统一负责金融市场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工作与规范。这次改革正是为补足这一缺陷。

2012年前后，央行、原银监会和保监会的消保部门，以及证监会的投保部门陆续成立，在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各自行使所监管机构的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职责。

央行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成立于2012年，负责包括假币、残损币等人民币业务，银行卡等支付结算业务、国债业务、外汇业务、个人账户及个人征信等方面的争议。不过，自从央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成立以来，监管对象几经变化。



2013年央行印发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所管理的金融机构的范围，包括了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期货业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等，体现了综合监管的思路。但在2016年央行印发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中，范围变更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和"提供跨市场、跨行业交叉性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其他金融机构以及非银行支付机构"。在2020年的修订后，《实施办法》的适用对象又变更为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非银行支付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分业"特征更加明显。

此外，央行还牵头建立了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一同参加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调工作机制。

银保监会也设有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在2018年"两会"合并之前，原银监会、原保监会各自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成立。

证券投资者保护的建立路径和作用机制则有所不同，显示了在风险推动下法制先行的鲜明特色，成效显著。

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证券市场，1992年提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但未有制度性安排；2001年因银广夏造假案被揭露，开启证券市场投资者走法律途径立案索赔之路；2005年，为应对多家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引发的风险，由中央财政一次性拨款63亿元设立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但对于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案件，投资者的损失仍难以得到救济。

2012年初，证监会的投资者保护局（下称“投保局”）正式挂牌。2014年，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投服中心”）成立，持有所有上市公司100股左右的股份，开启了投服中心代表中小投资者向有证券欺诈等违法行为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人员的索赔之路。2020年，最高法院、证监会分别发布《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做好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相关工作的通知》，标志着证券纠纷集体诉讼制度在中国真正落地，迈出了依法保护投资者的重要一步。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案成为首例案件，5.2万名投资者获赔24.59亿元。

2020年，新《证券法》施行，设立“投资者保护”专章，将原来60万元的顶格处罚提至1000万元；并专门增设发行人控股股东、实控人、中介机构先行赔付条款。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再获通过，大幅提高证券犯罪的法定量刑幅度。

近几年，学界与业界一直不乏设立统一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的呼声。中央财经大学科技金融与金融消费者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孟祥轶认为，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产品越来越多，“目前‘一行两会’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各自作战，可能碰到了一些问题和障碍，需要成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机构”。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证券投资者保护的逻辑与其他金融消费者保护有所不同。经过30年的发展，证券投资者保护已经从最初的投资者教育发展转化为事前保护、依法追索，占据市场80%开户数的散户投资者遇到任何欺诈行为，均可以通过司法起诉形式索赔。这与当前不断出现风险的资产管理、中小银行案件的处置路径是很不同的。

一位接近央行消保局人士说，关于如何合并，目前也是“静等消息”。一位接近中国互金协会人士表示，后续互金协会消保工作汇报路线是否有变化，还得等政策进一步明晰。

对于新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的权责，一位接近央行人士指出，不能简简单单把现在的这三个消保局合并，得真正搞一个行为监管局，除了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行为监管还应该覆盖金融机构之间批发市场的交易行为，包括同业市场、黄金市场、大宗商品等交易中的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利益输送等不当行为。“这个机构得长牙齿，得有检查处罚权”。

一位资深金融监管人士认为，此前“一行两会”消保部门的一大问题是，“只盯着持牌机构，做了很多重复劳动”；但对于各种类金融产品、非法金融活动相关的消费者保护问题，则是空白地带，没有人愿意“惹麻烦”。未来的金融消保局能否在这方面有所担当与建树，还需拭目以待。

借鉴证券投资者保护的经验，在优化监管机构的基础上，应该夯实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基础。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加快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央行沈阳分行行长付喜国建议，应总结提炼银行、保险、证券等各领域金融消费者享有的合法权益，将金融消费者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等基本权利提升到基本法律高度加以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次机构改革统一了金融消费者保护，但资管市场的统一监管机制尚未有新的推进。有市场资深人士据此认为，这次机构改革走出了重要一步，但仍然还在路上。

央行机构大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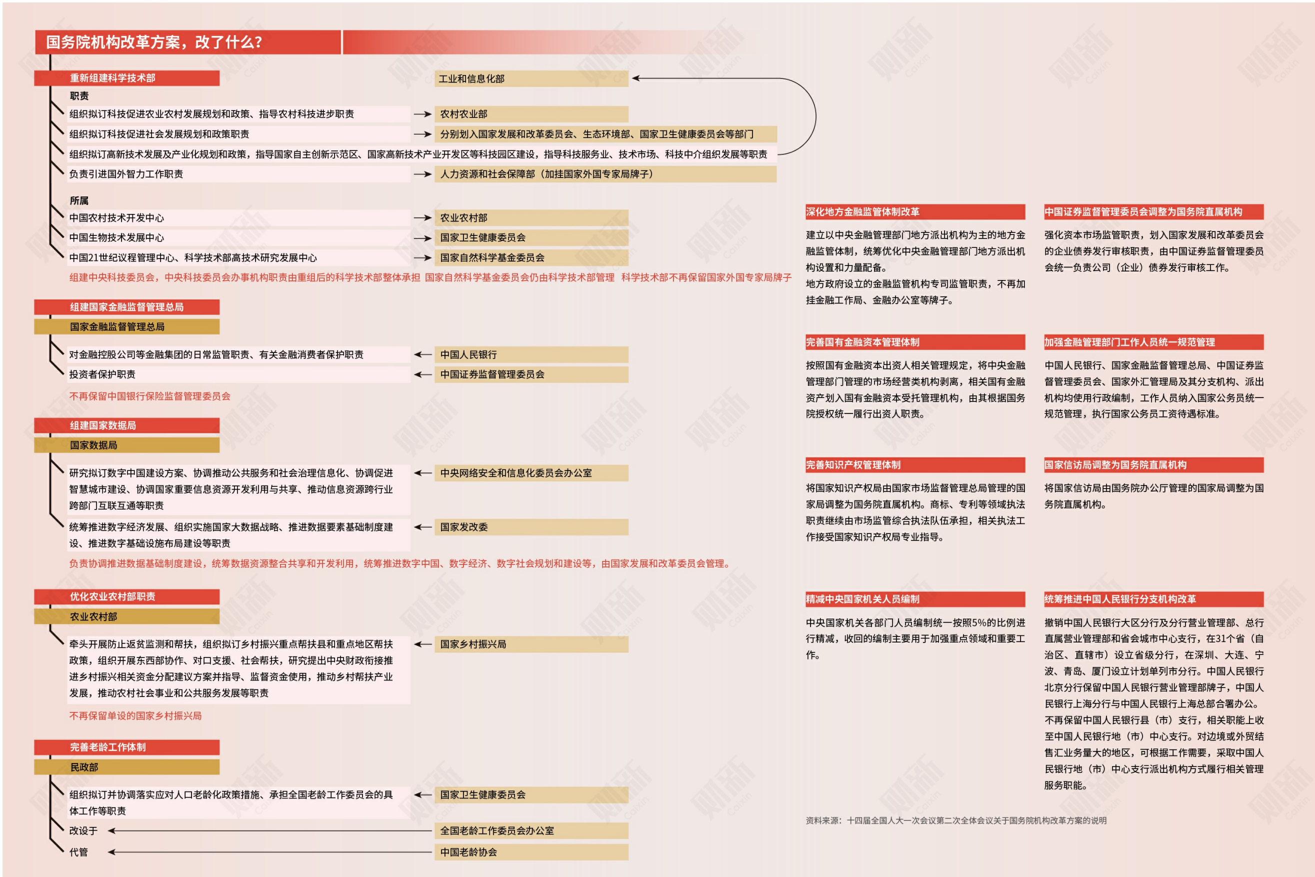
“一行两会”中的人民银行，也将迎来大调整。

在总行层面，划出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以及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在分支机构层面，延宕几年的机构改革方案终于落地。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几年中，在各国金融监管改革中，厘清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边界与监管职责划分，都是关键。

“微观审慎监管是金融安全网的第一道防线。”2021年7月，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指出，微观审慎监管是监管部门为防范个体金融风险，制定市场准入、资本/净资本、偿付能力、流动性、资产质量、关联交易等审慎监管要求，定期组织现场检查，监测、评估风险，及时进行风险预警、处置。

从其他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探索看，根据各国国情，微观审慎监管可以放在央行，也可以放在综合监管机构。从目前的方案看，本轮改革倾向于让中国人民银行聚焦于“双支柱”管理，即货币政策制定、执行与宏观审慎管理。



在分支机构层面，讨论已久的人民银行下属分支机构改革继续推进。财新获悉，2023年1月召开的人行年度工作会议上已经传达，央行内部的机构改革方案待高层批复后将正式启动，“大的原则与方向已基本达成共识”。在这次会议上，易纲表示，人民银行将继续配合中编办等部门稳妥推进分支机构改革工作，不断提升机构编制配置效率和履职效率。

方案指出，撤销大区分行及分行营业管理部、总行直属营业管理部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级分行，在深圳、大连、宁波、青岛、厦门设立计划单列市分行；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保留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牌子，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合署办公。

这意味着，人民银行将恢复省分行制度，目前在省会城市设立的中心支行将翻牌成为省分行。

在1998年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中，借鉴国际经验，人民银行撤销了32个省级分行，改为设立9个跨省分行——上海、天津、南京、沈阳、广州、济南、武汉、西安、成都9家大区行，北京、重庆被列入总行营业管理部管理，即“9+2”模式；然后设立20家省会城市中心支行、5家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和316家地（市）中心支行。

但由于大区行制不太符合中国的行政管理国情，管理体制存在不顺畅，争议从未停止。恢复省分行管理体制的呼声，自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时就不断出现。

2012年，时任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计承江在接受《当代金融家》杂志采访时指出：“现在的央行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形势，撤销大区分行、恢复省分行体制迫在眉睫。比如，现有的大区分行管理2—5个省，管理地域过大，链条过长，成本较高，难以到位，管理的金融业务不得不授权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开展。”

而尴尬的是，在现行官僚体系下，部分省会中心支行的行政级别因为比省内部门要低半格，一些重要文件都看不到。近年交叉金融领域风险轮流爆发、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形势越发复杂，如何有效发挥央行在地方金融稳定中的作用，越发重要。

2016年4月，央行官网公布的中央巡视组对人行党委巡视情况的通报中提到，“结合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推动恢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分省管理体制”。

2018年初的央行工作会议重申，推进人民银行机构按省分设。彼时，财新曾获悉，央行在2018年上报的内部机构改革方案中就包括撤销人民银行大区行，恢复省分行管理体制，即在省会城市设立的中心支行翻牌成为省分行，

人员编制不改变，不新设机构，但一些原来副厅级的中心支行恢复大区行之前的正厅级省分行。

在这一背景下，据财新了解，经过央行和中编办几轮讨论，2020年上半年中编办批准央行逐步恢复省分行制，设置三年过渡期，即到2023年结束；当时中编办下发的“三定”方案中，明确授权人民银行省会中支履行全省党务、纪检、人事、内审等工作职责，省会中支相关工作直接对总行负责。这一职责从2020年7月正式实施。

这次剥离央行县支行，也在预期之中。一位人民银行县支行人士告诉财新，2021年国务院相关调研组曾组织课题调研，了解全辖人力资源总量与地市、县级支行人员分布情况，以及基层机构履职资源保障情况；并提出“以人民银行县级支行为载体，整合改造为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派驻地方综合管理机构是否可行？”等问题。

在这次剥离央行县支行之后，央行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在县一级也没了“腿”，是否会影响央行在基层的一些业务和功能？据财新了解，涉及原县支行负责的国库代理、支付、征信三项基层业务，将上收到地（市）中心支行。“可以依托电子化系统，现在金融业务的线上化能力进步很大。以支付业务为例，近年整体现金需求都是下降的，没有必要在全国2000多个县都保留人民银行金库。”有地方金融监管人士分析说。

方案同时提及，对边境或外贸结售汇业务量大的地区，可根据工作需要，采取中国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派出机构方式履行相关管理服务职能。一位地方人行人士举例称，比如满洲里就是外贸结售汇业务量大的边境城市，但它只是个县，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中心支行可以向满洲里派出机构办理业务。

加强中央对金融的统一领导

目前发布的方案未提及2017年成立的国务院金融委，但统筹和协调机制仍然是金融监管架构中的关键环节。据财新多方面了解，中央层面或将成立新机构，加强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

纵观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几次变革，均与当时中国金融市场面临的变化与挑战有关。

1997年夏，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四个月后，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决定设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下称“金融工委”），以人事上的推荐与考核为支点管理“一行两会”及重点金融机构。除了负责政府金融机构，如人民银行、保监会和证监会的人事及监察等工作，金融工委还决定当时30家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人事权，以商业银行为主。

在中国加入WTO、金融改革启动的大背景下，2002年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宣布了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蓝图，金融工委被撤销，央行分离出监管职能，银监会成立。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金融行业在走上现代化转型的高速路的同时，“影子银行”等问题迅速蔓延，原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在一些领域，监管分割的情况比较严重。存在监管空白和盲区，更容易出现在监管交叉地带。”2018年3月就任原银监会主席的郭树清，在新闻发布会上形容这是“牛栏里关猫”。

在2017年国务院金融委成立后的一次答记者问中，时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陆磊介绍了这一机构的创设背景：“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正在积累，金融市场上也乱象丛生，套利投机泛滥，利益输送严重，大案要案不断滋生。而金融监管不协调、监管缺失、执法不严等问题不断暴露，不适应跨行业、跨市场金融产品创新发展。”

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金融委的主要职责包括落实中央金融工作部署、统筹协调金融监管与相关政策、研究金融政策，以及业务监督与问责。

国务院金融委集中了金融界最重要的决策机构，覆盖了七家协作单位，除了金融部委的主要成员，还包括中央纪委、中组部、公安部等，主要是为了加强问责，同时也为有效打击威胁金融稳定的金融犯罪行为。

国务院金融委采取“一正两副”的领导架构。2018年7月起，国务院金融委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担任；金融委副主任之一由央行行长易纲担任，他还同时兼任设立在央行的金融委办公室主任；另一位金融委副主任为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丁学东。此外，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维良、财政副部长刘伟等人也是委员。



2021年11月20日，北京，中国人民银行办公楼大堂。

2019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央行“三定”方案提出新设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专职负责处理金融委办公室日常事务。

国务院金融委定期召开全体会议、不定期召开有针对性的专题会议，统筹研究协调金融领域重要事项。据财新了解，成立五年多来，国务院金融委已经召开了百余次会议，其中50余次会议对外发布了公告。

近几年，国务院金融委在网络借贷行业风险专项整治、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互联网平台整改等金融风险治理方面，均作出了重要的指导和决策；在2020年11月永煤债券违约、2022年3月股市震荡、2022年11月金融支持稳地产等关键时刻，也可谓曾力挽狂澜。据一位人民银行华东地区分行处长介绍，最近在化解房企风险方面，国务院金融委要求组建中高风险房企领导小组。

2022年12月，《金融稳定法》草案审议稿（下称“审议稿”）交由人大审议，进一步明确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统筹协调机制（下称“统筹协调机制”）的职能，分为金融风险处置与问责两大部分。

在风险处置方面，对于金融风险外溢性强、涉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严重危及金融稳定的，统筹协调机制应议定处置方案；同时，负责管理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作为“应对重大金融风险的后备资金”。

在风险问责方面，统筹协调机制对重大金融风险形成、扩大、蔓延或处置不当负有直接责任的地方、部门以及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采取约谈、内部通报、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等措施。

多位金融监管人士指出，此次改革如果在中央层面成立金融委，首先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需要充实人手。据财新了解，目前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的正式编制只有十几个人，加上借调人员，日常工作人员30多人，规模远小于央行主要业务部门。

在地方层面，2020年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印发《关于建立地方协调机制的意见》，要求在各省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加强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作。目前，该机制由地方人民银行分行行长牵头作为召集人，监管部门派出机构与地方相关人士协调合作。

在近几年的地方金融风险防范中，金融委地方协调机制如何发挥作用？一位地方资深金融监管人士向财新表示，“国务院金融委只管到省级层面，再下沉到地方，缺乏明确机制，有局限性”。

即使在省级层面也作用有限。前述资深金融监管人士表示，金融委的地方协调机制一般被称作“协调机制一”；其实地方政府还有自己的协调机制，叫作“协调机制二”，“一般由地方金融局牵头，甚至得副省长挂名”。

“每个季度地方监管部门会碰头开会，但没啥用。”有地方金融监管人士表示，设立在各地人行的金融委协调机制很难开展工作，“协调机制在地方没什么存在感。地方人行领导和其他部门都是平级的，谁听谁的？除非由副省长牵头。”

除了行政级别等官僚体系因素掣肘，这也反映出地方监管目标与中央监管目标往往难以聚焦一处。2022年初，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撰文指出：“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是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一些地方更多聚焦于促进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主要开展引进金融机构，为地方企业获得信贷、债券发行和股票上市资源等工作。”

强化地方金融监管

在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面，方案提出，为针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存在的监管手段缺乏、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强化金融管理中央事权，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压实地方金融监管主体责任。

在目前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分支机构+地方金融监管局的格局中，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设立了省级、地市和县级三级分支机构。证监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36个证券监管局，以及上海、深圳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

自2018年开始，为落实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压实地方监管责任”，全国各省级金融工作办、金融工作局、金融服务局等机构陆续加挂“金融监督管理局”的牌子，对“7+4”类地方金融机构负有监督管理和风险处置职责，承担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属地责任，与当时的“一行三局”（地方人民银行、银监局、保监局、证监局）形成错位监管和相互补充（参见本刊2018年第4期《地方金融监管鸿沟》）。

但近几年，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层面，仍有不少责权利的问题亟待厘清。“地方金融监管权限存在模糊地带，一些实质上的金融活动游离在监管之外。”前述资深金融监管人士说。由于近年来P2P、金交所、村镇银行、非法集资、房地产金融等问题接二连三地爆发，地方政府前些年对此类现象的纵容迅速演变为巨大的监管压力与责任，缺乏金融监管专业人才和有效监管思路、地方财力无力化解相关风险等缺陷也显露无遗。

早在2018年，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殷勇就表示，当前地方金融监管面临几点突出问题之一是：中央金融监管派出机构难以承担更多实际责任，难以深度参与地方金融监管活动，难以深入掌握地方金融活动信息，对地方金融监管活动难以帮上忙，也难以开展有效的指导和监督。“这种状况造成监管派出机构在地方金融监管中处于‘悬空’状态。”同时，地方金融监管力量亟须充实。

殷勇建议，可以考虑让直接从事监管的派出机构进一步下沉落地，直接参与到地方金融监管的日常活动，作为地方金融监管的有效组成部分开展履职，“这有利于增加一线监管力量的配置，增强一线监管的统筹能力”。

此次方案提出，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但如何充实地方尤其是县级监管力量，是金融市场和监管部门内部都很关注的动向。

2018年，时任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行长单强曾在央行旗下杂志《中国金融》发表有关地方金融监管机制改革路径的文章称，针对中国县域监管力量相对薄弱、潜藏风险的情况，建议在县域率先试行金融综合监管体制，将人民银行县级派出机构和县级银监办合并，成立金融综合监管试点机构，对银、证、保各金融行业进行统一监管，在体制上消除中央事权在部分领域的监管盲区。

据财新了解，央行县支行合并到银保监会县级监管办，是近年央行、银保监会多次讨论的方案。中编办此前亦多次在基层人行调研。随着新一轮机构改革启动，这一久拖未决的方案有望在2023年落地。人民银行县支行的4万多人将合并至国家金监总局的派出机构，或可弥补长期以来地方监管人力资源缺乏的短板。

多位地方人行人士告诉财新，目前公布的方案与此前改革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之前拿不准的是地市中心支行是否也合并到银保监会，目前看地市中支仍保留在人民银行，说明这是一个调整动作相对小的方案。”

此外，根据方案，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以后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这意味着其功能将有所变化，将聚焦监管职责。此前的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既要承担地方金融发展、招商引资，又要承担监管职能，利益冲突长期存在，监管专业性也无法提升。“下一步大概率会剥离地方金融局的服务职能，主要聚焦防风险。”一位接近北京金融局人士分析称。

监管俘获如何破

这次机构改革把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放在了首位；二十大中央委员构成中，来自金融背景的寥寥无几；机构改革后，金融监管部门正式进入公务员体系，员工薪酬面临大幅度下降??这些不同寻常的动向背后，究竟有何深层

次原因，应如何解读？据财新多方了解，这是因为经过几次金融巡视和一些重点案件的调查之后，最高当局极不满意金融腐败屡禁不止，认为金融监管不力，甚至有形成金融利益集团之危。

金融行业天生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和很强的外部性，因此监管的角色尤为重要。优秀的监管者是金融市场的"守夜人"，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防线。但是多年以来，监管俘获、监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令人痛心。

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层面，近年来落马的部级官员已非个例，如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原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证监会原主席助理张育军、原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等。部门主任、省级监管负责人层面落马的更是数不胜数。包商银行案、河南村镇银行案背后暴露的地方金融监管塌方式腐败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内蒙古银保监局局级领导和相关处室可能除了个别人几乎全线被包商银行攻陷；几家河南村镇银行被实控人在当地外挂账外系统公然违规违法经营多年，当地的监管部门却一度成了"又聋又瞎"的摆设，案发后有多人被查，腐败情节不亚于原内蒙古银保监局。

2018年爆出的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案，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金融腐败案，赖小民被执行了死刑，暴露了监管部门和下辖主管机构之间的任意旋转门、监管包庇等问题，至今都未得到彻底解决。

这些案件被彻查，显示了中央斩断金融腐败的决心。但除了加大金融巡视力度、加大纪委监委的监督，加大查处腐败的威慑力，究竟在制度建设上如何建树，才能真正抵御金融腐败？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J.Stigler）1971年提出的理论，监管机构成立之初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但在与监管对象的长期互动中，逐渐被监管对象通过各种手段"俘获"，沦为特定行业甚至特定机构谋求利益的工具。

过去认为，解决监管俘获问题，仅靠个人自律是不够的，在强化问责、惩戒和法律约束的同时，还需要以适宜的薪酬待遇和职业荣誉提供正向激励，比如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高薪养廉就取得了良好效果，基本杜绝了监管腐败。但为什么类"高薪养廉"政策在中国却没有收效？

从金融监管机关的薪酬与福利制度来看，其经济待遇要比公务员队伍高1到2倍，也享受到公务员体系的福利分房、经济适用房、团购房等政策，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原本已足够维持体面。只是在某些人看来，监管者的收入仍无法和金融机构的平均收入持平，更无法和金融机构高管的高薪相比。一方面，金融业公开的收入水平和实体经济差距越拉越大，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少数腐败分子欲壑难填，动辄千万元，上亿元亦稀松平常，造成行业风气愈加败坏，也是客观现象。

从纪检监察部门在对落马金融监管干部的通报看，共性问题包括"靠监管吃监管"，甘于被"围猎"，将手中的监管权力与资本勾连、与利益交换，甘为不法企业"马前卒"，充当银行机构、银行高管人员与不法私营企业主违法违规行为的"保护伞"，逐渐放弃监管职责，与金融"蠹虫"沆瀣一气、导致监管严重失守，最终造成此起彼伏的金融风险。

2023年2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三审查调查室公开发表的文章，对金融反腐的措辞前所未有地严厉，提出加大对"政商旋转门""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查处力度，严肃查处弃守监管职责、由金融秩序维护者沦为金融风险制造者等问题。

正在制定中的《金融稳定法》草案审议稿，从立法层面要求防范、化解和处置金融风险应当与惩治金融腐败协同推进。"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与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司法机关在信息通报、线索移送、案件查办等方面的协作配合"。

需要注意的是，监管腐败、监管俘获的根源，在于监管部门拥有过大的行政权力：早年是重发展轻监管、重审批轻服务，近年来则是越来越细的行政管理之手伸向了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和被监管者之间缺乏必要的疏离。

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在2017年撰文指出，监管与主管职责不拆分是造成监管俘获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金融监管部门同时肩负着促进本行业发展的任务，很容易在追求行业发展时忽略行业规范，不知不觉地从监管部门变成了主管部门，最终被被监管者所'俘获'，成为被监管主体的利益代言人。"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也曾撰文指出，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一直以来"重审批、轻监管"，导致监管部门审批权力过大，造成巨大的"寻租"空间。

一位接近证券监管人士指出，根据中国的法律体系，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需要监管者进行解释，市场参与者为了摸清底线拿到牌照，就需要跟监管部门套近乎，这种行为本身就容易滋生腐败。

典型案例莫过于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案，他在位时曾经为了某些保险公司提出的"金融创新"出台政策（参见本刊2017年第39期封面报道《俘获项俊波》）。

"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在最可能的金融效率边界与最可能的金融安全边界，寻找最佳结合点。回顾整个金融历史，监管本身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但是，金融监管鼓励金融创新，应当最大化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构筑金融安全的屏障，最小化金融的运行成本、内在损失和外因风险。"时任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在2022年财新峰会上曾这样说。

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风险不断暴露，监管部门的政策目标不断收紧，从各方面加强管理，细化规则。“管得太多，管得太细，就增加了无数的权力，又增加了新的设租、寻租空间。”接近监管的人士称。

“目前的问题是监管部门手中权力过大。往往一个处长甚至科员就可以决定一家企业能否上市、能否融资、能否发产品，权力空间过大。”一位接近监管部门人士说，“如果不从制度层面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真正杜绝腐败。”

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以注册制为核心的监管制度改革，强调机构的信义义务，市场参与者需要主动承担审慎义务和忠诚义务，不需要监管部门的过多行政干预，其责任就是监督各方是否尽责，查处各种不尽责违法违规行为，“让监管者远离审批权，主要聚焦于防范风险，以实现中央的宏观调控、金融政策等意图，并且应该高度透明化，接受来自法律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

刘冉、夏怡宁对此文亦有贡献

相关报道：《封面报道之二丨改造科技部：瘦身放权“加帽子”》、《封面报道之三丨创设国家数据局：让数据成为生产力》

版面编辑：刘潇

最新封面报道之二丨改造科技部：瘦身放权“加帽子”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把更多精力从分钱、分物、定项目转到定战略、定方针、定政策和创造环境、搞好服务上来



2023年3月8日，北京，市民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天宫空间站”和“天和核心舱”模型。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家对科技事业越来越高的关注，国家投入的科技经费持续上升。

封面报道之一丨重塑金融监管

封面报道之三丨创设国家数据局：让数据成为生产力

文丨财新周刊 黄晏浩

时隔五年，科技部再次迎来重组。与2018年加挂国家外国专家局牌子、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相比，本轮国务院机构改革，科技部瘦身放权“加帽子”：不再保留国家外国专家局，不再参与具体科研项目评审管理，部分职能和部分直属事业单位一并划出；新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加强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其办事机构职责由科技部整体承担。

同在这五年里，国际形势变幻，“卡脖子”技术横亘，国家对科技发展、创新、独立的需求愈发迫切，中共二十大报告要求“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科技强国”。科技部这次重组，明显寄托了更上层达此目标的期待。

“一是科技创新的作用越来越强，国家投入的资源也更多，社会的期望和要求也更高；二是近年来科技前沿的突破和新兴产业革命，对原有的科研范式和科技管理模式也提出了挑战；三是中国科技领域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向财新表示，“社会的期望很高，前沿不确定性很高，外部压力很高，科技管理部门面临的挑战很大。此次调整就是希望通过改革来应对这些挑战。”

水涨船高

多年来，科技部既制定科技政策、负责宏观规划，又管理着大量的科技经费，在或大或小的科研项目中掌握生杀大权。早在2004年，饶毅、鲁白、邹承鲁三名学者就曾在《自然》杂志的“中国之声”增刊上发表文章，对中国科技体制提出意见，建议科技部改为总理科技办公室，主管科技政策和总体协调，具体经费管理交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其他专业部委。当时，饶毅和鲁白的身份分别是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两人先后全职回国，饶毅如今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鲁白为清华大学药学院教授。而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已在2006年去世。

饶毅等人的文章，还专门提到科技管理人员在经费分配上权力过大的问题，“科技部的司局长、处长，甚至一般处员对科技经费分配都有相当大的权力”。

此后十几年间，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和国家对科技事业越来越高的关注，科技部掌管的经费数额继续稳步上升。据大连理工大学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22）》（下称《报告》），科技部的研发经费从2010年的不到200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452.78亿元，稳居40个中央政府研发经费管理部门第一；科技部管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研发经费在2020年为315.93亿元，排名第二，两者合计占比超过40个部门的50%。

最主要的原因是总量的变化。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已经突破3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中国政府研发经费支出稳

步增长，从2010年的1696.3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4825.56亿元，年平均增长率13.96%。科技部作为中央主管科技的部门，经费也水涨船高。

另一个原因是2014年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2014年12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将当时近百个"九龙治水"、叠床架屋的项目资金渠道，整并为五大类别的科技项目（专项、基金等），分别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报告》显示，从2016年开始，科技部的"重大专项"经费上升较快，占到科技部经费的主要增量。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涛是《报告》撰写团队的负责人，他向财新解释称，科技部研发经费在类别上的变化主要和2014年改革有关，"2014年改革之后，国家就加大了重大专项的经费，其中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也是放在'重大专项'条目下面的"。

放权与分权

本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科技部"瘦身放权"，其项目和经费管理职权自然也在其中。

根据3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科技部的多项职能被划出：组织拟订科技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和政策、指导农村科技进步职责划入农业农村部；组织拟订科技促进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职责分别划入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国家卫健委；组织拟订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规划和政策，指导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科技园区建设，指导科技服务业、技术市场、科技中介组织发展等职责划入工信部。

此外，2018年机构改革中整合进科技部的国家外国专家局被划入人社部，科技部不再保留国家外国专家局牌子。同时，科技部原本负责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职责也被划入人社部。

更令人注目的是，科技部不再参与具体科研项目的评审管理。3月7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就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向大会作说明时表示，重组后的科技部不再参与具体科研项目评审和管理，主要负责指导监督科研管理专业机构的运行管理，加强对科研项目实施情况的督促检查和科研成果的评估问效。科技部原本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协调管理、科研项目资金协调评估等职责得到调整。

2014年改革中，包括科技部在内的政府各部门从"抓具体科研任务"中退场，逐渐将项目的日常管理、资金运用、成果评审、结题验收等具体任务，委托由专业机构执行，并由各个专业机构对实现任务目标负责。时任科技部部长万钢在2015年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表示："科技项目的具体管理，由专业机构负责，政府各部门不再直接介入项目具体管理。"

那次改革诞生的首批七家专业机构中，有四家是直属于科技部的事业单位，分别是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这些事业单位，主要就是管科技项目的。"孙玉涛表示，而科技部此次不再参与具体项目的评审管理，也导致这四家事业单位被分离到其他部委。方案显示，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划入农业农村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划入国家卫健委，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划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长期关注中国科技体制，他告诉财新，上述科技部的改革措施有三个亮点：第一是科技部功能的重新定位，尽量让它回到政策制定者、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减少游戏参与者的成分；第二是资源的重新配置，科技部分出了一些资源给其他更专业的部委；第三是经费的变化。"科技部以前拥有的庞大经费会缩小。"他说，"这也是契合了科技部重新定位的考虑，你不要再去管里头的小事、小钱了。"

多名专家向财新表示，由农业农村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来负责相关行业，会更加专业一些。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就认为，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被划入国家卫健委，可能是觉得卫健委在生命医学方面的业务更熟悉、专业性更强，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评项目上"有经验，口碑也比较好"。

采访中也能听到担忧的声音：农业农村部、工信部等原本就有自己的科研机构，对于科技部剥离的项目，它们在分配上能否做到公平有效？"随着机构的转移，钱和职能跑到新的部门，是否就比科技部更有效率？这个事情还需要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李侠说。

李侠更大的顾虑，还是担心改革的力度不及预期。他向财新表示，重大专项仍留在科技部，科技部的经费还有几百亿元的盘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明确继续由科技部管理，其研发经费也有300多亿元，"最多的一份钱它仍然没有放出去"。

孙玉涛提醒说，科技部不负责具体项目的评审和管理，科技经费预算是否会发生变化，还要看机构改革的具体方案。

未来的科技部

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表示，“要加快科技管理职能转变，把更多精力从分钱、分物、定项目转到定战略、定方针、定政策和创造环境、搞好服务上来”。

根据方案，重组科技部之后，加强科技部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等职能，强化战略规划、体制改革、资源统筹、综合协调、政策法规、督促检查等宏观管理职责，保留国家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国家实验室建设、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学研结合、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科技监督评价体系建设、科研诚信建设、国际科技合作、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国家科技评奖等相关职责，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重大专项还留在科技部，预示着一种“抓大放小”。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来自《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延续了“两弹一星”这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研取向，当年安排了包括大型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16项重大专项。

薛澜认为，对于这样重大的项目，科技部有专门的机构在集中资源和力量，统筹协调管理。多年来也积累了很多经验，短期内很难有其他政府部门或管理机构能够替代；另一方面，科技部下的各类项目大大小小有很多，所以把一些面向部门的科研项目交出去也是好事，可以集中精力管好重大专项等无法交出去的任务。

瘦身放权之外，科技部最大的变动还是来自顶层。肖捷表示，本次机构改革，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组建中央科技委，中央科技委办事机构职责由重组后的科技部整体承担。

中共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作为一个单独部分，其中即提到“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二十大后撰写文章《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落实各项战略部署的第一条就是“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其中写道，“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建立权威的决策指挥体系”。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统筹协调不够，比如说‘九龙治水’的问题。”孙玉涛说，包括2014年改革和2018年科技部重组，虽然都有一些调整，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设在科技部，但科技部毕竟是一个部委，面对其他同级部委协调能力有限，“改革之后就不一样，虽然中央科技委的功能放在了科技部，但它是一个中央层面的部门”。

2014年改革中，国务院建立了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科技部牵头。2018年，国务院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调整为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李克强任组长，刘鹤任副组长，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科技部，王志刚任主任。

李侠对中央科技委期待颇高。他解释说，原先的国家科技领导小组配置虽高，但不是常设机构；而中央科技委是中央直接领导的委员会，“以前都是几部委联合出台科技政策，以后可能就以中央科技委的名义，不是跟你商量，而是让你执行了”。薛澜也认为，科技部将成为中央科技委的执行机构。

孙玉涛更关注科技预算的情况。他表示，过去各个部门的科技预算，是和财政部沟通，所谓“三上三下”，缺少更高层面上的机构去统筹，比如说今年和科技有关的预算一共多少钱，各个部门、各个板块应该是多少，这个统筹协调的职能，未来可能会在中央科技委。□

相关报道：《封面报道丨重塑金融监管》、《封面报道之三丨创设国家数据局：让数据成为生产力》

版面编辑：刘潇

最新封面报道之三丨创设国家数据局：让数据成为生产力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数据监管与发展的行政管理职能分离，国家数据局承担数据管理、开发和利用之责，数据要素市场有望开放发展



2022年9月15日，安徽省阜阳市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支队的工作人员在劳动监察指挥中心进行网络监控和数据分析。图：视觉中国

封面报道之一丨重塑金融监管

封面报道之二丨改造科技部： 瘦身放权"加帽子"

文丨财新周刊 钱童

"在保持数据安全、行业数据监管、信息化发展、数字政府建设等现行工作格局总体稳定前提下，把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方面的有关职责相对集中。"3月7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就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作出说明。

为何要在国务院层面成立一个专门的数据行政管理机构？肖捷解释称："当今社会，数字资源、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意义重大，必须加强对数据的管理、开发、利用。"

国家数据局承担三项主要职责：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管理。

据财新了解，国家数据局的人员和职能主要整合自两个部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下称"中央网信办"）原下属的信息化发展局和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根据中央网信办官微，"数字中国""'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数字政府治理""网络扶贫"的相关内容主要由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负责；而发改委高技术司的一项重要职能则是统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组织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衔接平衡信息化发展规划与国家发展规划。

目前，对数字经济、大数据产业的规模有不同统计口径，整体呈现快速向上的趋势，且规模和占经济贡献比重增加。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截至2022年，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7%以上。另据工信部统计测算，从2012年至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过45万亿元，占GDP比重由21.60%提升至39.80%，年均增速高达15.90%。

无论是从量级还是地位，都已需要对数据进行更专业的管理。肖捷称，数字资源、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意义重大，因而必须加强对数据的管理、开发、利用。

"数据局像能源局一样归由国家发改委管理，可以看出数据资源已经和能源等一样，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要素。"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对财新解读称。他认为，这是给市场一个积极信号，对数据的监管思路将从立法规范进展到出政策、促发展的阶段："对数据要素的产业流通来说，这是重大利好。"

一名数据行业资深从业者将过去数据的治理体系形容为"三横一竖"：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分列"三横"，负责产业政策；再由央行这"一竖"从金融牌照角度从上到下贯通监管。此次机构改革建立国家数据局，则是将数据"发展"的职责统归国家发改委，而将"监管"的职责留在中央网信办。

"数据行业终于盼来了在制度和政策上牵头管理的部门，让市场看到国家要真正推进数据要素化发展。"上述人

士称。

“数据是新的生产力，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组织、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它需要有配套的生产关系，而新的生产关系必然带来制度的变革。为了提振中国经济，把数据作为未来的竞争力，因此成立国家数据局。”华东政法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富平认为，国家数据局的定位是以数据的管理开发应用为基础的，主要是发展。

财新从多名受访者处了解到，早在两年前，国家发改委就有成立“国家数据管理总局”的想法，多地政府业已先行尝试数据管理。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北京、上海、广州、贵阳、福州等主要城市，目前全国有“大数据局”“大数据管理中心”“数据管理局”等18个省级大数据管理部门，散落在地方发改、网信、工信部门或省委直属，此外还有更多的市级数据管理机构。国家数据局成立之后，这些地方管理部门如何归口管理，是市场目前关注的问题之一。

多名人士向财新提到，作为中央级数字管理部门的国家数据局，最终公布的名称中去掉了“管理”二字，他们认为此举颇有深意。高富平指出，这凸显了数据的资源特征，突出国家数据局是一个促进数据应用的部门。此前数据安全和数字中国两部分职能都放在主管网络信息安全的中央网信办，造成监管和发展“左右手互搏”，网信办很难平衡；现在把发展职责分离出来，意味着国家在协同布局安全和发展，“两手都要抓”。

“尽管《数据安全法》确定了数据安全和数据利用的双目标，但此前更加侧重监管，比较偏向数据安全，数据利用的制度建设还需要进一步落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也指出，“随着数字要素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的逐步落地，数据利用未来会成为与数据安全并行，且越来越重要的内容；行政管理职能分离可以有效校正此前数据安全和利用的失衡局面。”

在“管理”一侧，2021年，中央网信办成立了“网络数据管理局”，在原有“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两大职能之外，主管网络数据。网络数据管理局自成立以来动作频频，数据跨境申报审批以及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监管等，均由该局负责。

此外，国家数据局成立后，行业化管理的思路不变，比如金融数据由央行管理，电子政务、跨行业跨部门互联互通等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仍由工信部负责。

市场不乏担心的声音，认为国家数据局将聚拢全国数据，由国家集中数据的管理权和所有权，因而产生一个类似国土资源的管理部门。对此，高富平分析称，集中数据尤其是物理集中，或将与大数据整体技术发展背道而驰，“实际上，国际社会很多专家都在强调，数据湖（物理集中）的概念是落不了地的。因为数据集中的治理成本，远远高于在数据产生源头分布式治理的成本。如果有源源不断的垃圾注入一个湖，那么这个湖永远也无法变干净”。

理顺发展思路

成立国家数据局的举措，与近年公布的关于促进数据要素发展的各项决策一脉相承。

2019年12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在中央层面明确数据可以作为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参与分配。为落实这一要求，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并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管理制度，提高数据质量和规范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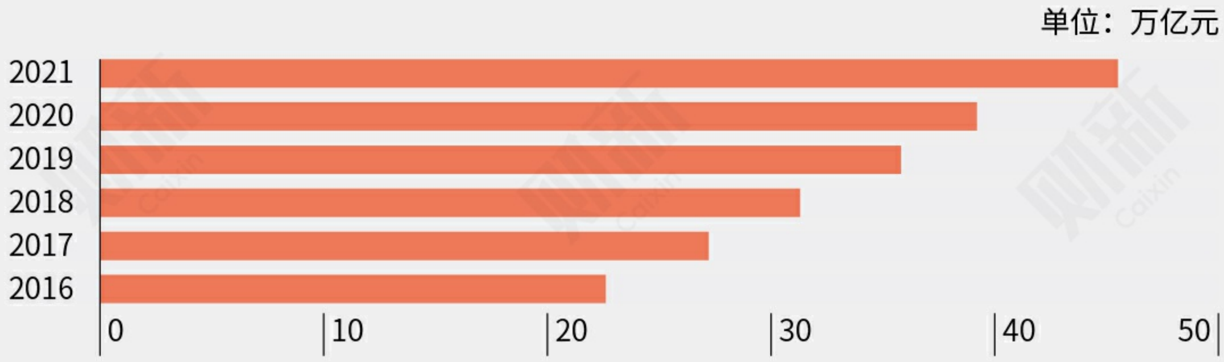
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划分一个章节对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进行专门且集中的论述，在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搭建数据交易平台和培育市场主体等方面作出战略规划。

2021年4月起，国家发改委组建跨学科专家队伍，牵头起草进一步落实数据要素的政策文件。经过复杂的编写工作，2022年6月，被称为“数据二十条”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由深改委审批，足见‘数据二十条’规格之高。”一名熟悉政策的人士对财新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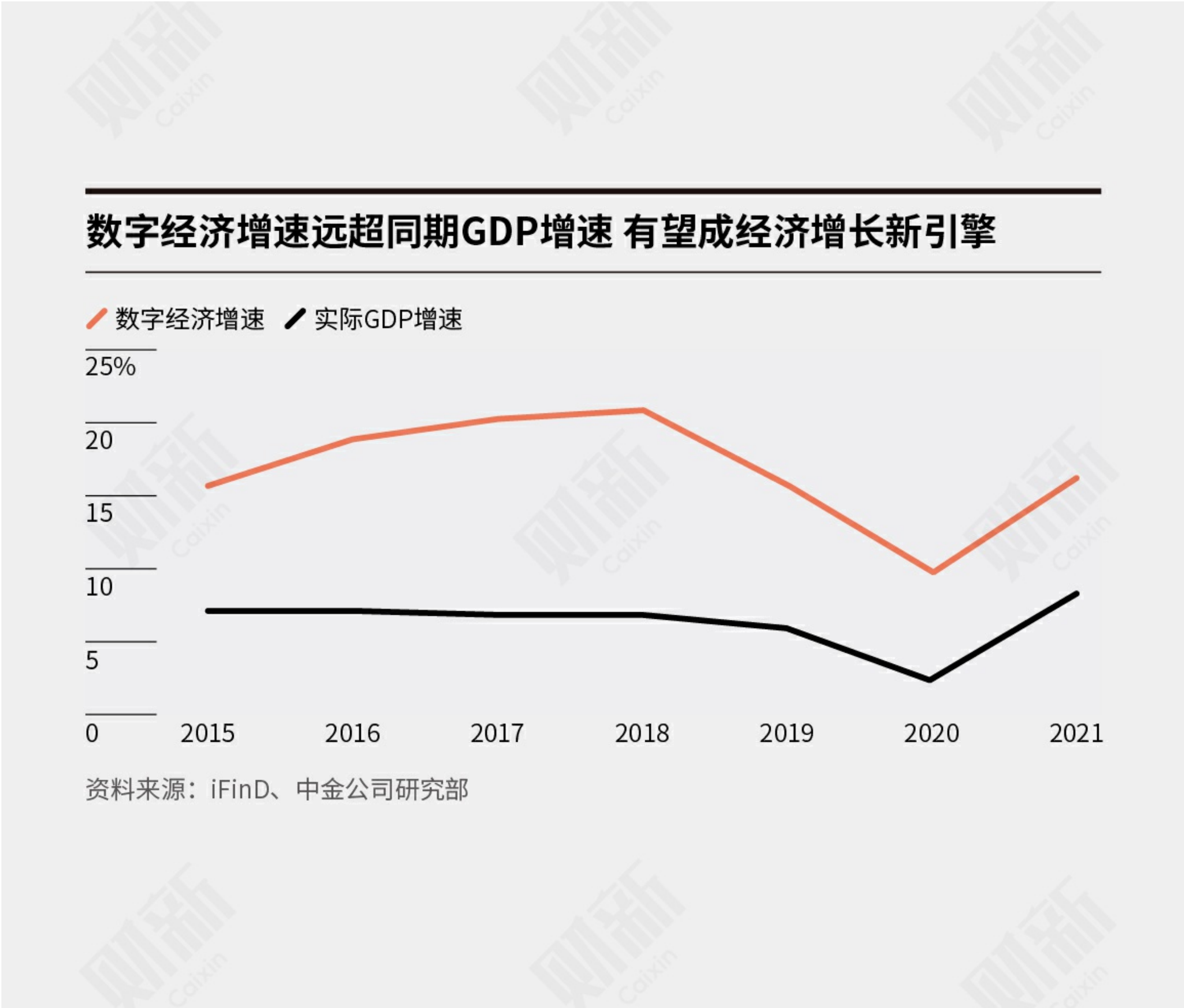
多名受访者表示，“数据二十条”发布与后续设立国家数据局密切相关。2022年7月，国家发改委提出的“建立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获国务院同意，成立由发改委牵头，网信、工信负责人担任副召集人，由20个部委组成的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统筹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化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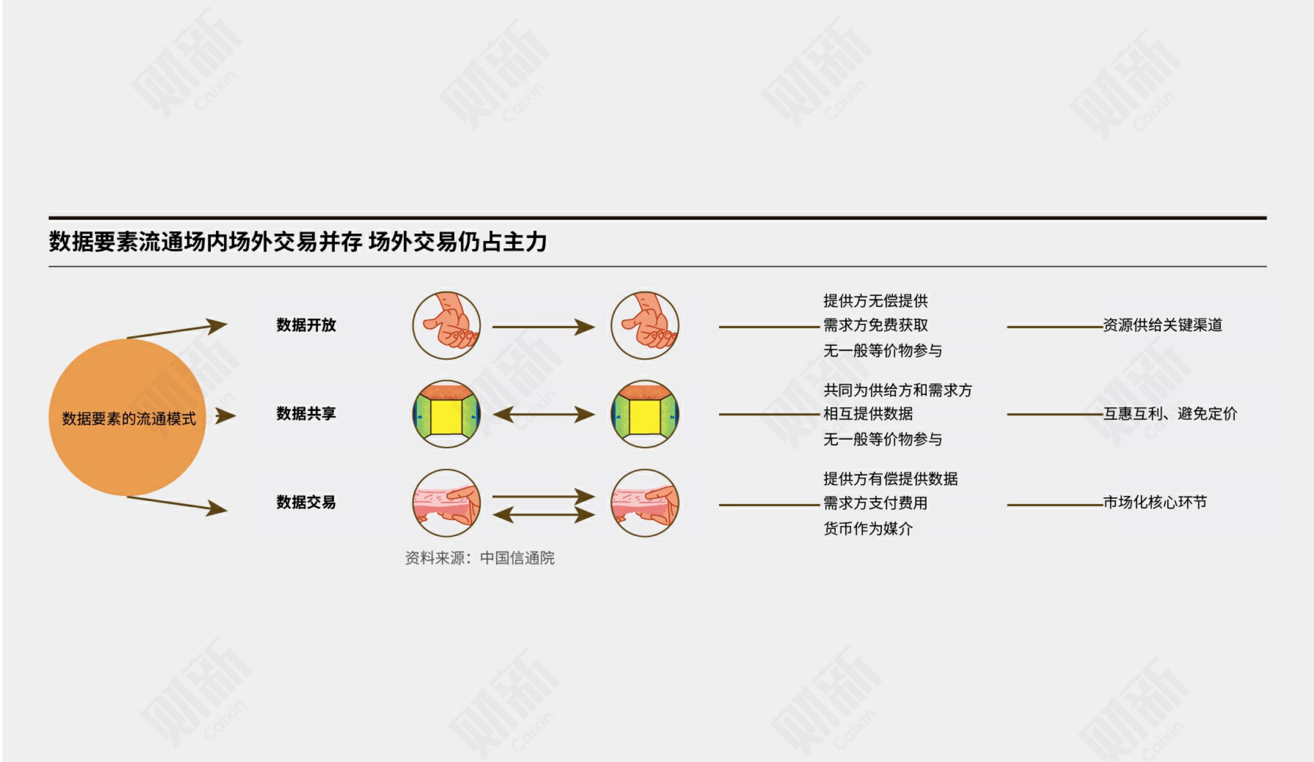
“目前经济增长压力比较大，中央希望数据要素充分发挥出对经济的驱动作用，因而专门设立部门去做管理和统一协调。”一名数据行业专业律师对财新称。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5年翻番 总值近50万亿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


数字经济增速远超同期GDP增速 有望成经济增长新引擎
数字经济增速
实际GDP增速
25%
20
15
10
5
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资料来源：iF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最终，国家数据局将整合中央网信办承担的拟订数字中国建设方案、协调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信息化、协调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协调国家重要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共享、推动信息资源跨行业跨部门互联互通等职责，同时整合国家发改委承担的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组织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建设等职责。

对从业者来说，推进完备的制度建设是对国家数据局的首要期待。

“数据不敢流通是目前最核心的问题，关于数据合法合规流通的定义是什么？哪个部门来定？谁来监管执行？这些都需要确定下来。”华控清交信息科技公司CEO张旭东指出，目前亟待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关于数据流通的法律法规、制度和规章。只有“法、度”都确定了，数据才能在此框架内大规模流通利用起来。

“眼下刚刚开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它本身就是一种开创性的挑战，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甚至没有一个固定路径可以依赖。”广东省数字政府研究院副院长傅建平也指出，目前首先要解决的是数据要素法规制度不健全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周源等多名代表、委员建议加强数据要素市场，推动落实“数据二十条”细则。国家发改委在2022年12月20日“数据二十条”发布当日的答记者问中表示，下一步，将丰富完善数据要素各方面制度体系，确立数据产权和交易等规范，支持浙江等地区和有条件的行业、企业先行先试；出台数据交易场所管理办法；探索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要素登记存证平台。

“‘数据二十条’只是顶层设计，尚缺乏配套规章和条例。国家数据局可能通过将‘数据二十条’和‘数字中国’的内容细化，将顶层设计转化到具体可操作的一些法律法规上来。”许可说。高富平认为，“数据二十条”虽然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原则，但产权问题方面仍不清晰。未来国家数据局有望就数据产权问题再出台细则，并且预计在其挂牌后不久就有可能推出。

监管门槛未降

过去两年，中国通过密集出台法律法规及快速落地监管案例，建立起了针对市场主体的数据监管思路。目前，这部分数据监管职能仍主要由中央网信办牵头。

2022年7月21日，中央网信办依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对滴滴未经审批境外上市处以80.26亿元罚款，对滴滴出行董事长兼CEO程维、总裁柳青各处100万元罚款。2023年1月16日，滴滴出行宣布，经报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同意，即日起恢复新用户注册。

滴滴事件给所有拥有海量数据的平台型企业敲响警钟。2022年2月15日生效的修订后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规定，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申报网络安全审查。2021年二季度至今，多家试图以VIE（协议控制）架构形式赴美IPO的互联网公司调整计划，部分转向港交所。

尚未有处罚落地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亦如悬顶之剑，迫使拥有大量用户数据的互联网平台必须做好相关合规。“《个人信息保护法》落地以来，所有的互联网公司法务都密集加班，梳理公司的用户隐私条款，尤其注重数据安全。”一名互联网公司法务部人士告诉财新。再加上美国苹果公司顺应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监管要求，采用IDFA（广告标识符）来代替可惟一识别的设备ID，并要求各应用在搜集用户信息并共享给第三方公司时需得到用户的单独授权。《数据安全条例》则规定敏感个人信息，包括个人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处理这类信息需要取得个人单独同意。

除了网络安全审查令企业压力颇大，数据跨境、汽车收集数据等亦需申报。自2022年9月1日生效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设立了为期6个月的整改时限，截至今年3月1日前必须完成申报。而按照《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汽车企业需要完成数据安全管理年度报告工作。

“解决数据的安全问题尤其是国家安全问题，是开发利用数据的前提条件。”高富平指出，从《网络安全法》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再到《数据安全法》，大家感受到的主色调是“监管”和“安全”，跨部门联合执法力度也较大。市场期待国家数据局设立之后，释放出一些平衡性政策，在严格监管手段之外，打开数据开放利用之门。

一家主要投资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美元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人士则指出，国家数据局成立对市场而言是积极信号，“拥有数据本身不再是原罪了”。她指出，过去互联网公司对数据隐私侵犯等问题意识薄弱，认知只停留在数据脱敏后做用户画像、协助广告投放商业变现等程度，跨境风险甚至安全风险防范都欠缺，“目前监管就是要确定边界，商业公司则会就此调整，找到新的合规和商业的平衡”。

当前中国在数据监管具体执行上仍存在诸多难点。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所长何宝宏指出，数据交易、数据处理具有隐蔽性，侵权、犯罪行为较难被发现，在出现数据泄露、黑市交易等事件后，也较难追溯到具体责任方。此外，算法处理具有一定黑盒属性，明确界定行为、结果以及因果关系存在一定技术难度。最终，在数据交易层面，往往存在个人、企业等多个主体，需要保障的法益众多，“如何设计一个平衡多方利益、促进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监管框架，是现阶段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盘活数据流通

“数据二十条”提出，要对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建立分类分级的确权授权制度，并强调“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聚焦数据使用权流通”。张旭东曾参与“数据二十条”的起草，他认为，第二章流通交易的内容大体是“重流通、轻交易”，交易只是数据流通的方式之一，划拨、共享、开放、交换、赠与、继承，都是数据流通。交易的显著特点就是以货币为对价。

“数据流通的需求是遏制不了的，没有流通便没有发展。”高富平则指出，在打击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同时，也应该把合规交易的通道打出来，让企业有正规渠道获取数据，否则只能去黑市买数据，反而更助长数据泄露。

而要流通，数据的确权最为关键。张旭东认为，目前数据确权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也达成了一些共识，但要像传统商品或财产那样清晰地界定产权，法律和技术上还有障碍。“现阶段就数据产权问题很难达成共识，可以把争议问题放一放，聚焦在推动数据使用权的流通和价值创造上，先让数据流动起来，让发展带动解决其他问题。”他说。

张旭东认为，当下数据流通面临“不愿流通和不敢流通”的问题。不愿流通是经济问题，担心流通起来会损失自己手里数据的价值；不敢流通是担心发生问题牵连自身，因为在传统的数据安全观念中，数据不流通才是最安全的。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是通过经济手段来补偿和平衡，不敢流通的问题必须通过管理使用风险来解决，具体而言，就是管控数据的具体使用目的、方式和次数。

由此可见，数据部分确权成为目前各方想要推进的方向，也为后续交易流通打下基础。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委员建议成立国家级数据交易所，其中包括新任政协委员、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景亚萍。

她在提案中建议，总结贵州大数据先行先试经验，加快布局国家级数据交易所、建立数据要素确权登记制度等，助力加快培育全国数据要素市场。目前，各地仍在密集关注会否推出国家级数据交易市场。

2015年，全国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挂牌运营，承担数据流通交易平台日常运营、市场推广和业务拓展等工作，在数据要素定价模式、价格形成机制以及促进数据要素配置、公平交易和自由流动等方面有诸多探索。

“一提到市场，做数据交易的人眼睛就发亮了，觉得买卖来了，数据财政的提法也出来了。”张旭东认为，地方政府应当先把流通规则讲清楚。一名数据从业者对政府在数据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仍有担心：“如果政府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那入场门槛就大大增加了。”

“地方确实有设立授权运营来赚钱的冲动，但数据的价值应该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如果直接拿去卖钱，往往不能产生经济价值，只是一个短视的行为。地方政府真正应当做的是，让数据交易所成为打造营商环境的一个基础设

施，通过企业发展来赚钱。”高富平强调。

许可也认为，对于孵化数据要素市场，政府应首先完成思路的转变，从管制性思路变为赋能性思路，提供具有很强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来搭建基础设施。政府需要做的是增强信任、降低双方的交易成本，而不是着急把数据变现。

屈运栩对此文亦有贡献

相关报道：《封面报道丨重塑金融监管》、《封面报道之二丨改造科技部：瘦身放权“加帽子”》

版面编辑：刘潇

社论｜自由与开放是科技创新之魂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遵循科技规律，让广大科技人员的才智充分涌流



2023年3月3日，海南澄迈，在中海油深海深层工程实验室内，工程师正在开展深海油气勘探开发应用基础性研究筹备工作。据了解，该实验室占地约7400平方米，分为三跨六区，设立34个匹配深海深层工程技术的实验区域，是中国海油一南一北两个最高级别的测井作业保障支持实验室之一。图：视觉中国

科技管理体制迎来重大转变。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是备受关注的一项。其中，科技部的部分职能将被划出；新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办事机构职责由科技部承担。重组后的科技部不再参与具体科研项目评审和管理，主要负责指导监督科研管理专业机构的运行管理，加强对科研项目实施情况的督促检查和科研成果的评估问效。科技管理体系的这一重大转变，有望激发中国科技创新的内在活力。在高质量发展对科技创新的要求日益提高、内外部科技"脱钩"愈加严重的背景下，各界对此次科技机构改革充满期待。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同时是人类探索自然的创造性智力活动，其进步有着特殊规律，需要特定的制度保障。2021年5月，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给予科研单位更多自主权，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让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从繁琐、不必要的体制机制束缚中解放出来！"毋庸讳言，现行科技体制还难以满足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

科技何以能够创新，与一国经济实力有关，也与教育及人口素质息息相关。不过，中国科技创新欲取得实质性突破，取得更多世界领先成果，关键还在于遵循科技规律，让广大科技人员的才智充分涌流。其中，为科研人员创造学术自由的宽松氛围，为其提供开放共享的便捷条件，既是当务之急，也应当成为科技体制之魂。

强调学术自由与开放，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得益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曾长期困扰中国科技事业的经费不足问题已获得根本解决。数据显示，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1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3.09万亿元，多年稳居世界第二。有些人士认为，只要持续投入，假以时日，中国科技必定能走到世界前列。制度保障是他们的视觉盲区。这种想法可称为"烧钱迷思"，与世界科技发展史相悖。集中烧钱或可获得某些进展，然而，与全社会为这些个别、局部成果所付出的机会成本相比，这些成果可能会黯然失色。离开充溢着学术自由与开放精神的体制机制，再多的投入也难以持续取得彪炳世界科技史册的成果。

强调自由与开放，还与中国科技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科技发展成就显著，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由过往的跟随追赶模式正在转变为接近甚至在个别领域占据世界前沿。这一变迁与中国经济的变迁若合符契。如果说在追赶模仿阶段，由于方向与路径明确，大规模投入还能取得一定成效的话，当接近国际第一梯队之时，中国科技创新越来越需要戛戛独造，投入的方向、投入的效率都成了待解难题。面对科学技术"无尽的前沿"，学术自由与开放就变得愈发成为前行的路基。

学术自由首先意味着要尊重学术，敬畏科学。掌握科技最前沿信息的，毫无疑问是该领域的专家学者，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官员。有了行政级别，就掌握着资源分配权，也就拥有了学术话语权，此种局面必须改变。重组后的科技部不再参与具体科研项目评审和管理，意义就在这里。近些年，饱受诟病的报销、填表占据科研人员们大量时间等怪现状，其实只是表象，实质是陈旧僵化的体制对学术尊严的傲慢，对学术自由的损伤。中国科技人员也需要像民营企业家一样，放开手脚，轻装前进。

封闭的国家没有前途，封闭的科技也不可能跟上世界的脚步。在封闭环境中，连自己落后多少都不清楚，又何谈超越？封锁与自闭曾急剧拉大了中国科技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以1979年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为标志，中外科技交流空前活跃，中国科技从中获益良多。例如，近年中国创新药异军突起，背后是一大批

创新药人才的全球大流动。如今，形势丕变，科技"脱钩"愈演愈烈，"卡脖子"难题横亘前方。越是如此，越要以开放的胸襟，海纳百川；既要力争外部环境好转，又要增强开放意识。谨防应和着"脱钩"节奏，重回自闭的心智。

倡导学术自由与开放，也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下，绝大部分科研需服务于商业目的。在中国科研经费中，企业投入占据近八成。同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企业不愿投或无力投的基础研究领域。近年来，华为等一些企业在基础研究上投入巨大，这是可喜现象，却不可能成为普遍模式。政府资金如何弥补欠账，引导科研、特色是基础性研究，可向国际最佳实践取法。

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一定不缺乏科技天才，关键是依靠制度保障，让他们的才智充分涌流。此番科技机构改革，不仅涉及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职能调整，更重要的是，它将进一步给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我们期待，通过今后更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构建开放创新生态。惟有如此，中国科技才能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起到应有作用。

（本文为即将于2023年3月13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10期社评）

版面编辑：刘潇

最新财新周刊丨中国式私募监管再探索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在合格投资者制度滞后、管理人规范水平亟待提高、政策法规体系有待完善的现状下，适度监管对野蛮生长多年的中国私募行业是否行得通？



20万亿元规模、2.2万家管理人的中国私募基金行业，正式进入严进严管的时代。图：视觉中国

文丨财新周刊 岳跃

十天之内收到1000多份反馈意见后，又经过一个多月的斟酌，中国私募基金行业截至目前最为全面的一套规则——《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下称“私募新规”），终于在2023年2月24日发布，并将于5月1日起实施。

20万亿元规模、2.2万家管理人的中国私募基金行业，正式进入严进严管的时代。

自2014年2月启动登记备案工作以来，中国私募行业九年间呈爆发式增长，但“多而不精、大而不强、鱼龙混杂”以及“小、乱、散、差”等问题较为突出，涉众风险事件频发。其间，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基金业协会”）不断以各种公告、问答、办法等监管和自律措施叠加“打补丁”，在付出高昂的监管成本以及引发不少微词后，却收效甚微。

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综观国际发展经验，私募基金建立在合格投资者制度之上，投资者自我保护能力强，应该坚持适度监管，避免行政力量过度干预；而在监管当局眼中，私募的“准金融”属性不能忽视，且新生的中国私募市场有其特殊性，投资者教育任重道远、管理人规范化水平有待提高，“伪私募”乱象丛生后更应加强监管。

如何“宽严有度”，既不能任由行业野蛮生长损害投资者利益，又不能因噎废食阻碍甚至扼杀行业的正常发展，一直困扰着各方。在中国私募基金行业最高级别的监管文件《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下称《私募条例》）酝酿多年而迟迟未出的背景下，现有治理体系亟待重塑（参见本刊2021年第30期《私募条例难产》）。

据财新了解，私募新规酝酿近三年，将此前碎片化的业务规则集中整合，吸收一线监管中的经验和教训，并引入尚未出台的行政法规相关内容“先行先试”，对管理人准入及基金“募投管退”各环节的要求系统梳理，制定了具体和量化的监管指标。内容整体上较以往更严格，体现了监管治理私募乱象、扶优限劣的决心（参见本刊2023年第3期《私募基金严进严管》）。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发布的私募新规有较大变化，如在业界反映较为集中的私募基金最低实缴备案规模等问题上都有一定让步。“从这些变化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出基金业协会基本上吸收了行业反馈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中诸多不太明确的概念给予了释明，对较为刚性的门槛条款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或优化。”紫荆资本法务总监汪澍表示。

据悉，基金业协会近期还将针对基金备案、集团化运作、法律意见书等出台指引，对相关规则要求进一步细化明确。“备案指引会分为证券基金和股权基金两个指引，预计会在今年上半年推出，配合新规5月1日实施。这两个指引前期已在业内小范围征求过意见。”一位知情人士对财新表示，今后将形成“办法+指引+案例”的私募行业规则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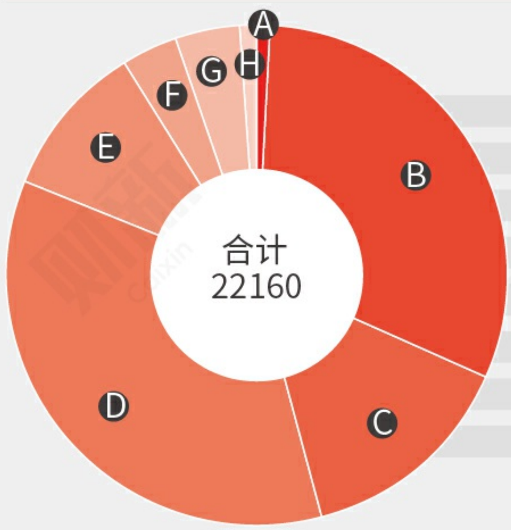


中国私募基金存续规模达20.23万亿元

基金类型	管理人（家）	基金数量（只）	基金规模（亿元）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595	94264	56145.33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13251	31046	110674.67
创业投资基金		19570	29079.05
私募资产配置类基金	9	30	53.61
其他私募投资基金	301	1435	6393.38
合计	22156	146345	202346.04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截至2023年1月底

近半数私募基金管理人实缴资本不足1000万元



	实缴资本	家数	占比
A	100万元以下	200家	0.90%
B	100万—500万元	6826	30.80%
C	500万—1000万元	3160	14.26%
D	1000万—2000万元	7803	35.21%
E	2000万—5000万元	2231	10.07%
F	5000万—1亿元	827	3.73%
G	1亿—5亿元	907	4.09%
H	5亿元以上	206	0.93%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截至2023年3月初

尽管此次私募新规在监管思路上作出了重大变革，但仍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例如如何更好地兼顾中小型管理人的利益，如何将创投基金的差异化安排落到实处；此外，在私募新规执行过程中能否切实减少“窗口指导”或“口袋政策”等行政许可色彩，能否进一步消除自律管理的“监管幻觉”和过度干预，也都有待实践的检验。

门槛背后的逻辑

在私募新规征求意见阶段，业界争议较多的一条便是基金初始实缴募集规模。征求意见稿要求私募证券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不低于1000万元，私募股权基金不低于2000万元；而在此前实践中，基金业协会并没有最低首募规模的要求，例如私募证券基金一般达到200万元即可备案。

在正式稿中，私募证券基金1000万元的要求没有降低，但私募股权基金的最低实缴备案标准从2000万元降至1000万元；创投基金作了差异化安排，即不低于500万元，但需在6个月内募集至不低于1000万元。此外，投资单一标的的私募基金不低于2000万元。

为什么会设置1000万元和2000万元的标准？这个门槛是怎么来的？“很多人都以为是基金业协会拍脑袋想出来的，其实不是。每个标准的背后都是根据管理人运作实践情况和已经备案的金额数据做了大量论证的。”一位知情人士对财新表示。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年报2021》，截至2020年末，私募证券基金“数量多、规模小、小型基金数量占比高、大型基金数量占比低”的现象依然突出。从数量占比看，1000万元以下的私募证券基金24161只、占47.04%，5000万元以下的39042只、占76.01%；从规模占比看，1000万元以下的私募证券基金合计金额只有826.28亿元，仅占全部私募证券基金规模的2.23%。同期，规模在5000万元以下的私募股权基金占比超过50%，2000万元以下的达到31%。

“私募迷你基金太多，并不是一个健康的行业生态，也难以促成行业的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前述知情人士对财新表示，私募新规起草过程中，最开始监管层对私募股权基金拟定的门槛是3000万元，“一般来说，像样的、正经的PE机构，单只基金投个两三千万应该是有的”。但在私募新规前期小范围征求意见时，业内提了不少意见，所以后来调整为2000万元。而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市场普遍认为2000万元的门槛还是偏高，因此正式稿最后降为与私募证券基金同样标准的1000万元最低门槛。

对于投资单一标的的私募基金不低于2000万元的要求，在征求意见后并没有降低标准。此前有观点认为，非得凑齐2000万元的规模才能设立基金可能会造成资金的沉积浪费，甚至会出现为了成立基金而使用过桥资金等灰色手段的现象。但支持者称，单一标的的基金并非私募基金的常态，不应该鼓励；如果不做“盲池”化的投资，就意味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投资者承担的风险极大。

“作出基金最低实缴募集门槛要求，确实有很多无奈之处。有很多机构通过前期小规模实缴获得备案证明后，利用备案证明自我增信，肆意进行后续募集活动，这种情况极大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和行业形象。也有很多‘僵尸型’管理人会通过三五百万元的产品‘保壳’，后续再‘卖壳’，并无实际业务，对行业发展没有任何帮助。这些问题通过设置最低实缴募集门槛，确实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汪澍表示。

此外，在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市场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实缴货币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的要求亦有不少意见。此前，一般只要求实缴资本能满足一段时间（一般不低于六个月）的持续运营，不低于注册资本的25%，且不低于200万元即可。在实践中，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注册资本是允许部分实缴或限时分期实缴的，针对不同类型的管理人，注册要求有所不同。

“（私募新规提出）最低注册资本要求，且明确只能以货币形式实缴出资，这与持牌金融机构的注册资本实缴要求基本看齐，大幅提高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设立门槛，对一些中小型管理人的资金实力及出资能力提出了考验。”一位专注于私募行业的律师表示。

尽管市场对管理人1000万元实缴资本这一要求的意见较大，但最终出台的正式稿并未让步，仍然要求为1000万元。

财新此前获得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月末，45.95%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实缴资本不足1000万元。“确定1000万元实缴资本也是经过测算的。一家管理规模在1亿元出头的、刚刚起步的中小型私募机构，每年需要270万元左右的运营成本，正常经营三年大概要1000万元。”前述知情人士称。

集团化运作给空间

财新2019年10月曾报道，私募基金集团化运作引发监管关注。财新当时从权威人士处获悉，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24368家私募基金管理人中，86.4%（约21000家）由1971个实际控制人控制。截至2021年末，管理规模在50亿元以上的管理人中，存在约190个实控人控制多个管理人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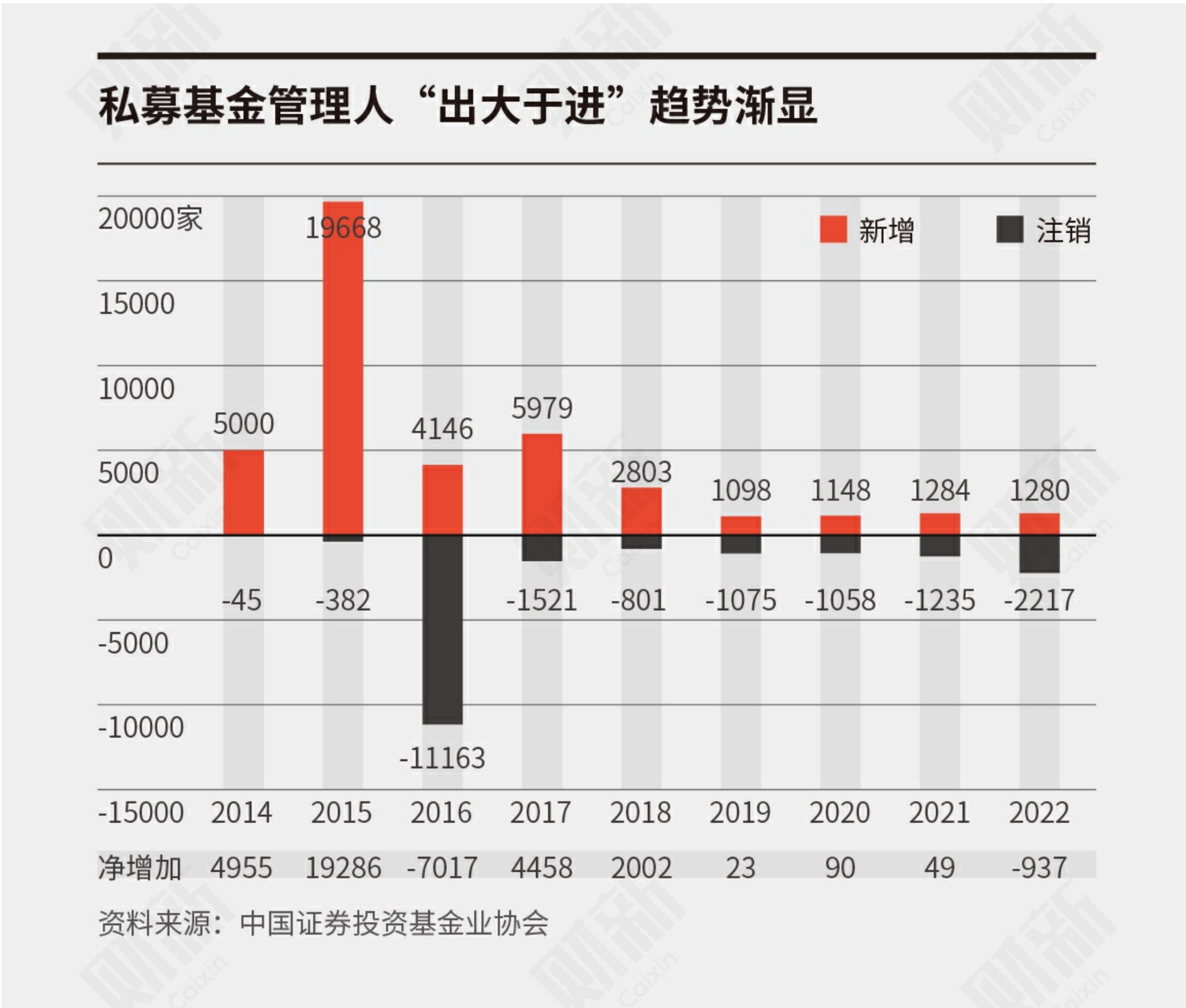
一位私募行业的前监管人士表示，违背基金本质和专业道德要求，给私募基金行业带来形形色色的问题，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管理人登记中的集团化问题。“集团化运作存在变相自融、利益输送等侵害基金投资者利益的巨大风险，行业自律应当对危害投资者的重大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将应对此类风险的长效措施纳入行业治理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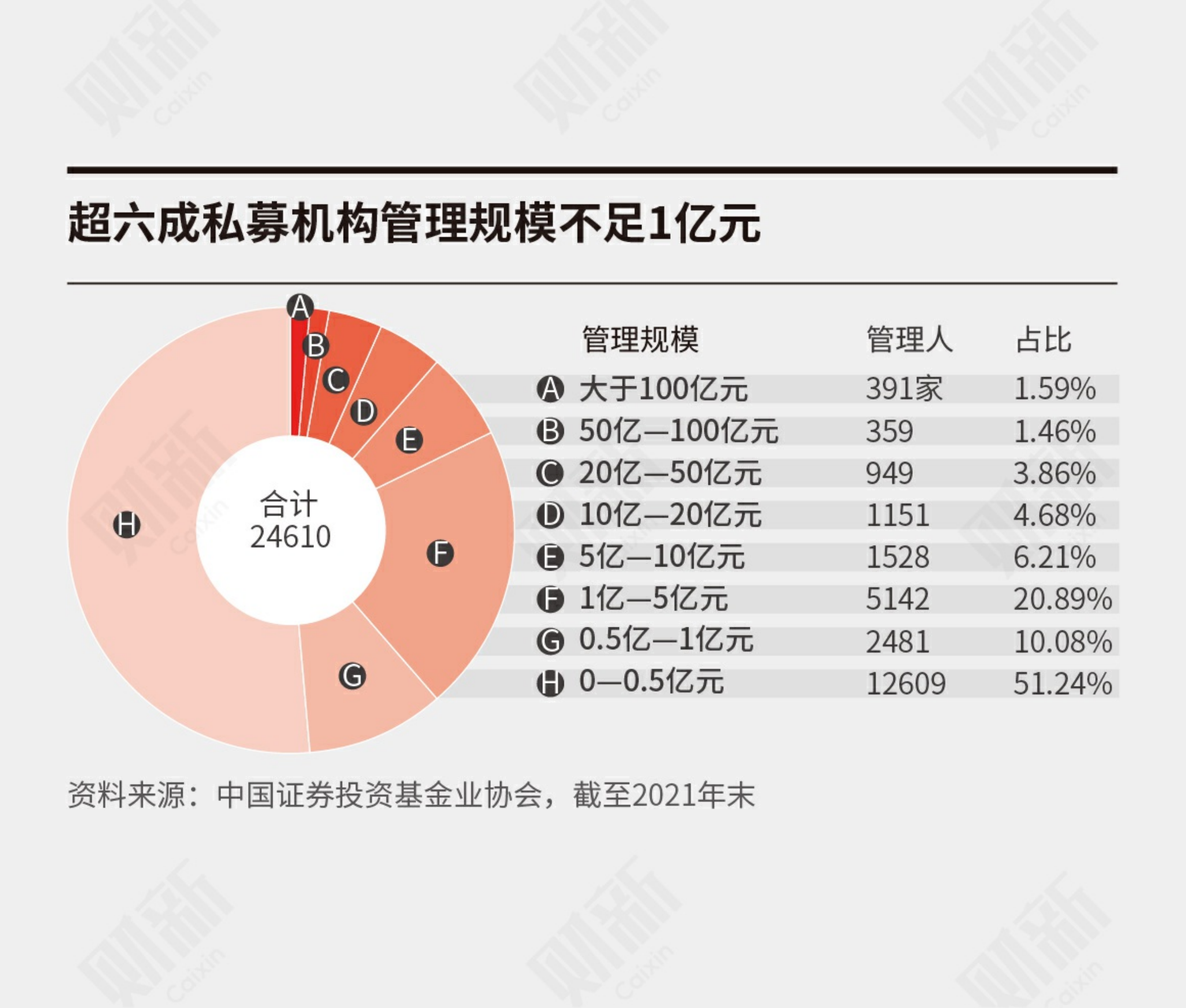
具体而言，私募集团化经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登记备案启动之初，由于门槛不高，小额信贷、P2P等“伪私募”大量混入，形成跨金融部门的集团化。这类企业设立多家关联、非关联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进行集团化经营，极易出现期限错配、滚动发行、嵌套投资、关联交易、投资单一标的等情形。

还有一些“伪私募”将私募基金视为“提款机”，为集团内融资业务“输血”，内控失效，不同业务间风险隔离机制缺失，将基金投资者置于严重的利益冲突风险之中，甚至故意违法犯罪，借基金之名侵害基金投资者财产权。

“江、浙、沪地区某集团业务模式复杂，私募基金产品之间相互嵌套，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机构多达400家。”一位接近基金业协会的人士此前表示。在监管严厉打击此类存在业务冲突的横向集团化后，部分实控人又开始通过非股权关系的人际控制，形成复杂的股权代持网络，变相实现集团化。

第二种类型是国资背景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集团化。财政资金为探索新的资金运用方式，例如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功能价值，在参与市场化投资过程中，出于内部激励、属地管理或税收本地化要求，往往下设若干个业务同质化管理人，分别登记运营，或要求有财政资金参与的基金产品GP（一般合伙人）和管理人“双落地”，形成基金管理人内部的纵向集团化。





一家大型PE的董事长表示，集团化运作能够在管理决策、标准、人员、资源等方面实现统筹管理，高质高效节约成本；实践中，管理人在股权结构上确实可能因商业安排，比如国企层级的需要、历史上股东存在多层架构、建立团队激励实体的需要等，使得结构相对复杂；集团化也可能并非从业机构的主动选择，而是为了满足上述落地等要求而必须完成的被动操作。

此类情形虽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部分集团化管理人的层级多达五六层，甚至八九层，不仅不符合国资治理结构调整的方向，而且集团内基金产品之间多层嵌套，也抬高了投资人负担和资金成本。

针对上述情况，证监会和基金业协会此前在《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中提出，要从严监管集团化私募基金管理人，并要求如实披露出资结构，严禁代持、交叉持股、循环出资等。

此次发布的私募新规正式稿，整合吸收以往规则，支持治理结构健全、运营合规稳健的集团化运作私募基金管理人规范发展：对同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两家以上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要具备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要求合理区分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业务范围，以实现业务风险隔离、避免同业化竞争、关联交易管理和防范利益冲突等，并建立和完善内控制度。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公开发表的观点称，私募新规延续了基金业协会分类管理、扶优限劣的原则，肯定了集团化运作现实存在的普遍情况；亦结合集团化运作的特性，从各方面给私募基金管理人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内控要求。“一言以蔽之，既然要集团化，那就更要兼顾规范化与专业化。”

据财新了解，基金业协会下一步还会发布管理人集团化运营的指引，根据管理人的业务开展情况、投资管理能力、内部治理情况和合规风控水平，实施分类管理和差异化自律管理。“对于一些‘好的’集团化管理人，会豁免适用在员工人数、合规风控负责人兼职、集团内部报送主体等方面的一般性要求，有一些从简从轻的安排，以节约管理成本和减少企业负担。”一位知情人士称。

创投差异化管理待解

私募新规中关于创投基金的差异化安排，是业界最为关注的内容之一。不过多位人士对财新表示，就整体感受而言，私募新规中对创投基金着墨不多，并未见到实质性的“差异化管理”。

例如在管理人登记方面，关于1000万元的实缴货币资本，私募新规对于专门管理创投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没有强制要求，仅提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但目前基金业协会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分类中，股权和创投类管理人合为一类，并没有专门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的管理人选项。

不过，私募新规此次的一大亮点，是在吸收各类现行规定以及学界观点后，进一步明确了创投基金和股权基金的界限：一是投资范围限于未上市企业，且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的“主要从事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定语，也可以投新三板挂牌企业；二是基金合同要体现创投策略；三是禁止创投使用杠杆融资；四是名称包含“创业投资”等。

但对于名称包含“创业投资”的要求，业界有意见称，目前工商注册要求注册资本3000万元以上才能在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冠以“创投”，如此一来3000万元以下的基金都无法备案“创投”并享受20%的税率，因此，该条款值得商榷。

“目前，监管规定和实操对创投基金‘差异化管理’的内容尚不明确。呼吁创投‘差异化’的初衷，就是为了配合支持国家科技创新的总体战略而充分发挥创业投资的作用，从根本上应该积极鼓励支持，而不是出台比一般私募基金更严格的举措。”亦有意见认为。

长期以来，业内对于何谓创投基金有较多争议，根本原因在于创投基金有多个监管主体。

2006年前后，伴随着中国PE/VC行业在政策利好之下迎来春天，国家发改委和证监会的监管权争夺也摆上台面。因管理部门职责不够明确，给行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2013年7月，中央编办印发《关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职责分工的通知》，明确由证监会负责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督管理，对设立私募股权基金实行事后备案管理，负责统计和风险监测等工作；国家发改委负责组织拟订促进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政策措施，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政府对私募股权基金出资的标准和规范；两部门要相互协调配合，实现信息共享。

但时至今日，“两个部门、两个系统、两套标准”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未能解决；酝酿多年而迟迟未出的《私募条例》，据悉也因此难以达成共识，只好对创投作了专章安排，将遗留问题继续搁置。

接近监管的人士对财新表示，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层面，专门做创投业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与做股权投资的管理人确实不太容易区分，登记时的类型也会在后续展业中出现变化。“目前私募新规对创投的界定还远远不够，比如要和税收部门的政策相适应，很多地方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将创投差异性安排非常明确地落实在私募新规中有一定的困难，只能留一些口子，今后如果出台了更高层级的针对创投的办法，私募新规也不需修改。”

“作为证监会下属的一个自律性组织，基金业协会到底有没有法律上的授权对发改委系统监管的主体，作出实质性的要求？我认为这是一个核心的原因。”一位私募行业的律师补充道。

监管模式不能照搬

对一些小型机构和专注于做“精品”私募的管理人而言，前述各项门槛的大幅提高，令它们的生存空间堪忧，最终可能会彻底出局。

对此，一位接近监管的人士称，提高门槛的主要目的是淘汰一批比较差的机构，也难免会“误伤”那些资金实力尚不雄厚、致力于走“精品”路线且专业水平过硬的管理人，“但后者毕竟是少数，预计被筛掉的机构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差生’”。

“中国私募基金行业发展到目前阶段，市场有2万多家管理人，是时候适度提高门槛、提升整个行业业态水平、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了。目前的政策肯定难以兼顾多方利益，只能先抓主要矛盾；待市场整体质量提升后，对各方诉求的兼顾应该会好很多。”前述接近监管的人士表示，这是一个壮士断腕的过程。

不过这样一来，难免再次引发市场对私募基金适度监管的质疑。例如，国际上普遍对私募基金实施统计监测性质的事后备案，并没有引入类似于公募基金的强监管规则，监管的重心在于确保其履行信义义务、防范利益冲突、坚持基金持有人利益至上。而在中国市场，基金业协会的登记备案常被诟病为事实上的行政审批，自诩的自律管理

亦带有某种“监管幻觉”，市场主体对私募基金公募化监管反应较为强烈。

多位接近监管的人士对财新表示，这一中外差异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实现程度不同。“跟海外成熟市场比，我们的合格投资者标准未必定得有那么高，100万元的门槛是将近十年前划定的，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我们所谓的合格投资者未必真的合格，他们的风险识别能力、自我保护能力、与机构博弈的能力并不高，极易被‘伪私募’牵着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寿双律师认为，由于中国合格投资者制度发展滞后、机构投资者少及社会实践的复杂性，私募行为经常轻易突变成公众或半公众集资行为，因此需要重新思考私募行业的监管方式和着力点问题，甚至监管理念和监管抓手问题。

“换言之，在注重私募行业自律一面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准金融’的另一面，吸收央行、银保监会以及更高层要把金融机构配置在适当的人手上的精神，吸收处置中小问题金融机构的实践经验，加强对私募管理人高管的要求，并明确提出对实控人的资质要求，就成为这次规则修改的重中之重。”李寿双表示。

不可否认的是，更加严格的私募新规之下，某些机构若想成功通过登记备案，难度较以往更大，更来之不易。同样，尽管基金业协会的登记备案并非行政审批，但其稀缺性增加了“含金量”，无形中也增加了这些机构获得“类牌照”的光环。

基金业协会虽一直强调登记备案不是监管背书，但这也容易让投资者误以为私募基金如同公募基金一般是受到严格监管的金融主体，从而变相对管理人产生了额外的增信作用，让投资者误以为私募基金的风险和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的资管业务的风险大体一致。

“其实，恰恰是那些‘伪私募’和行业‘差生’，才需要不断通过这种方式自我增信，它们也是监管紧盯的对象。”前述接近监管的人士表示，“通过提高准入门槛和对实控人、高管作出硬性的专业性资质要求，可以有效减少‘害群之马’。”

基金业协会此前发布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材料清单》，要求高管履历要看“最近三年”的经历，但实践中发现不少挂靠小机构、跳槽频繁、教育背景较差的情况，他们明显不能满足私募高管的要求。

而根据私募新规，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委派代表、经营管理主要负责人，以及负责投资管理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有五年以上相应领域的相关工作经验，例如金融机构高管、负责经济管理的公职人员、企业中负责投资的高管等，基本思路就是将“圈外人”排除在外。

一位私募行业的人士总结道：“私募基金的监管是一个不断探索、校正的过程，现在出现的问题很多都是阶段性的。比如一开始按照适度监管的原则来管，口子开得太大，就出现了野蛮生长；各种乱象屡禁不止之后，加强监督、扭转纠偏；现在的标准看起来确实提高了不少，主要是因为之前太没有标准了。从金融本质的规律出发，提高私募行业的监管标准，当不再是劣币驱逐良币时，才有可能回归真的自律。目前完全依赖市场，对行业未必是好事。”

“中国现阶段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仍然以规范行业运行为主要目标，意图打破实践中的保本刚兑，坚守投资者适当性，进一步要求从业人员和基金管理机构规范运营，这一监管实践与中国私募基金行业整体尚不规范的阶段性现状是相匹配的。相较于美国，该行业规模较小、更为零散，这意味着中国的私募基金监管不能照抄照搬，而应当立足于行业发展的现实阶段，考察借鉴国外制度演进背后的逻辑和规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此前撰文称。

版面编辑：刘潇

专栏｜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二个机遇期

来源于《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如果把从2008年到2016年10月加入SDR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个机遇期，那么当前正步入第二个机遇期；此时，人民币国际化已具备了一些新的有利条件



从历史上看，货币的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确实有了很大提升。图：IC photo

文丨高占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特聘高级研究员

人民币国际化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启动，但很快引致全球瞩目。2011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在《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兴衰和货币的未来》一书中断言，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共享舞台，而到来的时间比人们预想的要更快。日本经济学家伊藤隆敏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会成功，亚洲将成为人民币区。而曾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学者苏布拉马尼亚姆甚至预测，人民币可能在2022年左右超越美元。就连英国杂志《经济学人》也于2014年4月宣称"人民币的全球化看上去势不可挡"。

从历史上看，货币的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确实有了很大提升。比如，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货币篮子特别提款权（SDR）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IMF也于当年四季度在其按季公布的官方外汇储备数据库中，首次纳入了人民币。自此，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人民币的规模从2016年四季度的约900亿美元增至2022年三季度的近3000亿美元，占比由1.08%升至2.76%，平均每年增加约0.3个百分点。目前，已有80多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2018年四季度人民币超越加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排名由第六位上升至第五位，并保持至今。

以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而言，人民币正逼近英镑和日元，并逐渐缩小与欧元和美元的差距。在最近六年中，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由65.5%降至59.8%，下降5.7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其他主要货币的占比都在提高，人民币仅为其中一员，只是升幅更大。

总体看，无论是作为储备货币、投融资货币、计价货币，还是支付货币，这15年里人民币都展现出相似的向上运行轨迹。但横向比较，人民币与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还有相当距离：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仅2.76%，而美元份额高达59.8%，欧元19.7%，日元和英镑分别为5.26%和4.62%；人民币日均场外交易量仅占全球各币种交易量的7%，而美元和欧元分别为88.5%和30.5%，日元和英镑分别为16.7%和12.9%[国际清算银行（BIS）2022年4月数据，总份额为200%]；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1.91%，排在第五位，而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占比分别为40.1%、37.9%、6.6%和3.2%。

或许正因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基调从之前的"稳慎推进"提至"有序推进"，体现出对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地位的重视。

如果把从2008年到2016年10月加入SDR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个机遇期，那么当前就是第二个机遇期。此时，人民币国际化具备了一些新的有利条件：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逾1900家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与中国内地和香港进行支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逐渐成熟，有1366家参与者，遍布全球；2022年5月，IMF将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拉开与日元和英镑的差距；中国央行已向约40家中央银行提供互换额度，并与BIS签署了储备池计划；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将于2023年4月3日推出基于美元/离岸人民币期货的期权；人民币在本外币跨境收付中占比增至近50%，其中在贸易收付中占比18%；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资产达10万亿元。

与英镑和美元不同，欧元、日元和人民币均未曾成为过全球主导货币。欧元目前的国际货币地位仅次于美元，

它有挑战美元的意愿，但缺少共享的资源与统一的金融大市场。日元主观上推动意愿不强，同时经济体量萎缩，金融市场开放度有限，强项是资本进出自由和货币完全可兑换。人民币有推动的意愿与政策引导，有统一且规模庞大的金融市场，币值稳定且汇率弹性渐强，虽尚不能做到资本进出自由和完全可兑换，但开放度渐高，可兑换也在稳步推进。假以时日，人民币有条件成为更具分量的国际货币。

版面编辑：刘潇

最新财新周刊｜航运业：“空箱”背后的巨变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从“一箱难求”到“空箱堆港”，两年间港口景气周期剧烈反转，中国外贸形势与全球航运业格局均临拐点



2023年3月7日，宁波舟山港北仑港区堆满空置的集装箱。供给端严重过剩，贸易界重获买方价格谈判优势，集装箱航运业在周期魔咒中轮回。 图：陈亮

文丨财新周刊 李蓉茜 戚展宁

位于宁波北仑区的横铺车场和北仑集运基地是中国最大的两个集卡专用停车场，主要服务宁波港集装箱码头。3月初，这两处停车场被近3000辆无单可接的闲置集卡车停满了。

46岁的集卡司机郑华来到横铺车场已半个多月，在此期间他只跑过两趟去台州的单子，收入1100元。“这点收入连生活开销都困难，快要坚持不下去了。”他说。

多名集卡司机告诉财新，在2021年旺季，他们一个月能拉27趟货物，“那时有货都找不到人拉”，而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只能闲在这里，“运气好时，一周能跑个两趟”。

港区内，六七层高的集装箱堆垛随处可见，这些显然都是空箱，因为装有货物的重箱最高只能堆五层。“现在堆场已经快满了，很多空箱都在往外调。”一名码头操作人员对财新说。

同样的景象也呈现在上海港外高桥码头，一辆接一辆集卡车空停在附近的一条条马路边。“往常春节假期后一个月，进码头送重箱、提空箱的集卡车辆都是要排队的，今年十分清淡。”上海港一名码头工作人员告诉财新。

上海港与宁波港同位于中国出口贸易最活跃的长三角区域，2022年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为4730万标准箱和3335万标准箱，位列全球第一和第三。

从“一箱难求”到“空箱堆港”，这两座超级港口的运势“反转”，背后是中国外贸形势和全球航运业格局的巨变。

据航运咨询机构克拉克森报告，2022年上半年，全球集装箱海运贸易量在2021年的高基数下同比微降1.7%；进入下半年，海运贸易跌幅放大，三季度同比下降3.9%，四季度同比下降8.5%。

集装箱贸易多年来几乎持续呈扩张趋势，大幅下跌十分罕见。2015年至2019年，全球集装箱海运贸易增速分别为2%、4.5%、5.6%、4.3%和2.3%；2020年因疫情暴发初期贸易供需受阻，全年增速曾下降到-1.4%；2021年海外消费需求增长叠加供应链大拥堵导致的“牛鞭效应”，曾推动该增速达到6.6%。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教授吴迪称，由于2021年海运需求异常火爆，货主和航运公司签订的2022至2023年长期合约价格普遍较高，导致2022年下半年大部分国际货物的综合物流成本较高，有些约占货物价值的15%，远高于正常情况下的5%—7%，而这些成本都将由货主等上游贸易商买单，再加上疫情后国外贸易商的库存水平普遍处于高位，使得许多贸易商只能减少采购量。

高库存、高运价共同反噬需求，随之而来的是运价雪崩式下跌。从2022年5月运价开始松动回落开始，到10月，中国至美国洛杉矶港的单个40英尺集装箱运价，已从2021年9月巅峰时的3万美元暴跌至2000美元；到2023年2月，这一价格更是跌至1200美元/FEU，回落到疫情前淡季水平。2022年下半年以来，反映即期市场运价的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SCFI）已经下跌约八成。

运价崩塌背后，是货量下降、供应链缓解后的市场供给严重过剩。致远航运洛杉矶总代表章华峰指出，市场在短短两年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前段（船舶、箱子）和后段的资源（车架、拖车、仓库）从紧缺变过剩，

随着在建船集中交付，船舶的过剩将更为严重。

克拉克森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闲置集装箱运力占总运力比达到6%，大量船舶漂在东亚地区海上锚地，等待货源；而与此同时，前两年行业景气时期航运公司大量订造的新船也即将下水。目前，航运公司订造的新船规模与现有船队比约达30%，2023年到2024年将是这些新船的集中下水交付期。

供给端严重过剩，贸易界重获买方价格谈判优势，集装箱航运业似乎只能在周期魔咒中轮回。达飞轮船（中国）原副总裁郭绍海告诉财新，疫情后航运业格局也在巨变，在2016年前后航运低迷期形成的航运联盟框架正走向分化，联盟处于分化重组的微妙期，航运市场的不确定性更大。

外部需求走弱

国际局势影响，叠加疫情时转移到中国的生产订单有所回流，许多贸易商都感觉到了中国外贸出口的阵阵寒意。一名德迅物流人士对财新称，2022年四季度中国出口运输需求比较低迷，而2023年初出口贸易形势可类比2020年2月疫情刚暴发、中国工厂尚未复工复产时期，后续复苏情况尚待观察。

3月7日公布的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前两个月，中国一般贸易出口总值为3243亿美元，同比下降4.8%。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分析称，全球贸易互联互通，与中国出口高度相关的韩国出口情况同样不乐观，2023年1至2月，韩国以美元计算的出口金额同比分别下降16.6%、7.5%。

一名贸易行业资深人士表示，1月，亚洲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18个经济体对美国出口集装箱量同比大降20%。依观察的情况来看，2月的数据也偏悲观。从总金额来看，亚洲各国中，中国的下降比例更大。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总值为715.7亿美元，同比下降21.8%。

亚洲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基地，美国和欧洲是商品的主要消费地。“亚洲发往主要消费地货量增减，基本代表世界贸易形势。”郭绍海称。

影响美国进口需求的因素仍是高企的库存。据财新了解，自2022年5月开始，美国各大零售商公布一季度季报时，纷纷表示库存与2021年同期相比增加30%至40%，由此结束了长达半年多的无差别“补库存”，转向“去库存”。

美国普查局（USCB）数据显示，2022年12月，美国零售库额与销售额（库销比）为1.26，比2022年5月的1.22稍有上涨。但在零售商“补库存”启动的2021年10月，这一比例曾下降到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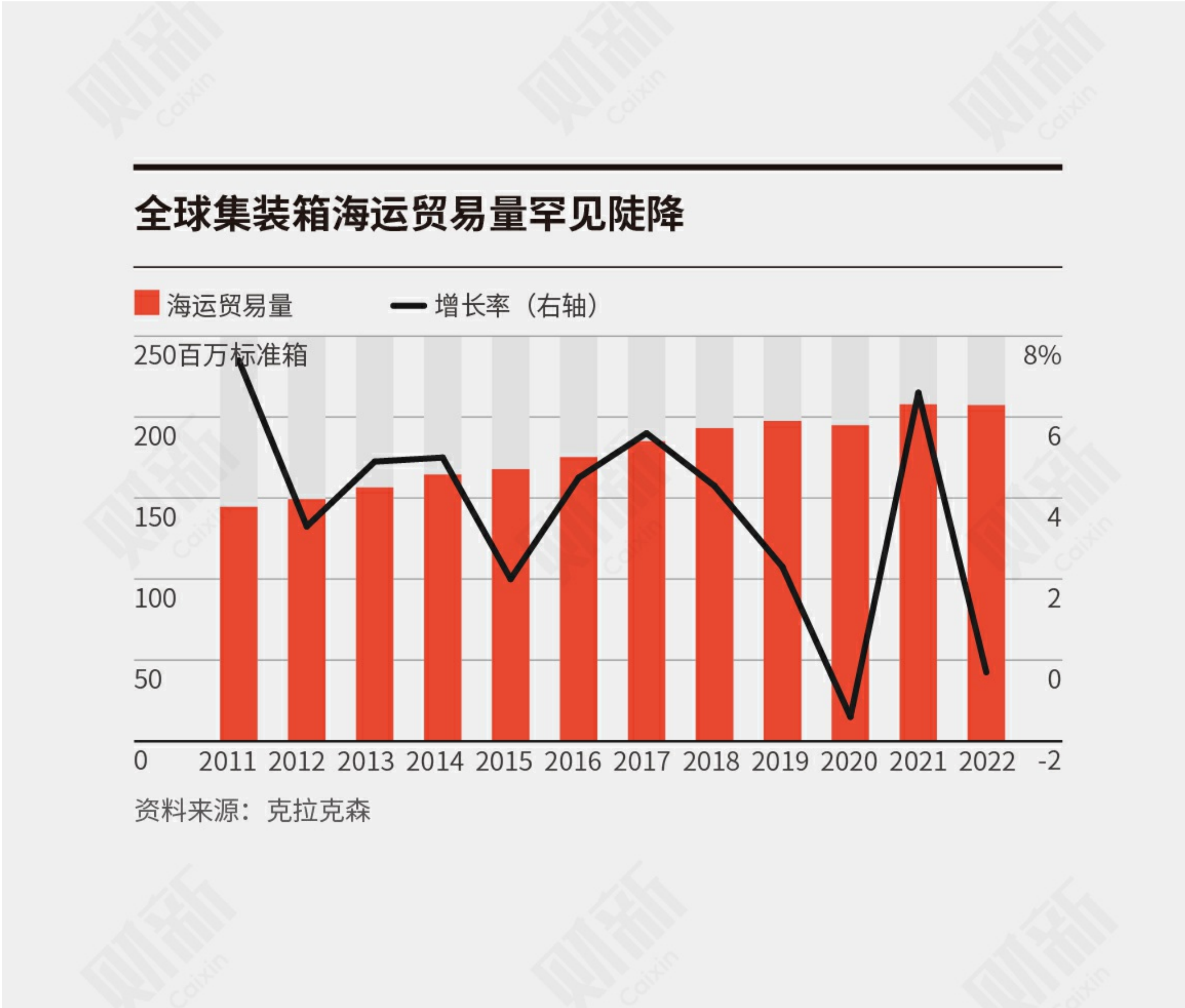
1.26的库销比，相较疫情前1.5的水平也并非高位。一名上海交通大学航运研究员称，美国工资与通胀螺旋式上升犹存，失业率降至历史低点，美联储加息未尽，高利率、高通货膨胀环境在影响企业库存投资。航运咨询机构Alphaliner数据显示，2022年下半年开始，亚洲东亚地区发往美国的集装箱货量骤减，三季度同比下降10.3%、四季度降幅扩大到23.4%。

相比美国的高库存，欧洲需求同时受俄乌冲突、能源价格高涨等因素影响而不振。2022年四个季度，东亚发往欧洲地区的货量降幅持续扩大，分别下降0.8%、8.2%、9.4%和20%。2023年以来，欧洲疲软的经济继续影响进口需求，前两个月中国对欧盟出口商品总值801.0亿美元，同比下降12.2%，其中对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出口总值为159.4亿美元，同比下降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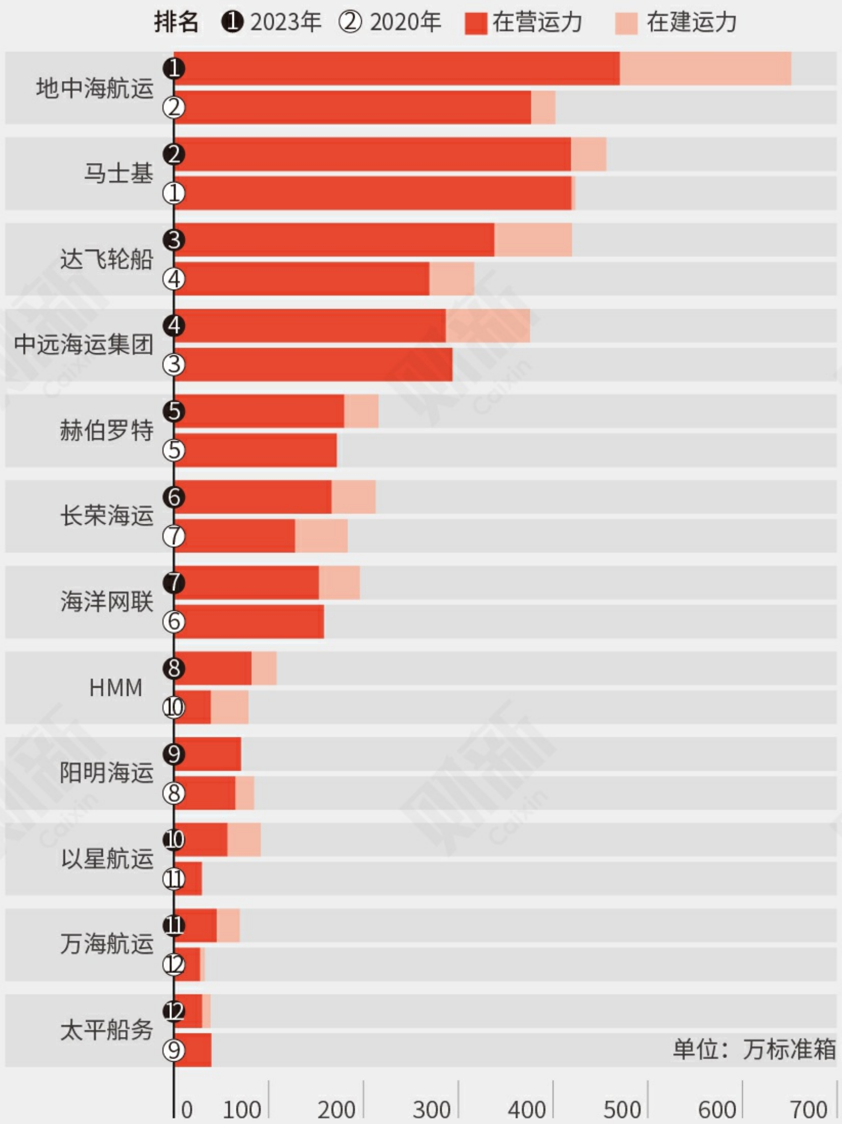
全球贸易前景并非一片悲观，在经历连续两个月环比下跌后，1月美国零售额强势反弹，环比增长3%，录得2021年3月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信息提供商IHS Markit前首席经济学家Nariman Behravesh称，消费者支出等关键因素证明比人们普遍预期的更具弹性。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首席信息官徐凯对2023年全球贸易需求持积极观点。据他观察，国际的动荡局势不会再加剧，生产活动会加速恢复，抑制消费需求的通胀加息不可持续，而欧美的高库存也将逐渐消耗，出口贸易将在结构性变化中稳健攀升。

“相较2022年下半年，2023年的海运市场将会稳中向好。”吴迪对三季度的传统出口海运旺季抱有一些期待。他认为，这一时间窗口发出的货品是为满足圣诞季消费需求，部分海运长协价格的到期也有利于需求恢复。


全球集装箱海运贸易量罕见陡降
海运贸易量
增长率（右轴）
250百万标准箱
200
150
100
50
0
8%
6
4
2
0
-2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资料来源：克拉克森

航运公司运力规模快速扩张



注：2020年数据截至1月初，2023年数据截至3月初
资料来源：Alphaliner

供应链上游贸易已经出现好转迹象。多名货代人士告诉财新称，近期中国北方港口基础原材料和半成品等供应链上游货量已经开始恢复，货物主要出口到东南亚、东欧、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地，供应链上游需求会逐渐向下游传导。

阿里国际站已感知到供应链下游订单的恢复。该站数据显示，2月以来，海外订单需求量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进入每年3月的外贸旺季，回暖趋势在延续。在阿里国际站“三月新贸节”首日，其海外订单需求量同比增长30%。阿里国际站告诉财新，新能源、建材和汽车配件，是海外订单增速最快的三大品类。其中，新能源的海外订单需求量同比增长达到166%。

阿里国际站认为，近年新能源、机械、建材、汽车配件这些行业，在该平台上的出口势头很猛，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外贸出口正逐渐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受益于海外防疫政策放开，旅游相关商品订单较为旺盛。广州盛依隆厨房设备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胡丁元对财新称，公司很多客户来源于酒店、餐厅，与餐饮、旅游业挂钩，业务自2022年开始回温，预期2023年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3月、全年订单量同比增长20%。佛山市歌谷电器总经理关小冰也告诉财新，公司主要向澳大利亚和美国出口户外用品，每个月出口量在10到20个集装箱，2023年前两个月的外贸订单较为稳定，跟2022年四季度相比已有起色。

即便如此，外部需求可能不会如2020年般的大落大起。头部航运公司马士基在发布2022年业绩时表示，考虑到需求端库存调整将在2023年上半年完成，并达到需求更为平衡的状态，预计2023年全球海运集装箱市场增长将在-2.5%至+0.5%之间。

运力严重过剩

船舶是传统航运公司的核心资产，扩大船队规模是巨头拓宽拓深“护城河”的重要方式。有一轮景气周期的丰厚利润打底，一些航运公司仍在运价低迷的逆势下造船。

全球第三大集装箱航运公司达飞轮船在2月初与韩国船厂签订合约，订造12艘1.3万标准箱甲醇双动力船，合同金额约20.56亿美元，计划交船期为2025年至2026年。随后，前身为现代商船的HMM也一举订造9艘9000标准箱甲醇双动力船，总造价11.19亿美元，新船计划交船期在2025年到2026年。中国台湾阳明海运也在跟随订造新船，据韩国媒体报道，其已接近签订5艘1.5万标准箱船的合约。

多名市场人士向财新表示，主流航运公司持续订造双燃料大型集装箱船，这一领域正在重现2015年至2016年期间的运力竞赛。

订单数据显示，当前扩张的“领头羊”是地中海航运，其新船订造规模高达181万标准箱，其次是中远海控（601919.SH/01919.HK）的89万标准箱、法国达飞轮船的82万标准箱。而全球在建集装箱船总规模为758万标准箱，与现有运力比值超过28%，这些新船大部分都会在2025年之前下水。

中信期货一名航运研究员对财新称，按照现有船舶订单推算，2023年和2024年将分别交付243万、285万标准箱的新船运力，考虑部分船舶交付推迟及老旧船舶拆解，实际每年运力规模增长超过7%。未来两年运力严重过剩难以避免，市场将深陷周期魔咒。

吴迪认为，主流航运公司将以近两年订造的大船形成更大的规模效应，迎接未来几年可能到来的价格战。在经历疫情下运价高峰以后，航运公司再度面临需求低、市场低运价的困境，以大船的规模效益降低运营成本成为这些公司的长期战略，尤其是欧线和美线等长距离航线。比如，在东亚到欧洲航线上，2万标准箱比1万标准箱的单箱海运成本低30%—40%，规模效应显著。

一些市场人士担忧，市场进入长时间低迷后，可能再现如2016年韩进海运破产的极端事件。韩进当时是全球第八大集装箱航运公司，在北美航线有较高的市场地位。

一名资深金融人士告诉财新，经历疫情供应链中断等困境，各国政府深刻意识到航运作为基础设施的重要性，2020年新加坡淡马锡出手救助陷入危机的太平船务、法国当局也在疫情初期为达飞轮船输血。

韩进海运倒下之后，韩国开发银行接管HMM并支持其订造大型集装箱船，使得这家持续亏损约十年的航运公司进入THE联盟。HMM目前是全球第八大集装箱航运公司，在疫情下的超级行情中，该公司走出了困境。韩国开发银行日前宣布，HMM已经改善了财务结构并扩张了业务网络，足以脱离国家支持。

前两年市场高涨期取得的巨量超额利润，是主流班轮公司持续扩张的底气。2021年，集装箱航运前十大公布业绩公司净赚约1000亿美元。2022年，受益于长期协议费率的大幅上涨，前三季度十大公司净赚约1050亿美元，市场普遍预期全年这一数字将超过1200亿美元。

中信期货航运研究员称，2023年初，全球前四大集装箱航运公司的市场份额达57%，而前十大集装箱航运公司的市场份额为85%，主流班轮公司取得的高额利润将导致未来市场权力更加集中，这不但将令行业壁垒更高，也使

得航运公司相对货主而言有更高的市场议价权，运价随需求波动的弹性增强。

挤出新玩家

“目前，东亚到欧洲、北美贸易航线船舶的舱位利用率平均只能达到七成。”一名集装箱航运公司的人士对财新透露，“舱位利用率达到90%是行业的长期目标，利用率持续偏低叠加运价低迷，一些运力就会撤出。”

航运公司已从主要贸易干线撤出大规模运力。2022年12月，全球最繁忙的四大贸易航线的运力分别下降12%—18%。Alphaliner数据显示，今年2月初，航运公司每周配置在东亚至北美航线上的运力已较2022年高点大降20%，配置在东亚至欧洲航线上的运力减少约5%。

在撤出运力之外，船舶班期的暂时取消——停航减船——也成为集装箱航运公司提高舱位利用率、阻止运价下跌的重要办法。

不过，一些市场数据分析公司称，这些措施并未有效解决运力过剩的问题。一名上海航运交易所研究员认为，供应链拥堵缓解叠加新船交付，2022年底有效运力同比增加超过20%，就算不考虑新造船因素，目前的运力撤出计划仍不足以抵消运力的实际增长。

郭绍海称，当前市场运价下，自有运力占比高的集装箱航运公司仍是赚钱的，它们减少运力、恢复供需平衡的动力不足。

徐凯认为，传统航运公司目前没有大幅封存自营运力，会将高运价吸引进来的新玩家挤出去，未来行业头部垄断优势更为显著，对运价长期走势形成一定支撑。容易船期数据显示，2021年进入欧美贸易干线的新玩家主要包括与阿里巴巴紧密相关的致远航运、有货运代理背景的中联航运以及背靠航运电子商务平台乐舱网的博亚海运等。

相比传统航运公司，这些公司在疫情下获取运力的成本高昂，运价一旦大跌，将会大幅亏损。一名接近北美航线的人士称，租船运营航线的成本太高，美西线40英尺集装箱运费低于3500至5000美元可能就会导致亏损。但实际情况是，当前上海到洛杉矶的40英尺集装箱运价正跌向1000美元。

疫情下雄心勃勃的中联航运已在收缩，该公司在2022年12月提前解除与民营集运公司安通控股（600179.SH）的三年期合作协议，并赔付后者4.7亿元违约金。

以星航运则在今年2月中旬宣布，美西线服务ZEX将无限期停航。容易船期称，ZEX是以星航运的王牌电商航线服务，从2020年6月开航，因快捷、准时和合适的截关开船时间受到市场青睐，曾是美线里的“高光”航线。此外，以星航运也撤出了2021年开航的美西线服务ZX2和ZX3。

自本世纪初陷入债务危机后，以星航运以轻资产方式运营，目前该公司运营船舶运力56万标准箱，其中95%运力来自租赁。

联盟格局将变

为了持续推动船舶大型化并实现规模效益，集装箱航运公司传统上通过结盟保证舱位利用率。从规模经济角度来说，航运公司可以通过联盟减少运力投放、提高装载率、降低操作成本。

受需求下降、行业运力排名变化等因素催化，全球最大的航运联盟2M联盟已经率先解体，现有的航运联盟框架即将发生深刻变化。

2023年1月25日，全球排名前二的地中海航运与马士基宣布于2025年终止双方联盟合作（2M联盟）。自2015年签订舱位共享协议（VSA）以来，地中海航运与马士基航运主要在亚欧、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航线上通过共同派遣船舶、共用物流场站等方式实现了较为密切的合作。

2M联盟宣布解体只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航运咨询机构Vespucci Maritime首席执行官Lars Jensen日前在一次大型行业会议上称，这可能导致达飞轮船、中远海控以及长荣海运（2603.TW）组成的海洋联盟解体。

目前全球前九大航运公司通过签署VSA组成了三大航运联盟，除了2M联盟和海洋联盟，还有赫伯罗特、海洋网联、HMM和阳明海运（2609.TW）组成的THE联盟。三大航运联盟均在韩进海运走向破产的2016年前后成立，海洋联盟合约期至2027年，THE联盟合约期至2030年。Alphaliner数据显示，目前，三大联盟控制全球约五分之四的集装箱运力。

对于2M联盟的解散，行业早有预期。章华峰认为，联盟协议签署是在当时低迷的市场环境下，地中海航运和马士基合作的意愿强烈。但时隔七年，航运市场形势巨变；更重要的是，双方的市场策略和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航运咨询机构德路里称，一段时间以来，这两家公司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地中海航运的运力规模保持年化8%的增速，并于2022年初超过了马士基，成为全球最大集装箱海运公司；而马士基则坚持“集大成者”策略，

着力于打通物流上下游，并没有追求运力第一的位置。

目前，马士基船队运力规模约420万标准箱，在建船规模为37万标准箱；地中海航运船队运力规模约为460万标准箱，并有180万标准箱新船在建设之中。

市场人士多认为，2M联盟解散的背后，是因为到2025年，地中海航运订造的新船大部分交付，其更愿意独立运营，以按照自身意愿部署航线，或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可以快速调整运力。

行业人士也认为，马士基打通物流上下游的前提和根本是海上航线，失去了这一支撑，也将失去打造大物流战略的核心优势。郭绍海认为，马士基可能通过更多航运公司形成松散的VSA，但这仅能成为一种过渡期选择，新的联盟框架将逐渐形成。

郭绍海回忆称，地中海航运、马士基和达飞轮船曾在2013年宣布拟构建P3联盟，并在新加坡和伦敦构建运营中心。因为这三家欧洲公司当时的总运力占了全球的37%，也引起了各个主要国家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虽然P3得到了欧盟和美国的批准，但中国商务部认为该运营模式涉嫌垄断，在2014年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郭绍海称，P3联盟计划流产后，马士基与地中海航运随即宣布成立2M联盟。达飞轮船因先前与中海集运的合作渊源及中国业务的高占比，立即选择与中海集运合作，组成海洋联盟的基本框架。

达飞轮船的总部在法国马赛，在运营理念上比较类似总部在丹麦的马士基，也在持续布局物流上下游，旗下物流业务分支CEVA Logistics的规模在不断扩张。同时，达飞轮船也与马士基相随订造以甲醇为动力的大型集装箱船，规模均为18艘，大型船舶总运力规模也正在接近马士基。

行业资深人士指出，中远海控也在布局大物流，同时订造12艘可以使用甲醇燃料的大型集装箱船，航运公司还需要通过广泛的VSA“试婚”，再逐渐形成新的联盟框架。

Lars Jensen认为，与当下三大联盟内部紧密结构相比，航运公司可能接受的新组合是一种相对非正式的关系，部分原因是监管审查力度加大。“新一轮联盟重组可能不会导致大型航运公司之间的并购潮，但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赫伯罗特和总部在新加坡的海洋网联，可能会重新考虑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将影响THE联盟的稳定性。”他说。

市场人士多认为，正是航运联盟处于分化重组的微妙时刻，使得航运市场波诡云谲，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章华峰认为，市场需要恢复正常的秩序，比如航运回归微利市场，成本控制是关键，而影响成本的一大因素是舱位利用率。市场份额意味着定价权，下一步，如果庞大的地中海航运不能保证舱位利用率，整个市场会一起“挨饿”。因此，地中海航运将变成市场即期价的风向标，不管市场是变淡还是变旺。

空箱过剩待解

运力过剩将如何发展，全球航运的格局将如何变化，目前尚不明朗，但集装箱制造公司的产能过剩影响已率先显现。吴迪称，2月初数据显示，全球港口端空箱堆积量超过500万标准箱，约是疫情前春节前后期间的近2倍。

中国出口重箱远大于进口重箱，过去常态下，为维持集装箱平衡，每月需要海运调进空箱300万标准箱，同时通过国内造箱实现集装箱供需平衡，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贾大山此前如此公开解释称。在集装箱海运淡季，中国发运货量减少，调空回来的集装箱仍在正常安排，会造成淡季港口积压空箱。

一名大型货代人士告诉财新，2022年四季度以来，空箱回流量总体高于重箱出口量，因此导致中国主要集装箱枢纽港普遍存在空箱堆存压力。

从疫情下“一箱难求”到现在“空箱堆积”，航运市场出现新的“箱愁”。全球集装箱交易平台Container xChange数据显示，2023年第2周（1月2日至8日），上海港的40英尺集装箱CAx（集装箱可用指数）达到0.66，此后几周均维持在0.64的高位。CAx指数可以量化全球主要港口的集装箱可用性。当CAx的数值大于0.5时，表示集装箱设备有剩余，而低于0.5时则表示设备不足。在2020年11月到2021年12月“一箱难求”时期，该指数曾多次低于0.1。

除了外贸需求问题，集装箱本身的制造过剩，也是导致空箱堆积的重要原因。

德鲁里数据显示，在狂热的集装箱海运行情下，2021年全球生产了超过700万标准箱的集装箱，是常规年份的约3倍，2022年全球新造箱量仍高达377万标准箱。咨询机构World Cargo数据显示，2015年到2019年，全球集装箱产量分别为265万、203万、342万、408万和230万标准箱，低于300万标准箱是常态。

除了造新箱，在狂热的市场氛围中，破损的集装箱经修理继续使用——这使得每年3%—5%老旧集装箱拆解也向后拖延，全球可用于运输的集装箱量大幅扩张。英国咨询机构Harrison Consulting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球集装箱总规模约为5400万标准箱，较疫情暴发初期多1000万标准箱。

2022年以来集装箱周转加快，德鲁里估计，因当时航运拥堵，2021年每个集装箱平均升降18.1次；而2020年为19.2次，2010年以来，平均周转数值介于19.5到20.6次之间；预计2023年集装箱平均升降次数将恢复至疫情前十年间的平均水平。

航运业正在面临集装箱的“流动性过剩”，航运公司与箱厂需要共同面对去库存问题。一名大型集装箱制造厂工作人员称，2021年四季度以来，客户用新箱需求下降、提箱速度逐渐放缓，其所在工厂新箱库存开始增加，其他造箱厂的库存也在不断增加。

集装箱租赁公司Textainer在发布2022年四季度业绩报告时预估，2022年底全球箱厂干货箱库存量超过110万标准箱，在2020年底中国出口用箱紧张时期，这一数据曾跌至略超过10万标准箱。

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牧原在2022年年中时撰文称，中国主要造箱集团的新箱库存在44万标准箱是供需平衡的健康水平，如2020年出口货量激增，到11月新箱库存降至15万标准箱，市场箱源紧张；如果新箱库存达到88万标准箱,则反映了中国出口市场放缓。而2022年4月底，新箱库存已接近88万标准箱的预警线。

集装箱制造厂先接订单，再做生产安排。德鲁里预计，2023年将是有史以来最差的年份之一，全球新箱订单约在70万标准箱。一些产线停产难以避免，Textainer在业绩报告中称，由于需求降低，集装箱产量已经显著缩减，预计许多箱厂将在2023年一季度继续关闭。一名集装箱租赁企业人士称，没有停产的箱厂目前主要在生产冷藏箱、特种集装箱等，也在继续生产普通干货箱，产量大幅下降。

产量下降只能减少未来增量，面对时下空箱过剩“后遗症”，航运公司需要考虑如何低成本、高效率运营集装箱业务。某航运公司箱管人员称，集装箱基本为航运公司自有或租赁资产，市场回归常态后，航运公司背负的集装箱成本将影响企业盈利。

目前，航运公司仍寄望通过吸引货量让集装箱流转起来。一名美线货代告诉财新，一些航运公司近期报出美国目的港30天（自然日）免费用箱期，吸引客户。疫情前，航运公司一般给客户7到10天免费用箱期，给超大客户21天。疫情后缺箱严重时期，航运公司为提高集装箱的周转率，大幅削减免费用箱天数，一般5天是标配，10天属于比较特殊情况。

出口用箱需求不足，是当前空箱过剩的核心症结。在全球贸易增速较低的背景下，集装箱过剩的问题难以快速缓解。一名堆场运营商告诉财新，堆场需要利用空间来解决用箱时间错配问题，枢纽港码头和邻近堆场存在消化压力，则可将空箱流转到用箱需求较大的支线港口、长江区域港口以及内陆港等。

屈运栩、陈亮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刘潇

最新财新周刊｜移动通信寻找新大陆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消费电子市场全线萎缩，5G投资回报不明，中国移动通信厂商在增长停滞期挖掘新市场、新动能

文丨财新周刊 张而弛 发自西班牙巴塞罗那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海边，矗立着一座高60米的哥伦布纪念碑。1493年，哥伦布第一次从美洲归来，就是在这里登陆，向欧洲人宣告了发现新大陆的消息。

在离这座纪念碑不远的巴塞罗那会展中心，2023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下称"巴展"）照常在2月底开幕、3月初闭幕。作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风向标，巴展在2020年因新冠疫情被迫取消，2021年又遭推迟，2022年初恢复线下，参会人数仅6万多，只有疫情前的一半。今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均放松了出入境管制，展会也不再要求查看疫苗或核酸记录，参会人数增至近9万。此时，距离2019年全球5G商用已过去四年，但来到现场的与会者仍渴望寻找一个答案：移动通信的"新大陆"在哪里？

"下一步是什么？"3月1日，在巴展的一场论坛上，瑞典电信设备厂商爱立信的5G RAN产品线负责人Sibel Tombaz说，会展上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疫情催生的居家办公大潮曾给消费电子行业注入一剂强心针，现在却无力带动更多销售。受俄乌冲突、全球通货膨胀等影响，几乎所有消费电子品类都呈现萎缩态势。市场研究机构IDC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减少11.3%，至12.1亿台，为2013年以来最低；全年个人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出货量为4.57亿台，同比减少11.9%；手表等可穿戴设备出货量为4.92亿台，同比减少7.7%，是该品类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下滑。

2023年同样不乐观。IDC预计，今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还将减少1.1%，跌至12亿台以下；个人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出货量将减少11.2%，至4.03亿台。

疫情前，人们曾寄望5G能迅速带来万物互联的智能社会。但截至2022年底，全球5G连接数超过10亿，但新建的5G网络却并未催生太多新终端业态和商业应用，导致电信运营商继续投资的动力不足。爱立信中国区技术部总经理王浩博向财新介绍称，截至今年1月，全球已有243个运营商开启5G商用网络，其中仅32个采用独立组网，其他都是非独立组网，即通过升级4G的无线网络实现提速，而不组建新的核心网，也就无法提供完整的5G体验。

"32个独立5G网络，连243个的零头都不到。"王浩博认为，这说明绝大多数运营商看不到5G明确的商业回报，投资谨慎。"升级核心网络是一个复杂过程，而且'开弓没有回头箭'，投资成本要考虑回报问题。"

运营商踟蹰不前，迫使设备商跟着过"紧日子"。2月24日，为削减成本，爱立信宣布将在全球分阶段裁员8500人，约为全球员工总数的8%。

诺基亚和华为则更看重5G专利费的增收。2月26日，诺基亚在巴展前公布全新的公司战略，在移动设备之外的行业寻找IP（知识产权）变现机会，成为其六大核心战略之一。目前，诺基亚正与中国手机厂商OPPO在德国、印度、巴西等国大打专利战，借此搏取更多专利收入。

华为与小米之间的专利纠纷也在升级。2月2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受理华为与小米之间的专利侵权纠纷。一名熟悉该纠纷的知识产权律师告诉财新，华为希望对小米出售的每台5G手机收取专利许可费，而小米认为华为一揽子专利许可协议包含范围过广，双方在价格上谈不拢。

移动通信市场暂时进入停滞期，企业各寻出路。中国的终端厂商一边用XR（扩展现实）设备试探消费市场，一边加速"出海"寻找新用户；而华为和小米更是另辟蹊径，冲入一个更大的移动终端市场——智能汽车。难以承受未来踏空风险的运营商、设备商和芯片厂商，仍在竞逐技术制高点。它们开始描绘5.5G的蓝图，寄望通过把5G网速再提升10倍，以促动新应用加快成熟。

到欧洲去

2月27日下午，荣耀巴展发布会会场座无虚席，连两边过道都站满了人。这是2020年底荣耀从华为独立分拆之后，第二次在巴展发布旗舰手机。

"2021年，我们大概用六个月的时间迅速回归中国市场；2022年是荣耀海外市场元年；2023年，我定义为荣耀在欧洲市场真正的元年。"荣耀CEO赵明在发布会后向财新表示，今年将重点发力欧洲运营商渠道等方向，以实现在欧洲市场份额翻番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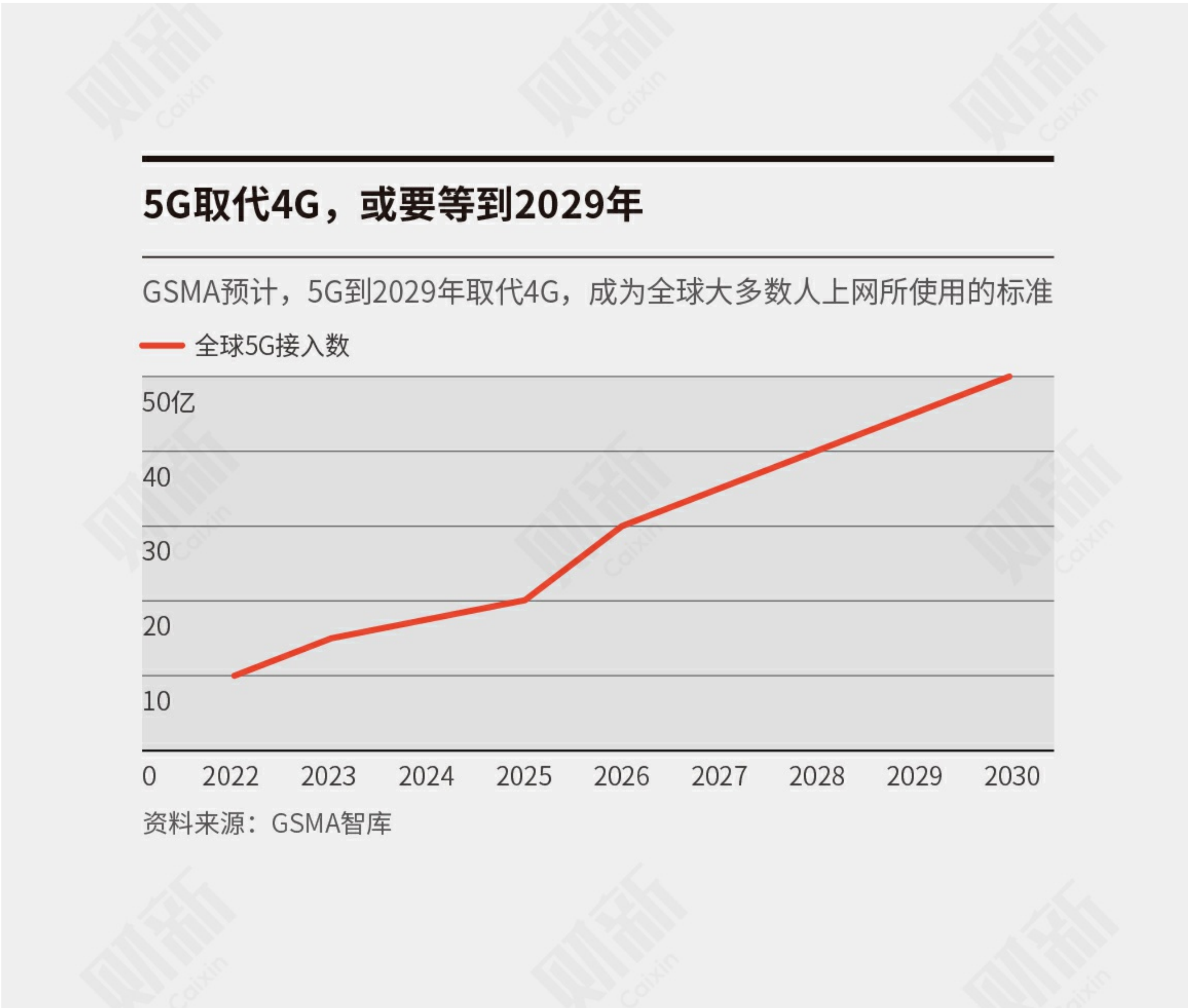
与荣耀一起来到欧洲舞台的，还有众多竞争对手。2月26日，小米在巴展开幕前向海外市场发布了小米13系列手机，新上任的小米总裁卢伟冰、手机部总裁曾学忠均到现场站台。2月28日，首次参加巴展的传音手机（TECNO）也在会场发布了折叠屏手机Phantom V Fold，该款手机将于今年上半年上市，率先在印度发售。

联想集团展出了研发多年的摩托罗拉卷轴屏原型机，一按按键，屏幕就可以从5英寸展开至6.5英寸。不过，摩托罗拉移动的工程执行总监Mohammed Abdul-Gaffoor告诉财新，这款产品还在测试阶段，没有上市时间表。

“中国手机厂商来势汹汹，他们离开（巴展）那么多年，今年想给所有人都留下好印象。”IDC亚太区副总裁马柏远告诉财新，他对今年展会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中国手机厂商的回归。

2019年，华为手机曾在西欧拿到约20%的市场份额，与苹果、三星呈三足鼎立之势。但美国制裁导致华为手机无法继续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等美国软件，市场份额一落千丈。此次巴展，华为没有再举办手机发布会，而是将今年手机发布的时间定在3月中下旬，地点位于国内。

华为手机当年的成功，为后续到来的中国厂商树立了榜样。中国手机厂商来到欧洲，目标都是树立高端形象，此次巴展发布会几乎全体聚焦旗舰机和折叠屏。赵明对此解释称，这是欧洲电信运营商的需求，苹果在欧洲高端手机市场占据了约80%的份额，但在采用新技术上不够激进，运营商希望安卓手机可以充当挑战者的角色；中国手机厂商也一直渴望向高端市场晋级，因为中低端市场极易被绞杀，对手只要利用在高端市场上赚取的利润，压低价格竞争，很容易就把中低端厂商挤出市场。





不过，知名度仍是中国企业的软肋。居住在德国慕尼黑、芯片行业人士Kerstin Deixler告诉财新，她从未听说过OPPO这个品牌，荣耀也是今年在巴展上第一次见到，觉得荣耀的展台设计风格跟苹果很像。她比较熟悉的中国手机品牌是小米，自己家里用的真空吸尘器就是小米的。但她惊讶于中国厂商生产折叠屏手机的能力："我之前不认为折叠屏可以如此普及，而现在几乎每家手机厂商都有。"

中国厂商也不乏自己的拥趸。2月25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入境时，一名海关官员主动向财新自豪地展示了自己的OPPO一加手机。

消费者的印象与中国手机品牌在欧洲的影响力大致相符。IDC数据显示，2022年，苹果占有西欧35%的市场份额，三星占34%，小米占14%，OPPO约5%，荣耀仅有0.4%的份额、排名第13。

为打开欧洲市场，中国手机厂商纷纷效仿华为，寻求与传统欧洲品牌合作。2022年，小米从华为手中接下了德国相机品牌徕卡的合作，为其摄影能力背书；OPPO也在同年与瑞典相机品牌哈苏达成三年合作协议，并开始赞助顶级足球赛事欧洲冠军联赛；荣耀在今年发布会上请来了法国评测机构Dxomark，给其屏幕和摄影能力打出高分。

然而此时"出海"欧洲，并无"天时地利人和"相配合。马柏远指出，西欧手机市场今年出货量将同比减少7.4%，远大于全球和中国1.1%的萎缩幅度，中国手机厂商想要在欧洲树立高端形象，仍要久久为功。不过他认为，在无法打入美国市场的背景下，中国手机厂商在欧洲展示高端形象，同样有助于在发展中国家销售中低端手机。

巴展主办方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认为，5G下一步的拓展机会在发展中国家。GSMA预计，2023年，将有超过30个国家开始部署5G网络，主要在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等新兴市场。今年，全球5G连接数将增加50%至15亿，并在2025年底前增至20亿。其中，印度将在未来三年增加1.45亿5G用户，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5G普及率也将从目前的低于1%增至2025年的4%。

"到目前为止，5G一直由相对成熟的市场和消费者推动落地，但这在变化，我们正进入5G的第二波发展浪潮。"GSMA智库主管Peter Jarich表示，移动通信厂商需要准备好应对新市场和新需求的挑战。

寻找新终端

巴展拉开了各家终端厂商春季新品上市的序幕，整个3月，各种手机发布会此起彼伏。3月6日，荣耀在上海举办发布会，向国内市场发布了Magic5系列手机。3月7日，一加也发布了新手机。当晚，苹果推出了黄色配色的iPhone 14与iPhone 14 Plus，以及四款硅胶保护壳，分别为淡黄色、橄榄色、晴空蓝色和鸢尾花色。

智能手机已进入微创新阶段，很难再抛出让消费者眼前一亮的新技术。中国手机厂商蜂拥推出的折叠屏手机是少数还能高速增长的细分市场。IDC预测，2023年，全球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将达到2200万台，同比增长50%。

2021年，元宇宙概念爆火，行业曾期望，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结合的XR设备可以在5G时代接棒手机，成为下一代移动终端。

过去半年，VR行业遭遇逆风。2022年11月，Meta宣布裁员13%、涉及超过1.1万人——这是其前身Facebook 2004年成立以来的首次大规模裁员。Meta曾对元宇宙下重注，大力推广VR头戴设备。但财报显示，2022年四季度，Meta的VR/AR业务收入为7.27亿美元，同比下降17.1%，亏损42.79亿美元，同比扩大29.5%。

字节跳动在2021年以近100亿元收购中国第一大VR硬件厂商Pico（小鸟看看），并在2022年倾集团之力推广。Pico 2022年销量、产品使用率不及预期。今年年初，Pico团队也迎来了裁员和销售目标下调。"VR有自己的专有市场，难以成为大平台，大公司豪赌VR就是水中捞月。"一名国内AR初创企业负责人如此评论字节跳动的这一挫败。

"在经历了近一年的话题热议期后，AR/VR行业于2022年底回归理性。厂商如何实现盈利、用户粘性如何增强、内容生态如何丰富等更现实的考量，成为各方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IDC中国终端系统研究部高级分析师赵思泉表示。

进展不利并不意味着全然放弃，行业对XR领域的布局仍在继续。在今年巴展，VR厂商HTC发布了面向企业的软件产品VIVERSE for Business，能让企业创建员工虚拟协作空间。小米也在巴展发布了无线AR眼镜探索版，可与手机无线配对，整机重量降至126克。小米创始人雷军在微信公众号上列举了AR眼镜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包括需要减轻重量以提升佩戴舒适性，改善显示让人眼感觉不到颗粒感，如何设计新一代手势交互等，并提出了小米的方案。不过，小米并未透露该产品的上市时间和价格。

3月6日，荣耀在上海发布了2499元的观影眼镜，通过有线连接手机、平板或电脑，可以将内容投射到眼镜内的屏幕上，属于入门级VR产品。

"未来AR和VR的能力，荣耀一直在储备。"赵明称，自己从2011年起就认可AR和VR的方向，只是今天业内所有解决方案还满足不了消费者对产品体验的要求，只能期待未来有品牌可以实现突破，激活这个市场。

在XR行业，软硬件一体的苹果被认为是惟一有能力启动市场的公司，但其XR设备也因不断遭遇技术难题，过去几年反复落空上市时间表。2月，跟踪苹果多年的天风证券分析师郭明錤预测，苹果有可能在2023年发布首代XR设备，不过可能因为定价较高，今年出货量或低于50万台。

XR市场一时难以启动，不少移动终端厂商已经转向正在蓬勃发展的、由新能源驱动的智能汽车市场。但作为移动通信展会的巴展，未能在本届迎来汽车品类的强势入驻，显示行业变局仍在酝酿之中，节点微妙。

尽管华为派出了有史以来最声势浩大的巴展团队，但终端业务CEO余承东却没有现身，他在2月18日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称，自己现在40%的时间都花在汽车业务上，包括所有的晚上、周末、节假日等业余时间。2022年，华为与赛力斯（601127.SH）合作的AITO问界系列汽车累计销量超7.5万辆，总算在市场站稳脚跟。2023年，华为计划与更多车企合作，包括江淮汽车（600418.SH）和奇瑞汽车，扩大生产，打造一个由华为主导的生态品牌联盟。

"通过华为主导，我们能把方案拉通，比如多个厂商共用一套电池包，电机、布置、座舱、智能驾驶方案等都可以拉通，减少重复定制的成本，大幅提升效率，提升单产品的产量。"余承东表示。

雷军则在3月5日的全国"两会"上透露，小米的第一款汽车已经完成冬季测试，预计2024年上半年量产。小米管理层曾在财报会上介绍称，2022年前三季度，小米在智能电动车等领域的投入已达18亿元，汽车业务研发团队超1800人。

造车多年的苹果近期加速了车辆测试。美国加州车辆管理局（DMV）报告显示，2021年12月至2022年11月，苹果在加州共登记测试车辆69辆，总测试里程达到12.51万英里；而上年同期，苹果的测试车辆为37辆，总测试里程为1.33万英里。

新一轮移动通信行业的“军备竞赛”已经启动。余承东认为，全球汽车行业即将迎来大洗牌，很多车企会被兼并或死掉，这个机会窗口期很短，只有未来两三年。一家厂商如果没有抓住机会，以后市场就会跟它无关。

5.5G上路

今年巴展，华为的展台面积达到9000平方米，几乎独占八个场馆中的一个。这既是华为历年参展面积最大，也是所有企业中展台面积最大的。展会期间，华为展台人头攒动，一度连入场所需的参观证都被派完。华为邀请了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运营商，向它们展示自己在5G时代所能提供的各类产品。

华为展示的其中一个案例是，电信运营商沃达丰利用5G切片技术，将约5%的频谱资源专门留给关键业务，即便网络出现拥塞时，这部分资源也不可被抢占，从而为德国一家铁路公司提供专网服务，保证列车状态监控等关键业务数据能实时上报给监控中心。

过去四年，美国政府的层层打压让华为备受挑战。不过，有华为运营商业务人士表示，很多欧洲运营商比较务实，在选择设备商时，还是看谁能带来更好的产品。

另一方面，华为也刻意保持低调，三名轮值董事长都没有在此次巴展亮相，也没有发布新手机，仅由ICT产品与解决方案的八大产品线总裁集体发布了面向全球运营商的产品。

5.5G是华为目前布局的重点。早在2020年11月，华为就提出了5.5G的概念，与5G相比，带宽速度提升10倍、时延降至十分之一、连接密度提升10倍。2021年4月,国际行业标准化组织3GPP正式将其定名为5G-Advanced（增强版），共涉及Release18、Release19、Release20三个通信标准。最先确定的Release18计划在2024年上半年冻结并开始商用，是5G走向6G的中间过渡阶段。

华为ICT产品与解决方案总裁杨超斌认为，5G网络向5.5G升级演进已在全球产业界形成共识，随着联接体验从5G时代的千兆1Gbps走向5.5G时代的万兆10Gbps，10倍网络能力的提升将帮助XR、全息通信等沉浸式业务逐步成熟。

除了网速提升，5.5G将引入全新的Passive IoT（无源物联网）技术，使物联网设备无需使用电源或电池也可以接入网络，从而实现千亿级物联网连接，同时减少能源消耗。华为展示的一个案例是，无源物联网可用于替代现有的RFID（射频识别）技术，进行更高效的仓库管理。现在，很多仓库使用的RFID标签，最高检测距离只有10米，且需要有人拿着扫码枪去一点点扫描，而无源物联网的标签，检测距离高达235米，无需人工参与，可以更快完成仓库内货品的盘点。

2月15日，高通发布了全球首个5G Advanced-ready的调制解调器及射频芯片骁龙X75，可用于智能手机、汽车、工业物联网、固定无线接入（FWA）和5G企业专网等。这意味着，设备厂商已可以购买芯片，为2024年5.5G的落地做准备。

另一家通信设备厂商爱立信在2022年完成了对美国云通信厂商Vonage的收购，交易金额高达62亿美元。爱立信希望将5G的网络能力，比如5G定位能力，以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形式开放给外部的软件开发者，帮助运营商获得新的收入来源。

对全球运营商来说，如何在5G时代提升收入是最紧要的议题。在本届巴展上，中国电信的一名人士告诉财新，在与海外运营商沟通时，对方主要关注中国5G网络如何收回投资成本，比如怎么设计5G资费套餐，如何鼓励4G用户迁移到5G。“现在全世界运营商大多都收入增长乏力，中国运营商虽然还在增长，但主要是靠云业务，而海外运营商已经放弃这一块。”

作为国内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正在改造电信行业最传统的通话业务，希望以“5G新通话”来替代传统语音通话，打造新的收入增长点。这种视频通话不占流量，且具备超低时延、超清画质，屏幕上还可以叠加AI语音识别来完成实时翻译，或用AR技术来呈现各种动画特效。

3月1日，国内芯片厂商紫光展锐在巴展上发布了全球首个5G新通话芯片方案。其技术人员向财新展示，如何通过5G新通话的屏幕共享功能，让年轻人在自己手机上远程教会老人怎么使用一个手机应用。

展锐的技术人员表示，2G时代的网络承载的是文字，3G是图片，4G是视频，而5G更大的带宽可以在视频的基础上传输更多数据，从而开发出更丰富的应用，包括与AI和AR技术结合。

爱立信亚太区首席技术官Magnus Ewerbring也向财新强调，人们在讨论5G投资回报时，应当有更多耐心。GSMA预计，5G要到2029年才会取代4G，成为全球最大的主流接入技术。

Ewerbring认为，网络演进一直是渐进的过程，就像5G Advanced所显示的那样，5G在商用之后，仍会不断有新的标准版本释放，让网络拥有越来越多新的功能，有些功能催生的应用甚至可能会在2030年之后落地，整个过程不

会一蹴而就。

“很多问题可能在出发时，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但当全球5G渗透率从现在的12%再翻2倍到36%时，答案可能会清晰起来。”他表示。

版面编辑：刘潇

最新财新周刊｜高校再布局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从严审批新设本科院校、控制清理异地办学、加码扩容职业教育、梳理塑造办学类型，高校布局规划调整正在多管齐下



2021年9月3日，航拍西北工业大学太仓校区。2022年11月，原本落户苏州太仓，拟容纳在校学生10000人、教职工2500人的西北工业大学太仓校区，悄然更名为了"太仓智汇港"，一期工程竣工一年余，不仅未能拿到教育部批复和本科段招生独立代码，数百亩已完成建设的校园也终难能利用。

文丨财新周刊 王伯文，胡雪扬（实习）

中国职业高校和普通高校的关系面临新一轮调整。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换届之后今年的教育工作要点，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高等教育创新。

职业教育要能够支撑现代制造业发展，科研创新要可以解决卡脖子问题纾困，是近年来政策层对高校施加的主要愿景。前者通过职业院校来承担，后者则更多属于普通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任务。

本届政府履职以来，从2018年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到2022年末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职教改革相关的高规格文件达到五份之多，从中央办公厅此前几乎不参与相关文件起草，到一年半之内，两办连续出台三份政策，可见需求之紧急、迫切。

科研创新层面，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话中，也细数了近年来陆续推出的"中学生英才计划""双一流""基础学科拔尖培养计划""强基计划"等人才体系，要求坚持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加强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后备力量。

据教育部，至2021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按照国际通用指标，已经来到普及化阶段。在4430万人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中，高等职业教育占比36.19%，普通本科占比42.73%；普通本科学校数量1238所（含独立学院），高职（专科）并职业本科学校共1518所。尽管毛入学率尚有提升空间，但高校设置层面，已经提前进入"控量提质"的结构调整中。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60‰。负增长时代开启，教育布局率先而动。从严审批新设本科院校、控制清理异地办学、加码扩容职业教育、梳理塑造办学类型，高校布局规划调整正在多管齐下。

普教设限

与地方可以自行审批的高职院校不同，教育部对本科层次的院校设置一直较为审慎，近期，政策管控愈发严厉。较新表态，见于2021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从严控制高校设置数量；注重优化存量；避免贪大求全、盲目扩张。

多处异地办学已被叫停。2022年11月，原本落户苏州太仓，拟容纳在校学生10000人、教职工2500人的西北工业大学太仓校区，悄然更名为了"太仓智汇港"，一期工程竣工一年余，不仅未能拿到教育部批复和本科段招生独立代码，数百亩已完成建设的校园也终难能利用。

某西工大学生表示，校园内目前空置率很高，他所在的软件学院，原本计划完整迁入江苏太仓，如今只有少部分项目和教师入驻，由于已暂停招生意图，只有本部的部分高年级学生，可以因导师或项目入驻而申请以实习名义

前往。“确实很漂亮，设备和设施也都十分完备”。提到匆匆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太仓校区”，他言语间也难掩遗憾。

作为著名的“国防七子”之一，西北工业大学本部在陕西西安建校办学已超过65年，位列双一流、985工程、211工程，为工信部直属高校。而西安市的另一所名校西安交通大学，也于去年3月公告旗下苏州研究生院，更名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

不止是陕西与江苏，过去的一年公开信息里，西南交通大学清理了青岛、唐山、深圳三地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撤销异地研究院4个，已被纳入《甘肃省“十四五”规划纲要》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兰州学院也面临搁浅，甘肃省教育厅在网络问政中回复，省教育厅分管负责同志和相关业务部门曾专题赴教育部当面沟通，收到“不支持也不鼓励”的明确反馈；后续回复中，当地已向合作创建甘肃科技大学等设想进行努力。

前述《意见》中明确提出，特别严控部委所属高校、中西部高校在东部地区跨省开展异地办学，原则上不审批设立跨省异地校区；省内异地校区，也需严控数量、严把条件；现存高校异地校区，平稳有序、逐步清理规范。

尽管教育部历来在政策文本中不支持高校异地设置，但如此措辞严厉并涉及倒查清理的，并不常见。

这一改变在学界的主要推动者，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卢彩晨向财新表示，高水平大学作为国家战略中的科研创新主力军，通过异地办学“集体东扩”，加入争抢生源的行列，是办学使命的错位。根据他的研究，截至2020年4月底，共53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参与了异地办学，占“双一流”建设高校总数的39%；其中，39所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占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总数的93%，设有研究院、研究生院、分校区等共166个。

结构上，研究院有119个，分校区35个，研究生院10所，附属医院2所；而流向上，流向东部的新设机构占总数的87%，集中流向发展速度快、富裕但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具体到城市，深圳（38所）、苏州（20所）、青岛（17所）、珠海（7所），四地合计可以占到近半比例；东北和西部则成为了“净流出地”。

从学校角度，研究型大学在人才与项目上的争夺日趋激烈，而寻找增长点首先需要物理空间的扩容。例如中山大学深圳校区，规划占地就达4700余亩，在2020年首批师生入住时，已在全球完成了500余位学者的招募，这对学校整体科研产出，无疑增量巨大。迁入地也为此保证了扶持力度，除了市政配套设施，项目还包括两所附属医院，附属中学、小学、幼儿园，以及人才保障性住房。

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陆根书表示，西部地区大部分省级财政，在投入能力和意愿上，都很难跟上域内双一流高校的发展需求，大型项目如新建校区、研究机构、实验基地，动辄数十亿元的土地、基建投入，往往需要学校从自身的经费中腾挪。

而前述的西工大太仓校区、中山大学深圳校区等，都是典型的“交钥匙”工程，校方的重心可以直指招生、办学，无疑吸引力巨大。从地方政府角度，除开弥补高教缺口与集聚产业发展，高水平大学品牌可以整体带动的经济与房地产活力，也不容小觑。

在《意见》所提思路指导下，地方新设本科院校也基本关上大门。除个别院校如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高起点特殊案例外，地方层面多已做出明确回应。

例如，常住人口负增长已经十余年的黑龙江省去年底表态，“十四五”期间原则上不再增设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四川思路是重点发展本科，原则上不再新增高职院校；河南则关注省内区域协调，要求新增高校向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市域倾斜，原则上不在县域布局高校。

在具体审批上，这一趋势更加明确。过去一年间，广东湛江市、揭阳市等地原计划建设的湛江大学、普宁大学等纷纷折戟。2022年8月，揭阳市教育局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回复网友咨询时表示：粤东粤西粤北地市已实现公办本科高校(校区)、高职(高专)院校全覆盖。后续除省委省政府重大发展战略统筹谋划部署外，原则上不受理粤东粤西粤北地市政府提出的公办高等学校设置事项。

“广东之前的思路是每个地市都要有本科高校。”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陈先哲表示，尽管教育决策部门在文件、会议中对高校设置向来谨慎，但在区域经济发展形势下，新设高校的实际增速一直较快。

他认为，随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释出，社会关注点有了急转，可预见的是，未来层次和办学实力较低的高校不可避免地将出现洗牌或重组，政策和审批口径更加明确和收紧，关键是在趋势上防微杜渐，也倒逼地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办学质量的提高。

职教扩容

职业院校的发展，则走出了与普通高校截然不同的轨迹。

1月30日，广东省教育厅公示了新年第一批高校设置事项，素有高职“清北”之称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拟升格为职业本科，更名大学。

根据深圳市教育局2022年部门预算支出，这所“航母级”高职全年财政经费达33.6亿元，同年，位列211工程的郑

州大学则只有31.2亿元，根据去年高招情况，深职院录取分数线甚至高出广东省本科线数十分，是职业院校中的高标准样板。

综合数月来已经发布的“十四五”高校设置规划的黑龙江、宁夏、甘肃、江西、湖南五个省的数据，除深职院外，还有超过十所公办高职正公示升格职业本科。

职业本科为教育部2019年推出。作为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重新定位成“同等层次、不同类型”的关键一环，符合条件的高职学院自此可升格为实施本科层次教育的职业技术大学，试点三年来共批复32所。这一政策在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顺利得到法律层面的固定。

出于试点考虑，2019年的首批十五所职业本科院校均为民办，亦并非公认的高水平强校，这让社会观望情绪一直浓郁。随着此次老牌公办院校的正式进驻，职业本科进入了扩容快车道。根据2021年两办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2025年，职业本科招生规模将不小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10%。

根据2021年教育公报数据换算，未来三年间，职业本科招生规模将有10倍以上招生规模扩张，百所院校兴起。

政策文本中，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概念实际上还包括应用型本科高校。一般而言，高校设置需满足一定办学年限，从低到高逐渐升格，上世纪末高校扩招开启之后，原有的高职、大专院校大量升格或合并升格成为本科院校，现有的高职、高专则主要由中职、中专升格而来。

有研究者曾以《中国教育年鉴（1998）》统计的428所专科院校名录为准，比对2016年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其中340所最终升格成为了本科院校，升格比例高达79.4%。据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统计，在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100所国家骨干性高职院校中，80%—85%是由中职升格而来。

在教育投入短缺的背景下，升格满足了高校扩招的政策需要，但也将有限的办学资源进一步稀释。据时任国家教委职业能力技术司司长的杨金土撰文回忆，高校扩招初期，某两年内高等教育学校数和招生数翻番的省份，其招生所需添置的高教设置大多都来自中等职业学校，相关负责人初步估算，一两年间，该省普通中专划转高教的资产就在十亿元以上。

所以现下尽管“二本”“三本”的说法已经遭到取缔，但公众观感中，这部分高校与老牌研究型大学并不能等同视之。同时，其母体学校也受到九十年代机构改革影响，大量与彼时被裁撤的行业部门脱钩，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划归地方管理，在经费投入和自身办学特色认知上，长久处于本科教育的短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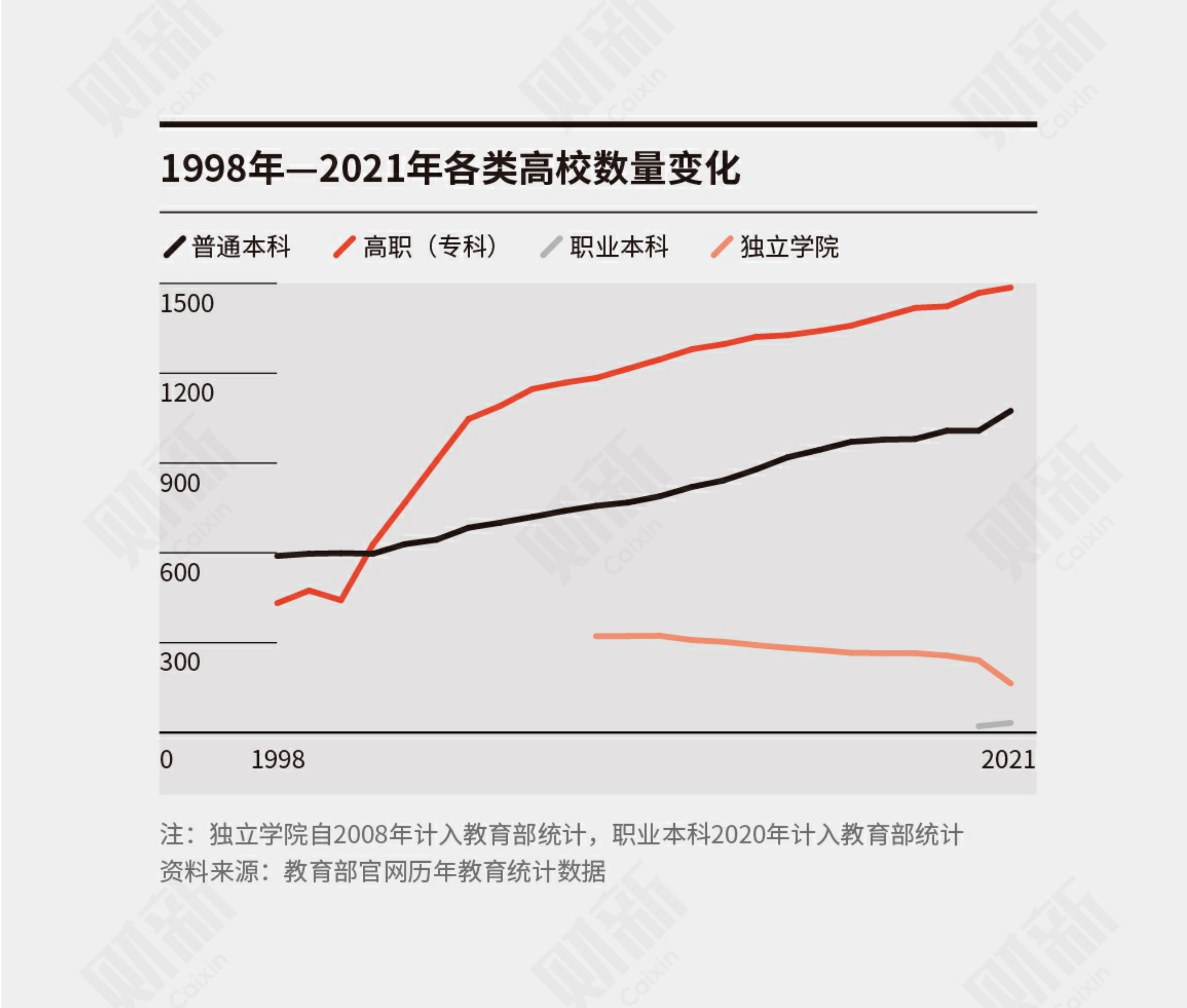
2014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无锡太湖学院副校长阙明坤表示，这里指的本科高校主要即以1999年后新建、升格为限，截至2022年5月31日，全国共有284所公办应用型本科高校、222所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主要培养面向生产、经营、管理一线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不过，应用型高校转型，并不具备传统研究型大学以985、211等工程依靠资源投入进行强力牵引的发展优势，要摘掉低质、重复的帽子和办学惯性，厘清定位，并不容易。

根据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卢彩晨的研究，政府定类之外，高校的自我定类更加复杂模糊。截至2020年底，全国1270所高校官网中，对自身定类的描述高达60余种，部分高校盲目追求“高大上”，部分独立学院也自我定类为“研究型大学”。其中，有357所本科高校定类模糊或没有准确的定类，占本科高校总数的28.1%，接近总数的三分之一。

到2019年，职业本科出现，应用型高校又不再成为高职升格的主要方式，二者之间，互相如何定位，再次成为难题。其中，独立学院是主要变量。

作为特殊的历史产物，独立学院主要指高校扩招以来，社会力量与普通高校合作举办的本科高校。囿于体制与权责的长期混乱，2020年教育部开始要求其集中转设为公办/民办院校。在“大职教”思路下，相关实施方案中，亦期待独立学院成为职业本科首批增量，探索高职与高校独立学院合并转设“职业本科”的方式，也出现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等成功个案。



2021年中，这种转设方式在浙江、江苏等多地遭到学生剧烈反对，进展一度停滞。根据阙明坤提供的数据，截至2022年4月，全国尚有164所独立学院尚未完成转设。2023年伊始，相关评估有望重启，已经暂停一段时间的转设工作，或可在2023年重新稳步推进。

阙明坤分析，就目前的政策导向而言，新转设的独立学院不会再向职业本科方向发展，而将作为应用型本科的主要增量。

高等教育格局，即可以据此分为三类，一则为双一流等工程引导的传统研究型高校；二则为上世纪90年代高校扩招后新升格、设立的本科院校以及目前正在转设中的独立学院，组成应用型高校的主体；新扩容的职业本科以及高职高专则为职业技能型高校的代表。

后两者既作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关键，也是“控量”背景下高校设置的主要工作内容。

大学何往

2023年1月12日，教育部长怀进鹏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战略谋划提到了四个深刻认识，其中第三条为，“深刻认识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调整的紧迫要求。”

现实中，高教招考情况与人口的潮汐变化一直息息相关。据国家统计局依第六次人口普查回测的数据，中国出生人口最近一次迫近三千万的“峰值”出现在1990年，几乎是按照学段年龄顺推，2007到2009三年，高考报名人数首次进入千万量级，达峰后连续五年下降。2015年开始，高校招生人数首次超过普通高中毕业生人数。

2019年起，高考报名人数重新回到高位，但高校扩招二十余年来，普及化的挖潜空间已然不大。以高考报名人数相近的2008年（1050万）和2021年（1078万）对比，综合教育部、人社部数据，此两年度具备普通高考参与资格的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总量分别为1416.7万、1264.3万，同口径数据下，2008年有366.7万适龄毕业生最终未报名高考，2021年则只有186.3万。

到刚刚过去的2022年，人口与学位在数据上的割裂进一步显化。当1193万的高考报名人数，和1076万的高校毕业生数双双刷新了历史，出生人口数量则在连续六年的下降中，首次来到了956万的负增长水平。

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高校还可拥有超过十年的招考热潮，但窗口期过后，将不得不应对生源趋势的快速变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张立龙等人团队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做出预测，中国学前、小学、初中、高中、高等教育的学龄人口将分别在2020年、2023年、2026年、2029 年 、2032年达到峰值，之后进入快速减少趋势。

受访学者大都认为，目前高校设置的政策思路，既是过往政策的执行延申，也包含对人口形势、长远规划的主动回应。然而，不论扩容还是提质，无疑都呼唤更多投入，这在财政“紧日子”愈发常态的今天，又显得尤为困难。

陆根书表示，疫情三年，教育部直属高校来自中央的正常国拨经费，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削减。从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公开预算情况来看，单年降幅在10%—20%者居多，降低数额高者如北京大学，2020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较2019年减少了10.69亿元，降幅幅度高者如中国药科大学，同年的拨款降幅达29.94%。

从教育部公布的本级预算（不含转移支付）来看，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预算较前一年执行数在疫情三年来连续下降，幅度分别为127.98亿元、56.17亿元、20.20亿元。

根据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2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22586.42元，较2019年水平，下降了3.89%。在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尚维持增长的情况下，各级教育生均经费，只有高等教育处在下降状态。

在这种背景下，中西部的部属高校面临人才“东南飞”的窘境。陆根书表示，尽管经费都主要来自中央财政，但经济实力雄厚的地区往往能够在学科建设、科研项目上对标中央经费配比，拉开差距。现有的政策倾斜如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相较于东部地区的支持，还存在量级上的区别，学校可以受政策规制，但人才并不会因此放弃流动。

中国高水平大学主要布局在区域中心城市，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一直未有较大改变，而后又得到985、211等工程的加持强化，成为中国家长的主要追求。然而，人口多寡、流入与流出，经济强弱、产业布局与迁移，都在深刻改变区域社会对于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的需要。从目前高校设置政策的调整应对来看，观察者们分析，下一阶段更为强调的，是中央政府对高校事权的集中把握。

陆根书认为，政府对于高校办学导向的引领，不应该简单地落在行政命令的禁止上，这无法解决现实困境，对学校发展也并不公平。尝试通过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投入，以平衡地区经济的差异，或许更有助于抚平中西部高校的“焦虑”，让高教资源流动有序。

与基础教育领域近年来密集讨论“为教师减负”不同，无论是实体经济振兴，还是“卡脖子”问题纾困，高校都受到战略需求和行政管理的更多期待和加码，内部育人环境的恶化并未受到重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孙诚曾向财新表示，而今繁杂的考评、申报、写材料挤占着教研人员的精力，也压缩他们在教学中探索创新的可能，“或许干得不多，但一定写的很多，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忙得没方向了。”

陈先哲认为，尽管体制有别，但在世界范围内，大学的发展都越来越与国家战略关系密切，而更容易被要求直接为社会关切、为战略需求服务，今天，这种对接的紧密度、反应的快速性都在与日俱增。这一定程度上又容易让大学陷入“生产焦虑”，当内部以人为本的育人使命，更多向外部政治、经济的需要让位时，学生个体的受教育体验自然难如人愿。

在此前长久的高等教育资源短缺中，中国学生对此体悟更深。不过他认为，人口形势的深刻变化，也可以视作契机，帮助相当一部分高校重新定位，当学生逐渐成为日渐稀缺的资源，单一的“卖方市场”被打破，有望倒逼高校回到对人本身的关注上去，从而真正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版面编辑：刘潇

最新财新周刊｜2023年经济如何回归常态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5%左右的增长目标相对谨慎，显示2023年更多是恢复性增长而非刺激性增长，而就业成为政策变化的重要考量因素

文丨财新周刊 于海荣 程思炜 王石玉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全面放开，中国经济正处在从防疫模式向常规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尽管短期环比反弹动能较强，但需求不足、预期转弱的局面仍未得到实质性改变。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经济整体向好，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政府工作报告将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目标设定为5%左右，处于市场预测区间的下限；将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上调为1200万人左右；赤字率按3%安排。

国家发改委在提交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下称"计划报告"）中称，如此订立2023年的增长目标，一是考虑到党的二十大明确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必须在提高质量效益基础上长期保持合理经济增长；二是体现了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要求，有利于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提振信心，引导预期，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在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此外，也同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资源要素条件可支撑，虽然超预期影响仍在、外部不确定性较多，但只要政策聚焦发力、工作加倍努力、各方齐心协力，这一目标经过奋斗是可以实现的。

市场机构普遍认为，这一增长目标相对保守而务实，由于2022年基数较低，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大概率会高于5%。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仍将面临多重阻力因素，中央政府设定"5%左右"的GDP增速目标合理且理性，旨在推动经济从2022年疫情的冲击中稳健复苏。同时，设定较为保守的增长目标，也意味着2023年政府可能不会出台远超市场预期的大规模刺激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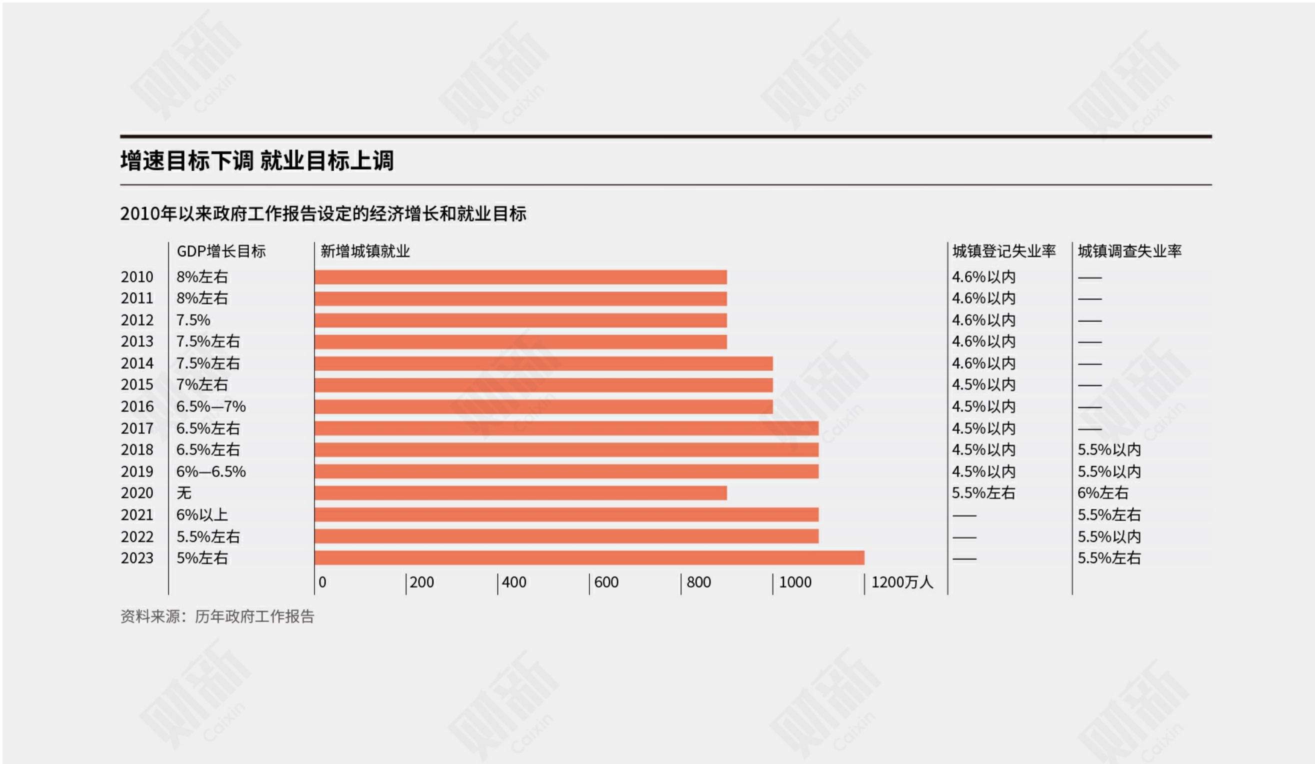
相比增速，政府显然更看重的是就业。在增速目标下调的同时，城镇新增就业目标1200万人，较此前两年和疫情前2019年1100万人以上的目标高出1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为5.5%，较2022年的5.5%以内略有放松，与2021年一致。

为保障增长、就业目标的实现，政策基调延续了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保持政策连续性针对性，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宏观政策上，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赤字率拟按３%安排，高于2022年0.2个百分点，新增地方专项债券3.8万亿元，增加1500亿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虽然预算赤字率上调，但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测算称，2023年以现收现付测算的财政赤字规模可能达到GDP的4.5%，低于2022年0.2个百分点。不过，与2022年主要通过对企业退税减税来支持经济增长、在经济下行周期时财政乘数极低不同，2023年财政扩张的重心将从减税降费转移到支持基建投资和扩大消费，能产生更高的财政乘数。

在推动经济整体向好的同时，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仍是2023年的重要任务。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一致，防止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发展和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是重点。陆挺认为，结合保守的经济增速目标，这可能预示着，2023年尤其是在经济复苏基本企稳后的下半年，政府工作重点或将转向化解金融风险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由于今年是政府换届之年，政府工作报告对2023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以建议的方式简述，主要重申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任务。市场普遍预计，更多具体的政策支持措施有待新一届政府上任后出台。

2023年目标：增速下调、就业上调

受疫情反复、俄乌冲突及美联储激进加息等多重超预期因素影响，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3%，大幅低于年初5.5%左右的预期增速。随着2022年末防疫政策调整、下半年房地产调控持续放松，各方预期2023年中国经济将逐渐告别疫情影响，向常态路径回归，但对2023年中国经济能修复到多高，仍存在较大分歧。

从前两个月经济运行的情况看，中国走出疫情的步伐快于预期，春节人口大规模流动并未导致第二波疫情；高频数据显示，部分城市房地产销售正在快速修复。加之近期欧美经济韧性仍强，对中国出口的带动或超出预期，不少国内外机构陆续上调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普遍在5%以上，相对乐观的预期则在6%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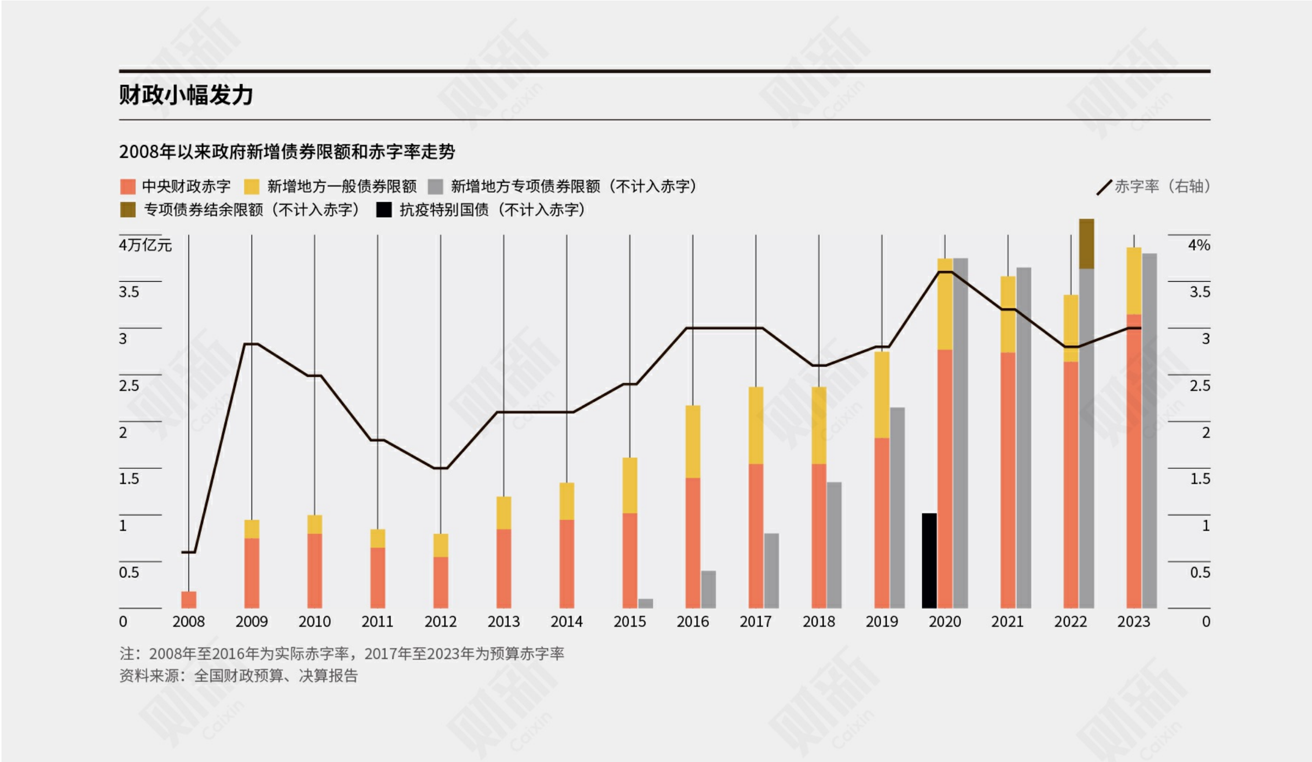
在此背景下，政府工作报告将2023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5%左右，似乎比较保守，应该如何理解？

据财新了解，每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通常在上一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但对外公布是在当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时，疫情防控政策刚刚调整，不确定性仍然较大。

尽管市场预期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超过5%，但对经济增长目标的预测则大多集中在5%左右或5%以上，少数机构的预测为5.5%左右。理由是春节前召开的省级"两会"上，经济大省多将2023年的增长目标设定为5%左右或以上，同时根据各省份GDP占比加权计算，2023年各省份GDP目标增速均值为5.6%，往年这一均值与全国目标之间的差距多在0.6—0.7个百分点，按惯例，2023年全国目标应在5%左右或以上。

最终政府工作报告将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设为5%左右，较2022年下调0.5个百分点。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认为，其中的考虑可能在于，通过较保守目标与上年经济表现更平稳地衔接，同时给经济高质量发展留下更大空间。另一方面，从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角度看，中央对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国民收入较2020年翻一

番”的规划，隐含着2023—2035年GDP年均增速达到4.59%的要求。2023年GDP增速目标设在5%左右，也蕴含着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总体平稳运行、缓下台阶的方向，而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加紧步伐。



“5%左右的GDP增速处在经济潜在增速的下沿位置，从两年平均同比（4%）来看，则低于潜在增速。”华泰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张继强认为，这暗含着2023年全年经济大致是一个回归潜在增长的路径，并未追求“填坑”2022年的疫情冲击。从政策端来看，5%左右的增速目标相对稳健，加之当前经济复苏趋势相对确定，直接性、大规模刺激政策的紧迫性有所降低，可以慢一点看看政策效果。

华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认为，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一个柔和的目标区间，取上限还是下限，就业或许是重要的政府考量基础。应紧密跟踪新增就业的情况，如果出现上半年明显低于往年同期，经济存在空中加油的可能性。

政府工作报告将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定为1200万人左右，为历年来最高，较此前两年和疫情前2019年1100万人以上的目标高出1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为5.5%左右，较2022年的5.5%以内略有放松，与2021年一致。

计划报告称，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主要考虑的是2023年需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规模仍然较大，其中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实现1200万人左右的城镇新增就业是稳就业的基本要求。5.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预期目标，体现了就业优先的政策导向，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

增长目标下调、就业目标上调，指向2023年中国经济是恢复性增长，而非刺激性增长。“2023年经济复苏主要并不依靠政府的支持，而是靠经济重启后的消费正常化，以及政策转向带来的房地产企稳回升。”汪涛表示。

受基数因素影响，市场普遍预测，2023年全年中国经济实现5%左右的增长难度并不大，经济修复的高点将在二季度出现，同比增速有望达到7%左右甚至更高，此后三、四季度复苏延续，但增速可能放缓。

陆挺提醒，尽管2023年上半年经济疫后复苏的势头强劲，但考虑到全球需求疲软令出口承压、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房地产市场复苏仍有待发力等国内外挑战，对下半年经济发展前景需持谨慎态度。

尽管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但在具体措施上，只提及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大宗消费、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并未提出相关政策细节。据财新了解，除了已宣布的延续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决策层对恢复和扩大消费最主要的期待是尽快使社会经济秩序恢复到正常状态，尽快带动恢复就业增加—收入增长—消费恢复的循环。

财政发力从减税降费转向支出端

在稳增长的背景下，2023年财政政策延续积极基调，更强调加力提效，赤字率和专项债额度两个关键指标均小幅提升。预算报告明确赤字率按3%安排，较2022年的2.8%提升0.2个百分点；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8万亿元，高于2022年的3.65万亿元。

尽管赤字和专项债增加，但2023年财政政策扩张力度可能低于2022年，如预算报告表述，只是“加大财政对经济恢复发展的必要支持力度”。

通常来讲，实际可用财力除了当年的财政收入、赤字、新增专项债券限额，还包括上年结余结转资金，以及各类调入资金。2022年实际可用财力包括央行上缴结存利润1.13万亿元等一次性收入和上万亿元的结余结转资金；在

二季度受疫情较大冲击后，在2022年初新增3.65万亿元专项债额度的基础上，年中又动用了5029亿元结存限额，全年实际新增专项债超过4.15万亿元，高于2023年预算安排的3.8万亿元新增限额。

财新根据预算报告计算，由于2022年财政支出不及预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数低于预算数6515.83亿元，结转到2023年的资金量仍然较大，专项债券中也有上千亿元资金结转到2023年使用，但多家机构测算都显示，总体看财政加力力度不及2022年。

据汪涛测算，综合考虑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政策性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准财政渠道，2023年增广财政赤字率或提高0.4个百分点，而2022年提高2.7个百分点。

张瑜估算的财政加准财政财力规模，2023年增量为6000亿元，低于2022年的2.8万亿元。

野村测算的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土地出让收入、地方专项债券以及政策性银行资金在内的总财政支出，2023年或同比下降2.6%，而2022年增速为6.5%。

不过，2023年财政政策扩张力度有限，但政策效果可能优化。这主要因为财政发力方式转变，更多从收入端的减税退税降费缓费转向支出端。"如果企业部门信心得到提振，那么2022年向企业转移的大部分资金有望在2023年投入使用。"陆挺称。

由于是换届之年，政府工作报告暂未提出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只表示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对现行减税降费、退税缓税等措施，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自2016年以来，中国连续实施降低增值税率和社保费率、增值税留抵退税、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等大规模税费支持政策，在疫情发生后更是加大力度，2022年税费支持政策超过4万亿元。

持续大规模减税降费后，税费政策空间收窄，而且不少学界、企业界人士认为减税降费政策的边际效应已经减弱。汪涛表示，2022年政府主要通过对企业退税减税来支持经济增长，但在经济下行周期时此类措施的财政乘数极低；支出方面，公共支出和政府消费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基建投资支出的增加。2023年财政扩张的重心将从减税降费转移到支持基建投资和扩大消费，两者均能产生更高的财政乘数。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同样认为，减税降费要以预期和信心稳定为前提，否则事倍功半，在居民和企业预期较弱的背景下，减税降费难以转化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经济下行期支出政策更优。

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一致，预算报告提出优化组合财政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张瑜预计，2023年将从兜底式减税降费变为激励式贴息，全年贴息贷款规模或升至1万亿元。"贴息的财政乘数更大，站在企业尤其是小微和困难行业企业视角，拿到退税减税后不一定再投资，而贴息贷款只有扩大投资才适用，同时财政负担资金较少。"

2023年预算赤字率从2.8%提升至3%，对应的赤字规模增加5100亿元，全部来自中央加杠杆，地方财政赤字则与2022年持平。政府债务结构相应发生变化，这也与近年来学界的呼吁一致，即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专项债规模大、风险较高，中央应承担更多加杠杆稳增长任务。不过，从地方债内部结构看，专项债规模在2023年再度扩大，一般债占比继续下降。

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手段，计划报告披露，2023年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800亿元，较2022年增加400亿元，重点向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国家安全以及民生等领域倾斜。同时提出，注重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有效衔接。

汪涛认为，考虑到来自地方融资平台、民企和国企的基建投资资金增长可能都较为乏力，未来来自政策性银行的资金和信贷支持可能加码，具体措施有待确认。她预计，2023年基建投资增速可能从2022年的11.5%放缓至6%左右。

货币政策如何"精准有力"

在货币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强调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并提出要"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精准有力"的表述在2022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已经"亮相"。在全国"两会"开幕前，3月3日，央行行长易纲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了央行接下来货币政策的思路：一方面，货币信贷的总量要适度，节奏要平稳，要巩固实际贷款利率下降的成果；另一方面，还要适度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继续对普惠小微、绿色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保持有力的支持力度。

随着新冠疫情等制约因素逐渐"退潮"，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精准有力"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在总量方面，多数市场观点认为，货币政策虽然整体未必将会转向收紧，但或进一步"常态化"，可能出现边际上宽松节奏的放缓。

中金公司宏观研报认为，货币政策最宽松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整体可能仍然相对比较宽松。钟正生也预

计，2023年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将弱于2022年。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政策连续性”，或意味着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基于“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的表述，2023年社融反弹幅度可能相对有限。

货币政策的宽松趋势边际减弱，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经济修复步入正轨，企业融资需求正在回暖，以政策驱动宽松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则是总量货币政策面临着一定制约。

钟正生认为，2023年货币发力主要面临国内外两方面的掣肘。从国内来看，需求回暖叠加基数走低的推动下，核心CPI上涨的趋势可能在2023年下半年逐步凸显。从国外来看，全球部分主要央行的加息周期较市场预期更长，同时又面临外需回落的压力。

中金公司研报称，未来央行可能重点关注经济增长恢复以及通胀、资产价格形势，对货币政策预调微调。

对总量上的“微调手法”，陆挺预计，2023年不会降息降准，原因是现行货币政策已经相当宽松，当前经济主要瓶颈并非贷款成本，而是家庭和企业信心有待回暖。此外，央行工具箱中还有结构性贷款、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其他政策工具可供选择。

市场并没有完全排除降息和降准的可能。汪涛则认为，为了给按揭利率提供一些下降空间，银行实际存款利率可能略有下调，以引导贷款基础利率（LPR）下调。此外，央行可能会再降准一次。

易纲在前述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目前“实际利率的水平也是比较合适的”，企业融资成本已经在历史低位。2022年，中国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平均为4.17%，较2018年下降1.28个百分点。

据财新了解，在1月各家银行冲刺“开年红”时，部分银行优质客户对公贷款利率最低已经下探至3%以下，出现了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倒挂”的现象。

要实现精准，市场的共识是，再贷款等结构性工具将成为提供流动性的主力。对重点领域实行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微调或将更为常见，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要“挑大梁”。

截至2022年末，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共计15种，余额约6.4万亿元，约占人民银行总资产的15%，用以支持重点领域。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央行设有专门的保交楼专项借款3500亿元、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2000亿元。

罗志恒认为，使用更多结构性工具，可以疏通“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渠道，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普惠金融、绿色发展、高科技产业等特定领域的金融服务，推动消费有力复苏，增强经济增长潜能。

从实际效力的角度，“央行通过结构工具基本可以决定流动性的‘半壁江山’。”张瑜测算称，截至2022年12月末，结构性工具累计占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44%左右，中期借贷便利（MLF）仅占32%。“结构性工具可以通过差异极大的利率引导资金流向，单独观测MLF利率的意义已经大幅下降。”

钟正生认为，2023年货币政策“精准”支持实体经济，优先级从高到低依次是结构性再贷款（地位提升）、降准（仍有空间）、降息（并非必选）。

防风险仍是重点

在政策发力推动经济整体向好的同时，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仍是2023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防范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将是重点。

2022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以来，稳定房地产的政策陆续出台，金融端保主体，需求端大部分城市放松限购限售。政府工作报告延续了此前“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的表述，同时要求“防止无序扩张，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发展”。

住建部部长倪虹在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防范化解房地产“灰犀牛”风险，避免和金融风险、地方债风险交织，发生系统性风险，要用“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以“精准拆弹”的方式化解风险。“一头”是抓优质房企，一视同仁地支持优质国有房企和优质民营房企，改善资产负债状况，满足合理的融资需求；另“一头”是抓出险的房企，一方面帮助它们自救，另一方面严格依法依规处置，绝不让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蒙混过关，要让它们付出应有的代价。同时，要大力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营造诚实守信、风清气正的市场氛围，让人民群众放心购房、放心租房。

中金公司宏观研报认为，2022年以来，政策已经针对防控房地产风险出台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框架，需求端因城施策、授权各个城市在“房住不炒”的框架内自主调整金融信贷政策以及限购限售政策，在供给端压实保交楼责任、实施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修复计划，2023年大概率在此框架下狠抓落实。

随着前期需求政策持续放松，2023年开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高频数据显示，近期30个大中城市新房销售面积不仅超过2022年农历同期水平，也接近2019年同期水平；倪虹称，2023年1—2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包括一手房和二手房，结束了13个月的负增长，价格总体平稳。

“从政策落实情况看，购买首套住房的大力支持政策、购买二套住房的合理支持政策已经出台，正在落实见效。不让投机炒房重新入市、原则上不支持三套以上购房的要求，各地也在认真落实。”倪虹称。

相比房地产扶持政策继续落地、对经济的拖累将减弱，地方债政策则有收紧的可能。2022年底以来，市场对甘肃兰州、广西柳州、山东潍坊等城投“网红”担忧上升的同时，决策层也多次提及地方债监管问题，对后续隐性债务化解的方式也逐步清晰。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遏制增量、化解存量。这与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表述一致。

中诚信国际政府公共评级部李昊认为，协调银行等金融机构配合地方政府相关债务重组，优化期限结构进而以时间换空间，或将成为新的政策发力点。这是因为2022年以来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导致预算内可用于化债的资金有限，加之政府可用（法定）债务额度收窄以及依靠专项债拉动经济的压力增加，隐性债务显性化的化债模式亦乏力。

不过，展期和债务重组只是缓解短期偿债压力，并不能降低隐性债务存量。按中央明确的五到十年化债期限，到2023年进度已过半，广东、北京等已率先完成隐债清零，一些财政实力偏弱、债务风险较高的地区化债压力仍大。种种担忧之下，市场再次出现中央是否会开展大规模隐性债务置换，也就是用法定债券置换隐性债务的猜想。

李昊称，从强调“要压实省级政府防范化解隐性债务主体责任”来看，当前化债思路是继续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并在制度上助力金融机构联动化债。由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分布不均，不同地区因地制宜探索化债路径，此前广东、北京等发达区域借助再融资债券置换快速实现隐性债务清零，而贵州等则依托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支持，通过债务重组等形式化解区域债务压力。

广发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刘郁同样认为，“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意味着可能需要财政和金融机构合力推进部分地方债务置换。她同时指出，金融机构债务置换，对债务压力相对较大的地区往往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难以有效降低利息负担，这部分债务压力相对较大的地区，可能仍需要财政给予少量地方债额度来置换化债。

据财新了解，除了化解2017年锁定的存量隐性债务，另一挑战在于如何遏制增量。虽然中央历来强调“遏制增量、化解存量”，但是疫情三年来，地方财力遭重创，在稳增长过程中上马的一些项目需要地方资金配套、土地市场低迷不得不动用城投买地等，不可避免地导致新增隐性债务。

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中指出，有的地方存在新增隐性债务、化解债务不实的情况。财政部此前也通报，部分地区在2018年统一部署化债之后仍存在新增隐性债务的情况，如安徽省安庆市下属的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4月发行中期票据募集资金，其中3.5亿元用于偿还前期隐性债务利息，约定该笔融资由政府承担，造成新增隐性债务。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认为，对地方债政策的表述，在市场预期之内。2023年显性债务保持积极，隐性债务会加速化解。在这一过程中，化债方式比较重要，如果力度较大，可能会带来阵痛；但如果举措平稳，同时又能有效优化债务期限结构，则资产负债表风险会下降，市场担忧亦会有所缓解。

作为遏制增量的治本之策，近期财政部多次强调要防范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平台化”，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综合治理，推动分类转型。预算报告也延续了这一表述。据财新了解，此前部署化债工作时曾要求中央出台融资平台转型指导意见，虽然部分地区出台了相关文件，但中央层面的文件至今未能出台。化债期限已经过半，这一工作或将加速。▫

版面编辑：刘潇

专栏｜中美竞争亟须建立防护安全网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美国及其盟友应避免把中国妖魔化，而是以 “竞争性共存”的方式来看待与中国的关系



如果将中美竞争比作一场纸牌游戏，无论是哪个国家拿到一手好牌，打得不好也会输掉游戏。图：视觉中国

文丨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

2022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晤时，就两国开展高级别会谈、为中美关系建立防护和安全网达成了共识。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原定于2月访问北京启动这一议程，但是，气球事件出现后，布林肯的访问被叫停，速度比击落气球还要快。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实在不好，但即便有此事件，更好的选择仍然是布林肯继续此次访问。

这一事件与1960年的美苏类似。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原定会面，为冷战建立防护安全网。但随后苏联击落了一架美国飞机，峰会随即被取消，直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两国才开始启动这一讨论。

一些分析家将当前的中美关系比作冷战，因为它正演变为一场长期战略竞争。但是，这种比喻可能会带来误导。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两国之间几乎没有贸易，也鲜有对话，在气候变化或大流行病等问题上也没有生态上的相互依存性。中美之间的情况截然不同。以中国为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家远多于以美国为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家，这一现实将限制任何遏制中国战略的效果。

冷战的类比并不恰当，但并不意味着新冷战不会发生。我们仍然可能意外地走上这条路。当前合适的历史类比不是1945年，而是1914年，当时所有大国都认为只会有一场短暂的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结果却演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摧毁了四个帝国。

上世纪初的政治领导人没有对民族主义的日益高涨抱有足够的警惕。今天的政策制定者不应重复这个错误，必须警惕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避免两类情绪的危险互动。

自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一直旨在阻止中国台湾地区宣布法理上的独立和中国大陆诉诸武力实现统一。在一些分析家看来，这样的政策已经过时。另一些分析家则持怀疑态度。他们警告，美国对中国台湾的“安全承诺”会激起中国大陆采取行动，担心美国高层官员访台不符合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宣布的 “一个中国”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有一艘船或一架飞机发生碰撞并造成人员伤亡，就有可能引发事态的全面升级。如果美国冻结中国资产或实施《对敌贸易法》，两国就会迅速陷入真正的冷战，甚至是热战。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1月发表的一项战棋推演显示，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双方以及世界经济都将蒙受巨大的损失。报告认为，解决台湾问题最好的办法仍是努力维持现状。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认为，西方国家的目标不应是对中国取得全面胜利，而是应管理好与中国的竞争。这要求美国及其盟友避免把中国妖魔化，而是以“竞争性共存”的方式来看待与中国的关系。从长期看，在一个经济上、生态上均存在高度依存性的时代，如果中国变得更好，美国及其盟友也会受益。

一个好的战略必须基于审慎的整体评估。低估会滋生自满情绪，高估则会造成恐惧，都可能导致误判和错误的

政策。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即使未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会超过美国，其人均收入仍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美国、日本和欧洲仍将代表世界经济的最大部分。未来十年，全球 15 个最大的经济体中，有 7 个的劳动力数量将减少，美国劳动力预计将增加 5%；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则将减少9%。

近期亚洲及美欧的一系列发展表明，全球企业、产业及供应链的天平正在缓慢地向中国之外的地区转移。

如果将中美竞争比作一场纸牌游戏，无论是哪个国家拿到一手好牌，打得不好也会输掉游戏。放在1914年的历史背景之下审视，最近的气球事件提醒我们，中美两国之间为什么需要防护安全网。

版面编辑：刘潇

回溯｜一周回溯（《财新周刊》2023年第10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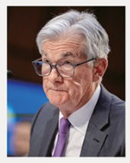
一周回溯

3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选举赵乐际为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鸿忠、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尔为副委员长，刘奇为秘书长；选举韩正为国家副主席。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选举王沪宁为十四届全国政协主席，石泰峰、胡春华、沈跃跃、王勇、周强、帕巴拉·格列朗杰、何厚铧、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鸿、高云龙、陈武、穆虹、咸辉、王东峰、姜信治、蒋作君、何报翔、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震为副主席，王东峰为秘书长。

3月6日，习近平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强调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3月4日和5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和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先后在北京开幕。

3月5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各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和全国工商联主席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



3月7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举行半年度货币政策听证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到场作证，称美联储未来加息幅度可能超出此前预期。



3月2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于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进行了接触交谈。这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两国外长首次会面交谈。



3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对伊拉克进行未公开的访问。有分析称，此次访问旨在表明美国希望在发动伊拉克战争20周年后仍保持其在伊军事存在。

3月3日至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莱希等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见和会谈，双方互释加强关系的意愿。

3月1日，美国多家情报部门联合公布，2016年以来困扰部分美驻外使领馆人员的神秘怪病“哈瓦那综合征”，可能与基础病、健康问题及环境因素等有关，而由外国敌对势力造成“极不可能”。



3月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记者会，邀请外交部长秦刚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3月6日，韩国政府公布针对日本“二战”时期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问题的解决方案，决定由韩国财团筹措资金，代替被告的日本企业支付赔偿金。方案遭到韩国国内舆论的批评和反对。

3月3日，斐济代总理卡米卡米加表示，斐济因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而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近日，中国和韩国均敦促日本采取负责任的应对措施，不得擅自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3月4日，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婉秋因病抢救无效逝世，享年80岁。



3月3日，由61名游客组成的中国旅行团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CZ305航班抵达奥克兰国际机场，成为中国试点恢复出境团队旅游后首批赴新西兰的团队游客。

3月7日，日本新一代主力运载火箭H3再次尝试发射，但以失败告终。该火箭在2月17日因主发动机电源供应系统出现异常而首发未果。

3月4日是国际HPV（人乳头瘤病毒）宣传日。2月2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今年9月起，将从初一学生开始推广HPV疫苗免费接种。

3月4日，美国俄亥俄州再次发生列车脱轨事故，当地官员命令居住在事故现场附近的居民就地避难。

3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332亿美元。

2月28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2022年日本新生儿数量为79.9728万人，自1899年有统计以来新生儿数量首次跌破80万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本出生人数连续7年减少，少子化情况危急。

3月8日是“三八”国际妇女节。3月6日，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7届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聚焦于在技术和创新领域缩小性别差距。



3月1日，法国足球名宿朱斯特·方丹去世，享年89岁。他代表法国队出战21场比赛，共打入30粒进球。1958年瑞典世界杯，获得世界杯最佳射手并创造单届世界杯个人最高进球纪录。

版面编辑：刘潇

前瞻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完全恢复线下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资料图：海南琼海，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永久会址喷泉。图：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文丨财新周刊 李忆

经历三年疫情反复后，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定于3月28日至31日在海南博鳌完全恢复以线下方式举行，年会主题为“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此前两届，出于新冠疫情原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都是以线上加线下的方式举行；而2020年年会更是取消未办。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此前曾介绍，在围绕此次年会议题征求各方意见的过程中，“大家普遍感到，无论是世界经济形势，还是总体国际形势，都存在很多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一方面，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显著放缓，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的通胀连续创下数十年来的新高；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全球能源供应格局、产业链供应链格局等均面临重组，全球贸易形势不容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22年发布的数份报告均一再调低2023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并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

另一方面，受经济下行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多种因素影响，全球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进程受挫。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多发，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气候变化已不再是潜在的风险，而是实实在在的危害，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的紧迫性更加突出”。

此外，世界上发展和安全两大赤字不断凸显，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分化对立加剧，而“俄乌冲突延宕不绝，是影响当前国际形势最重大的事件”。

李保东在1月间举行的一场论坛吹风会上介绍，俄乌冲突也再次表明，安全是相互的，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和平与发展才是国际社会最应珍惜的财富，“进行军事对抗和经济脱钩，最终不会有真正的赢家”。

而从地区来看，尽管亚洲经济的增长幅度也受到全球环境的影响而有所收窄，但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实施，进一步拉紧了地区国家间的经贸联系；亚洲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在逆全球化趋势抬头的背景下仍在深化，这凸显了亚洲地区的经济韧性。此外，“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这也是不确定的世界中一项重要的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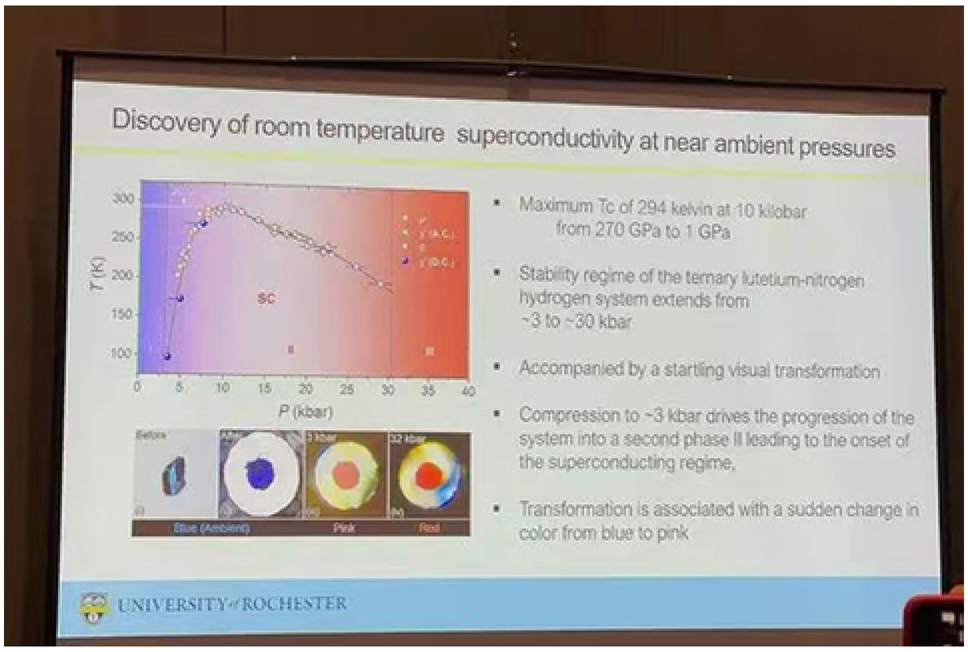
据李保东透露，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议题板块是从几组关系入手，计划设置“发展与普惠”“治理与安全”“区域与全球”“当下与未来”等四大板块。

除了举办年会，在2023年内，博鳌亚洲论坛还将继续举办一系列其他活动，包括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第二届大会、全球旅游论坛首届大会、全球城市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论坛首届大会、全球健康论坛第三届大会、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第三届大会以及健康产业国际论坛等专题会议。

版面编辑：刘潇

国风丨美国研究团队宣布实现室温超导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当地时间3月7日，在美国拉斯韦加斯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罗彻斯特大学物理系助理教授兰加·迪亚斯（Ranga Dias）宣布，他的团队发现一种在室温和相对较低的压力下具有超导性的材料，研究结果已在《自然》杂志发表。

文丨财新周刊 徐路易，周芊岍（实习）

美国一研究团队又一次宣布已实现室温超导。当地时间3月7日，在美国拉斯韦加斯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罗彻斯特大学物理系助理教授兰加·迪亚斯（Ranga Dias）宣布，他的团队发现一种在室温和相对较低的压力下具有超导性的材料，研究结果已在《自然》杂志发表。

据财新了解，当天该会场的座席一共只能容纳不到100人，迪亚斯的报告刚开始不久，就不断有科学家试图进入会场。为了防止会场人数过多而违反相关消防规定，保安不得不驱散人群，避免会场被关停。迪亚斯在作完报告后，没有接受任何现场提问。

根据该团队发表的论文，他们发现的材料由氢、氮和一种名为镥的稀土元素混合制成，它可以在21摄氏度和大约1 GPa（1Gpa约等于1万个标准大气压）的压力下实现超导。

超导即"超级导电"的能力，导体具有以下导电性才可以在科学上被称为"超级导电"：当电流通过时，没有因为受到任何阻力而导致损失，即该导体的电阻为零。

超导现象通常在极低温状态下出现。超导体一般有一个特性临界温度，低于这个临界温度后，导体的电阻就会突然降到零，变为超导体。1911年，荷兰科学家海克·昂内斯（Heike Onnes）等人发现汞在接近绝对零度（约-273.15摄氏度）的极低温下，电阻会消失，从而呈现超导状态。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通过一圈超导导线的电流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实现室温超导，是全世界物理学家的梦想之一。超导材料最直接的应用就在于电能传输，如果室温超导材料能够以更方便维护、成本更低的方式得到应用，就能使电网在传输电能时减少2亿兆瓦的能耗。同时，超导在磁悬浮列车、核磁共振成像等方面也有多种应用。

但是，人们距离触碰到这种珍贵的材料，还有两个必须跨越的坎——极低温、极高压。不管是实验室研究还是实际应用，这两个条件目前仍需要较高的成本去实现和维护。

此次研究的发表之所以如此轰动，除了室温超导本身，还有研究团队此前引发的争议。

2020年10月，《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刊登了兰加·迪亚斯团队的室温超导研究，他们创造出了一种碳硫氢化合物固体分子，这种材料在约15摄氏度和约267Gpa的压强下表现出超导性。同年11月，迪亚斯成立新材料公司Unearthly Materials。他还依靠这一研究，获得了包括摩尔基金会研究奖等奖项。但此后两年，诸多研究团队试图重复迪亚斯团队的研究结果，无一成功；2022年9月，《自然》杂志以数据处理不合规等问题为由，撤回了迪亚斯团队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20年里陆续有研究团队声称发现了可以实现近室温超导的材料，但大多数实验结果均无法复制。已有多名学者表示，将重复迪亚斯团队的实验，对其结果进行验证。

版面编辑：刘潇

心智丨怎么做情绪的主宰者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插画丨董必奇

文丨倪考梦
安人心智特约作者

情绪建构论是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莉莎·费德曼·巴瑞特（Lisa Feldman Barrett）教授提出的一套全新的情绪理论，在许多方面都站在主流的传统情绪观的对立面。我大致梳理了情绪建构论和传统情绪论的几组对立分歧：

第一，情绪是大脑对世界的主动建构，而非被动反射。

传统情绪理论认为，我们的情绪是大脑对外部世界感觉刺激的被动反射。情绪建构论则认为，我们是自己主观世界的积极建构者，而非外部客观世界的被动反应者。

例如，如果你很生老板的气，可能会大骂他是一个傻瓜。传统情绪观可能会把这归咎于假想的愤怒回路；情绪建构论则会认为，你骂老板是因为你基于"愤怒"的情绪概念和你过去的体验，主动预测和模拟了一个愤怒的情绪实例，从而带来愤怒的反应。

第二，情绪是对身体状态的积极调节，而非消极感知。

传统情绪论认为，我们当前的情绪状态，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应，表现为身体状态。情绪建构论则认为，情绪实例的建构包含了对身体预算和活力状态的积极调节。

以蛇为例。传统情绪论认为，我们看到草丛中有动静（可能有蛇），恐惧感油然而生，于是心跳加速呼吸加快。情绪建构论则认为我们看到草动，预测可能会看到蛇，于是模拟被唤醒的活力状态，为下步行动准备身体预算。

第三，情绪是差异化和多元的，而非普适性和单一的。

传统情绪论认为，所有人类都有一套相同的情绪系统，存在普适性的标准情绪，只要给出一个特定的刺激，就会激活一种特定的情绪。巴瑞特提出一种群体视角，认为人群中有共通的情绪概念和情绪类别，但个体间只有高度差异化的情绪实例，变异性才是常态。

第四，情绪是习得、文化和社会的，而不仅仅是遗传、生物和个人的。

传统情绪论认为，情绪是一种遗传而来的原始生物本能，而且更多站在个人角度讨论情绪。情绪建构论则强调文化概念和社会角色在情绪建构和分享时的作用。

你所属文化中的情绪概念和情绪词汇参与塑造你的大脑回路和身体变化。比如说，登上舞台的时候，你把自己心跳加速归结于焦虑，就会建构一种不利的情绪实例，让你感到更加紧张；相反，如果你把心跳加速归结于兴奋，则会构建一种有利的情绪实例，让你感到更加放松。

情绪也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例如，作为家长的你和作为老师的你，在遭遇孩子考试失利时所建构起来的情绪实例可能会有所不同。

如果你接受巴瑞特的情绪建构论，就会相信自己是情绪的主宰者。那么，我们到底如何掌控自己的情绪呢？

1.保持身体健康

情绪的基础是情感，情感的来源是身体。若想控制自己的情绪，你要确保身体预算处于良好状态。巴瑞特建议我们安排好自己的饮食、睡眠和运动。你要做的是从自身实际出发，让自己感觉良好。

2.整理情感空间

你的大脑不停地用过去的体验，预测哪些物体和事件将会影响你的身体预算，改变你的情感。这些可能影响你的情感的人事物集合起来，就是你的情感空间。

巴瑞特有两点建议，一是体验生活，外出旅行、看电影，尝试新的美食，做一个体验收藏家，丰富自己的情感空间；二是记录生活，每天记录自己的积极体验，偶尔也建构一些消极情绪。有一些消极情绪实例有实战意义，如在一场重大比赛前，足球运动员培养愤怒情绪。他们喊叫、蹦跳、冲着空中挥拳，目的是激起自己的斗志，击败对手。

3.拒绝情感现实

有时候我们会把体验到的情感或身体感受，看作外部世界一个物体或者事件的特征。如一个人递给你一杯热水，你就觉得这个人很热心。一个人给你一杯冷可乐，你就觉得这个人很冷漠。更有甚者，会把自己的心情不好，归结于他人做了什么坏事，甚至觉得他人是坏人。

我们在调控情绪时，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情感现实主义的存在，并努力留有好奇心，保持开放的心态，时刻敢于质疑自己的直觉判断。更重要的是，牢记一点：一种糟糕的感觉并不总是意味着事情出错了，它只是说明了你的身体预算负担过重。学会重新解读自己的身体状态，拒绝情感现实主义的蒙蔽。

4.积累情绪概念

你需要学习大量的情绪概念，才能在特定情境下，构建出一个最有用的情绪实例。获取情绪概念的路径有几种：

一是与生俱来，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是天生就有的；二是词汇学习，人类天生就会从周围的规律和概率中学习；三是概念创新，通过概念组合，你可以根据已有的概念构建无数个新概念，你还可以原创概念，最重要的是使用概念；四是文化影响，人们的情绪概念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情绪还会发生转变。

5.掌握具体技巧

如果说前面的四点都是为了掌控情绪做铺垫的话，那么当我们真正打算调整情绪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下三件事情：

一是调适身体。站起来走两下，冲个澡，或者睡一觉，让自己舒服点，都可以有效地调节情绪。

二是改变情境。改变你所处的位置或者环境，或者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由此改变情绪建构的视角和原料。

三是重新表述。把你的想法、情感和感觉划回到生理感觉类别，再利用丰富的情绪概念系统，对生理感觉进行重新分类，建构新的情绪实例。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座右铭“痛苦可以让懦弱远离身体”，把忍耐痛苦重构为刚毅勇武，也是这个策略。

更多精彩请阅读：【专题】心智

版面编辑：刘潇

天眼丨巴赫穆特鏖战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图丨Aris Messinis/视觉中国

图丨Aris Messinis/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2023年3月8日，顿涅茨克地区巴赫穆特，乌克兰军人奔赴前线。顿涅茨克地区交通要地巴赫穆特是俄乌双方近期攻防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8日，俄罗斯的雇佣兵集团“瓦格纳”的创始人普里戈任表示，瓦格纳所属的战斗集群已经控制巴赫穆特约45%—50%区域，市区东部基本已被控制。防守一方的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表示，乌军在巴赫穆特的阵地将继续加固，防御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北约秘书长承认，在几天之内，巴赫穆特可能失守。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部队正准备在巴赫穆特发动反攻。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乌克兰战火

版面编辑：刘潇

回声（《财新周刊》2023年第09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巍巍峰鸣:对于缺乏财富的我等芸芸众生，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注意力和时间，请把时间用在重要的事情上。

《抖音略地》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数据合规问题好解决，说白了就是成本问题，但是政治信任问题几乎无解。

《抖音略地》

马桶狼:居民的信心来自预期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如果预期收入增长困难，是很难增加消费支出的。

《提信心、稳预期，关键看行动》

xian's ocean:放下人定胜天，改革既得利益。

《提信心、稳预期，关键看行动》

Daniel5090: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已达纽约、旧金山水平，但收入只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地产刺激空间越来越小且副作用影响广泛。

《楼市初现复苏》

版面编辑：刘潇

读周刊看视频（《财新周刊》2023年第10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2月21日，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基金会主席彼得·诺贝尔宣布，将首届可持续发展特别贡献奖授予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财新周刊》《解振华获奖》，相关视频：解振华获首届诺贝尔可持续发展特别贡献奖

欧美需求的回暖难以形成稳态趋势，需求与金融环境形成强烈的负反馈回归型关系；中国经济回暖的置信度很高——@《财新周刊》《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了吗》，相关视频：分析：全球经济前景好于此前预期

欧美封禁政府相关设备和人员使用TikTok，试图引导大众选择。TikTok在商业化路上小心前行，障碍重重——@《财新周刊》《TikTok：刀尖上的全球化》，相关视频：字节跳动称并无出售海外版抖音TikTok的计划

版面编辑：刘潇

财新视听内容精选（《财新周刊》2023年第10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财新时间】历史学家王笛：于无声处听惊雷

王笛多年浸淫于基层社会史研究，那些掩盖在帝王伟业、英雄功绩下的芸芸众生、家长里短，在他眼中是如此富有魅力

【华尔街原声】

楼市继续"给油"：扬州取消限购、广州错峰出地

【周五晚7点】

2月PMI创十年新高：马斯克"宏图计划"欲告别稀土

版面编辑：刘潇

答疑（《财新周刊》2023年第10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联系编辑部：邮箱newsroom@caixin.com或电话（010）8590 5000

广州读者 肖琦：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销售疲软、库存高企，行业掀起降价潮，将给二手电动车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本刊产业新闻部：

2023年1月，特斯拉率先打响价格战，新能源车企大范围跟进，打破行业预期，电动汽车二手车保值率上升趋势不可避免受到冲击。

降价潮之下，二手电动汽车保值率如何应对冲击近期备受关注。新车价格变化传导到二手车需要一个月左右，现在电动汽车估值下降趋势已经显现。

燃油车三年整体保值率约为70%，电动汽车保值率较之存在明显差距，电动汽车整体价格剧烈波动更不是好消息。新车和二手车之间互为价格支撑，新车价格高、市场表现好，二手车保值率就高，二手车市场表现好也会反过来支撑新车价格体系稳定。

为了稳定消费者预期，电动车企普遍开展认证二手车业务，打造自身估值体系，并且宣布在必要时保值回购。“保值回购”指车企承诺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回收车主二手车，虽然车企会承担部分成本，但可以解除新车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促进销售。此外，电动汽车二手车出现车企直营趋势，消费者从车企渠道购买二手车也更有保障。

为了销售新车，大部分智能电动车企都推出首任车主权益，包含大量免费服务和优惠。这些权益在车辆转让时就会失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助理会长罗磊建议车企采取措施保障二手车车主权益，支撑二手车保值率有利于新车销售。□

版面编辑：刘潇

最新财新周刊丨类器官会替代动物实验吗？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随着“强制动物实验”的法规作古，新药研究在“进入人体前最后一步”有了更多可能性



2009年7月5日，四川省人民医院实验动物研究所，工作人员定时给猴子分配食物。猴子是目前常用的一类科学实验动物，在非临床阶段常被用来进行药理学、毒理学、药物代谢动力学以及药效方面的研究。

文丨财新周刊 徐路易

一种新药从研发到上市一般要经过五个阶段：候选药物研发、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Ⅰ期、Ⅱ期、Ⅲ期）、审批上市和上市后监测（Ⅳ期临床试验）。在新药物进入人体也就是临床试验阶段之前的非临床研究阶段，动物实验长期以来一直是测试、评估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主要方法。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记载人们通过动物鉴定食物毒性，以及通过动物实验筛选药材。到了20世纪，动物实验更成为一些国家法律规定的新药研发“标配”。比如1938年，美国法律规定新药进行人体临床试验前，必须在动物身上做安全性和有效性测试。荷兰内梅亨大学实验室动物科学教授梅雷尔·霍廷加曾撰文介绍，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有人因一种溶解在防冻液中的抗生素中毒而死，同时为了避免重复纳粹残忍的人体医学试验和药物沙利度胺引起的胎儿发育问题，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制定了上述规则。

与此同时，过去两个世纪猩猩、猴子等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让人类对自身的情感、认知等有了更多了解，意识到实验会给动物带来的痛苦。包括数据分析、细胞建模、类器官、器官芯片等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对药物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考量不必再完全依赖于动物实验。随之，法规层面对非临床阶段动物实验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

2022年9月底，美国肯塔基州参议员、眼科医生兰德·保罗（Randal Paul）提交议案，要求FDA授权可以使用某些方法替代动物实验，包括基于细胞的实验和计算机模型在非临床阶段研究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获得FDA对动物实验的豁免。该议案于2023年1月下旬通过，结束了美国在新药审批领域自1938年以来的“强制动物实验”规定。

与取消“动物实验强制令”一同发生的，是美国FDA要正式执行的2023年预算中，新增了500万美元投资鼓励开发适合的替代方法来减少动物实验，并鼓励采用可替代、减少和改进动物实验的方法。这些新的替代方法料需提供更及时、更可预测的信息，从而能够加速产品的开发并加强应急准备。

近年来全球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迅速，非临床试验阶段的研究需求激增，导致经典实验动物市场价格猛涨，这也推动了各类非动物药理研究模型得到重视和发展。多重合力下，药物在“进入人体前最后一步”研究领域的开放式格局，正在进一步打开。

一猴难求

上海柯棣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旗下海外医疗旅游品牌康安途的创始人杨晨，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到养猴的。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读博士时，杨晨研究的是丙型肝炎，当时丙肝特效药索菲布韦尚未引入中国，每片原厂价高达1000美元（超6100元人民币），而印度仿制药的价格则在每片17300卢比（约合1800元人民币）。与电影《我不是药神》类似，杨晨开始全职创业的时候，曾想过做仿制药贸易，但考虑到其中的侵权风险，他换了个思路：药虽然不能进来，但人可以出去。于是他开始了医疗旅行的业务，简单来说，就是以医疗保健为目的，接待患者在仿制药生产地（比如印度）进行观光疗养。

慢慢地，杨晨发现印度的仿制药有不少以次充好的情况，决定自己做仿制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全球仅数十个最不发达国家拥有医药产品的专利豁免期，在亚洲杨晨只有9个可选国家，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建造

药厂。“比如尼泊尔在高原上，人车来回都不方便，还有些国家老打仗，最后就剩下老挝、缅甸、柬埔寨和孟加拉国比较合适。”在比较了与中国的接壤情况、国家稳定与安全性之后，2019年，杨晨选择在老挝开设药厂。

到了2021年，陆续有一些国内企业向杨晨咨询能否做海外临床试验，彼时由于国内适合参与新冠疫苗临床试验的受试者很少，许多疫苗厂商都在寻求国外的可行性。康安途帮助国内一家从事新冠mRNA疫苗研发的企业完成了在老挝的I期临床试验，此后各种新药海外试验订单纷至沓来。这时，在老挝已经扎根了五六年的杨晨才意识到他们不仅可以做仿制药，还可以做创新药。于是，杨晨开始承接新药研发的合同研究组织（CRO）业务，其中就包括繁殖实验猴为自己的CRO实验室提供动物源，做早期毒理学和药代动力学研究。

猴子是目前常用的一类科学实验动物，在非临床阶段常被用来进行药理学、毒理学、药物代谢动力学以及药效方面的研究。杨晨告诉财新，目前新药领域会优先采用猴子作实验动物的主要为抗体、疫苗、核酸类药物等大分子生物药，这是因为它的代谢过程比小分子药物复杂得多，历史经验也发现大分子生物药的代谢路径在小鼠和人身上差异较大，因此猴子目前是这类药物的实验首选。

在各种猴子中，食蟹猴和恒河猴（也称普通猕猴）以温顺的性格、众多的数量以及易培育等特点，成为实验室的首选猴种。云南省实验动物学会的资料显示，普通猕猴基因组与人类基因组系列相似度为92%—95%，具有与人类相似的代谢特征，且大脑发达。不过相比起小鼠、猪等一胎多生的常用实验动物，普通猕猴一般每年产一胎，每胎产一仔，双胞胎很少见；食蟹猴的孕期则为6—7个月，每胎也只产一仔。猴场的运营成本主要是引进种猴的花费，种猴需要持续引入才能避免人工繁殖的猴群出现近亲繁殖。食蟹猴的生长温度一般在19—29℃，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亚洲热带地区，纬度更高的地区饲养食蟹猴需要增加空调或供暖的成本。作为食蟹猴天然的栖息地，老挝的猴群野外存量大，当地就有食蟹猴爱吃的水果和河蟹，因此杨晨在老挝就地建立猴场，引种、食物、能源等成本上的压力都小很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相关数据显示，全球的食蟹猴贸易自2004年后出现大幅增长，此后一直是交易量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业内人士向财新介绍，国内新药研究近几年迅速发展，实验用猴大多是从东南亚引入种猴，培养原代及第一代，到第二、第三代后，大部分用于出口。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最大的猴科动物出口国大部分时候是美国，另有一部分留作自用。

新冠疫情暴发后，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发布《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下称《公告》），野生动物的进出口贸易随之暂停。据财新了解，2020年后美国不再从中国进口实验用猴，转而直接从东南亚等地进口。公开资料显示，激增的需求以及收窄的供给造成实验猴价格飙升，2019年下半年每只食蟹猴的价格约为1.5万元，到2021年一度飙升至20万元/只。杨晨坦言，现在有不少人专门做猴子倒卖的生意。

2022年6月起，《公告》不再执行。同期，杨晨在老挝的猴场完成了一期建设，几百只食蟹猴主要服务于本公司的CRO业务。下游企业将新药样本送至老挝，由CRO公司进行非临床相关研究以及临床前的预试验。杨晨的二期目标是在中国境内建立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实验室（GLP），从而可以继续开展非临床研究阶段的GLP业务。非临床阶段在中国认证的GLP实验室完成药效研究、药物代谢动力学、安全性等有关化学数据后，企业可以向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做Ⅰ期临床试验。

国金证券研究所的研报显示，从需求看，临床前CRO行业高景气，新药研发节奏加快及疫情等原因，加大了行业对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的使用；从供给看，实验用猴从繁育到能出栏用于实验，需要大约四年，受各种原因限制，未来五年出栏商品猴数量可能仍呈下降趋势，短缺问题料将于2025年后才会缓和。

类器官的优势

但有些新的疾病，人们难以找到合适的动物来测试新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比如感染性疾病具有种属特异性，也就是感染人的不一定感染动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何康信博士解释道，即便用工程化的模式动物所模拟的感染，表现出来的致病机理也可能和人类不完全一致，用动物模型做传染病药物开发，很多时候解答不了人类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再比如全球约有5000万患者的阿尔茨海默病，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主要症状包括认知功能减退、精神行为异常等。“认知”“精神”这些被认为灵长类甚至惟独人类才有的能力，让动物模型爱莫能助。科学家们一直在试图建立动物模型深入了解阿尔茨海默症，但每个模型都不尽如人意：非转基因小鼠中阿尔茨海默病的表型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发出现，这与人类的情况非常不同，科学家认为两者的致病路径可能完全不同；常用的转基因啮齿动物模型，则很可能携带啮齿动物独有的阿尔茨海默突变。

科学家们也构建过阿尔茨海默细胞模型，利用人工诱导多能干细胞衍生的神经元进行了传统的单层细胞培养，但传统细胞模型没有细胞间质空间，无法显示细胞外淀粉样物质的沉积，而这正是人类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生物标志之一。许多科学家认为，这些临床前模型的缺陷也是一些药物在临床上“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2023年1月，美国FDA批准新药时不再强制要求临床前的动物实验。有业内人士向财新分析，FDA需要批准更多阿尔茨海默病方面的治疗进入临床试验，但由于没有可靠的动物实验数据，目前最好的非临床阶段试验利用的是大脑类器官结合计算机模拟。

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苏佳灿向财新介绍，类器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体器官，但在结构与功能上能

模拟真实的器官，并能够进行长期、稳定的传代培养。比如大脑类器官拥有与大脑类似的结构和成分，神经干细胞能够在大脑的微环境中分化为神经细胞，于是科学家们用特殊的凝胶来模拟胚胎组织的环境，将孵化器设置在体内温度，并增加一些凝胶的流动来模拟血流，干细胞逐渐在环境中成长为一个迷你版的早期大脑，其神经元可以彼此连接并形成非常简单的神经网络。"迷你大脑"的发育步骤和婴儿大脑的发育几乎完全一致，进而科学家们可以研究神经元是如何发育以及退化的。

在漫长的医学史上，相对于动物实验，人们对类器官的了解还不到15年。2009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分子基因组学教授汉斯·克莱弗斯利用肠道干细胞成功培养出首个小肠类器官，标志着类器官研究的开始。此后，一度困扰科学界很久的核心问题是：多少比例的糖、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配比才能让干细胞分化。除此外的其余部分并不困难，只要培养环境适合，干细胞就会自己成长——像一颗种子只要有土壤、水分和阳光就可以长成大树。上述核心问题在2013年被攻克，并成功培育出脑类器官。同年，类器官技术也被《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十大技术。2018年，食管类器官首次被临床应用于人类胃食管癌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新冠疫情早期许多关于病毒对人体器官影响的研究，也是在类器官上开展的。荷兰内梅亨大学霍廷加教授表示，2020年12月，也就是确认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公布不到一年，欧盟委员会就已授予辉瑞疫苗有条件上市许可。经她走访发现，在加速批准候选疫苗的过程中，疫苗的监管程序和要求发生了变化。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允许部分临床前体内动物实验在I期或II期临床试验开始后进行，并相应采用了滚动审查程序，在此过程中EMA还提倡使用通过非动物方法获得数据。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实验室里，何康信团队正在培养肿瘤组织类器官。病人入组后，实验人员对病人的新鲜组织进行取样，将肿瘤组织进行解离得到肿瘤原代细胞，再进行类器官培养。在培养基中适时添加合适的化学小分子抑制剂或激活剂、相应的细胞因子，诱导形成相应器官的类器官。从这一步到获得符合需求的类器官，大约需要一两周时间。其间研究人员要在显微镜下每天观察其生长状态，一般7天内可以看到类器官基本的形态，14天内如果看见类器官明显长成，就可以认定为是培育较好的类器官。在快速增长时期，团队还要为类器官进行传代扩增，否则类器官会衰老和凋亡。

何康信告诉财新，传统的细胞系（指原代细胞培养物经首次传代成功后所繁殖的细胞群体）无法真正反映癌细胞在人体内的病理特征，而这些特征可能才是反映一个癌症病人对抗癌药物是否敏感的标志。来自患者身上的癌灶组织能够高度重现源组织的结构、生理特征和遗传特征。何康信要在这些类器官上为肿瘤患者先试药，观察药物对肿瘤生长的抑制，大约需两周到一个月左右。过往研究发现，肿瘤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对预测患者药物反应的准确率约为80%。

近年中国对类器官领域的研究格外重视。2021年，科技部下发《关于对"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6个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的通知》，疾病类器官属于"基于干细胞的人类重大难治性疾病模型"，被列为"十四五"首批重点专项。2022年，共67项类器官相关研究中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其中苏佳灿负责的《基于DNA水凝胶空间特征化骨类器官构建及其再生修复研究》入选重点项目。

据财新了解，目前全球还没有研究团队报告培育出了相对完善的骨类器官。"骨类器官是所有类器官中最难做的，全世界研究的团队较少。像大家熟知的脑、肝、肾、肠类器官都是软组织性质的，而骨是硬组织器官，需要在结构、力学性能、三维立体上维持空间特征化。"苏佳灿介绍，常用经典骨疾病动物模型有去卵巢小鼠模型用于骨质疏松症的药物研究，以及前交叉韧带离断小鼠模型用于骨关节炎药物研究。传统骨疾病发病周期长，这两种模型建立至少需要8周时间。而类器官构建速度快，培养成功一周之后就可以进行药物筛选，可以减少约一半时间，此外包括骨类器官在内的类器官可大规模高通量筛选药物，不仅可以在孔板上进行多种药物的筛查，每个药物还可以测试不同的浓度。

何康信认为，在新药研究中，类器官不仅可以用来在非临床阶段进行高通量药筛，还可以指导临床试验如何分层设计，剂量爬坡，扩大适应症，极大降低临床试验阶段的成本。高通量药筛（HTS）技术是指以分子水平和细胞水平的实验方法为基础，以微板形式作为实验工具载体，以自动化操作系统执行实验过程，以计算机分析处理实验数据，在同一时间检测数以千万的样品并以数据库支持运转的药筛技术体系。

多方法融合的探索

类器官作为体外培养的新兴方法，在器官层面能为人们提供更细致的医学理解，但人是一个整体，外源感染或癌细胞在人体的扩散涉及不止一个器官，因此在应用到临床转化方面，类器官还需融合其他方法。

经典化疗药物的新药临床前阶段，人源肿瘤异种移植小鼠模型（PDX）被广泛应用。PDX是将人的肿瘤组织移植到免疫缺陷的小鼠体内，并以此为模型进行疾病发生机制和药筛的研究。

上海立迪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立迪生物"）拥有超过1800个PDX模型，但其CEO闻丹忆觉得PDX还不够好。传统PDX模型需要两三个月才能发育成瘤，药效实验再花两个月，一般需要半年才能出具报告，这种方式给药厂做药筛时间合适，但为肿瘤患者评估用药，"怕是要赶不上趟了"。

2009年，克莱弗斯里程碑式的小肠类器官研究也启发了闻丹忆。2013年她的团队尝试用类器官技术支持药物开发，但她发现体外给药只能从细胞表面直接渗入类器官组织，而人服药和代谢药物的过程要复杂得多。"像临床常用的抗肿瘤药物替吉奥，是5-氟尿嘧啶（5-Fu）的前药，进入人体内后只有在体内经过肝脏代谢转化为5-Fu才能发

挥作用，因此体外版的类器官无法检测替吉奥的药效”。

闻丹忆团队取患者自身新鲜的肿瘤组织培养出肿瘤类器官，装入特殊的胶囊装置，再植入免疫缺陷小鼠皮下进行体内药敏检测；实验结束后将细胞取出，测试细胞活力，从而判定患者肿瘤细胞对药物的反应。经过6年多研究调试，2018年9月相关成果在期刊《肿瘤通讯》上发表，这个被闻丹忆命名为“MiniPDX”的模型申请了专利。体内版类器官缩短了肿瘤培育时间，在小鼠身上进行7天实验，不到两周就可反馈结果。不仅时间缩短，持续运行成本也会降低，比传统PDX费用降低了90%。目前miniPDX的应用范围包括检测靶向药、抗血管生成药、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分子胶及化药等等。近期立迪生物与美国生物统计学CRO公司思特尔签署战略合作，将加速实现从临床前阶段到临床试验的无缝过渡。

何康信告诉财新，人源肿瘤类器官（PDO）生物样本库与PDX是最佳的互补，可以通过冻存复苏的PDO给予PDX多次的植入机会。同时，类器官也需要器官芯片的支持。

2021年12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发布的多项指导原则中，在模型选择部分提到，没有合适的动物模型时，可采用基于细胞和组织的模型（如2D和3D组织模型、类器官和微流体模型），这些模拟人体内环境的模型也可为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评估提供有用的补充信息。这里提到的微流体模型，就是俗称的“器官芯片”。

一个橡皮擦硬度的半透明芯片，在哈佛大学维斯生物工程研究所教授唐纳德·英格伯（Donald Ingber）的手里，还没有三分之一个巴掌大。工程师出身的英格伯认为真正改变医药业的是工程。在他看来，动物实验成本高昂、耗时，在伦理道德上一直存在争议，更重要的是，通过动物实验数据常常无法预测人类临床试验中获得的结果。2009年，英格伯读到的一篇研究描述了各种药物的生物利用度，结果显示一些在狗身上显示出高水平生物利用度的药物，在人类身上的生物利用度非常低，无论何种药物或物种都是如此。总的来说，一种药物在人类中的作用与它在任何特定动物物种或其任何组合中的作用之间没有关联。

也是在这一年，英格伯与其他五名在领域上几乎没有交集的学者建立了生物尺度微系统平台，他们想做出一种带人类细胞的芯片，可以重现器官功能，应用于药筛或诊断。2010年，全球第一个肺器官芯片诞生，相关研究发表在了《科学》杂志。这项技术很快进入商业化，2011年荷兰工程师保罗·沃尔托创立器官芯片公司Mimetas；2013年英格伯创立Emulate公司，其团队开发的肝脏芯片后与美国FDA开展合作。2020年，中国工程院将器官芯片评选为全球工程前沿技术。



2018年9月3日，广州中山六院，实验室里养的黑鼠。近年来全球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迅速，非临床试验阶段的研究需求激增，导致经典实验动物的市场价格猛涨，这也推动了各类非动物药理研究模型得到重视和发展。

沃尔托2019年接受财新采访时曾表示，Mimetas公司在进行类器官与器官芯片的技术融合，其类器官芯片的工作流程几乎是全自动的：机器将细胞外基质装入凝胶，把细胞接种到类器官芯片后加入细胞培养基；随后定时更换培养基，再对平板样品进行制备和装载。将小小的芯片放入机器中，就可以在显示屏上对类器官芯片进行血管生成3D成像和分析，观察血管管腔在类器官芯片中是否形成，形成后再用3D扫描技术对类器官芯片进行扫描，通过高通量的三维体积分析获得测量结果，识别三维空间中的细胞个体，同时还可以获得细胞核中的参数。由于器官芯片需要基质进行灌注，灌注通道内会生成微血管，因此最后还需要过滤掉灌注通道内的细胞，将细胞核和细胞体分别进行分割标记。

“类器官及其微流控芯片是优秀的体外研究的疾病模型之一，可参与临床前药筛、药效、安全评估以及临床研究。”何康信表示，通过器官芯片的微流控，可以让类器官实现培养基的定向流动并模拟剪切力，通过不同的区室

来实现多细胞组分多层次的共同培养，从而达到较好的均一性和自持性；此外，类器官作为体外培养手段，相较于体内试验最缺乏的就是人体微环境，未来通过各种技术融合，类器官还可以模拟体内的免疫微环境和基质细胞，也可以模拟血管网络。

动物模型的终结？

微电子工程领域有著名的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1倍，或者说，处理器的性能大约每两年翻1倍，同时价格下降一半。生物医学领域则有着逆摩尔定律的“爱隆定律”：尽管有高通量筛选、生物科技、组合化学和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等领域的科技进步，新药的研发还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慢且变贵。

“就算新药研发要失败，最好也能更便宜、更快速地失败。”多名业内人士这样总结道，这是动物实验替代方法学在近几年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更大的背景则是对动物福利的重视今非昔比。清华大学药学院创院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主任丁胜告诉财新，上述美国2023年开始执行的新法案背后还有复杂的政治因素，也是对长期民意的回应。该法案并非“取消动物实验”，而是在替代能力足够或者无法使用动物模型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其他方法，从而减少动物用量。美国爱荷华大学药学院教授埃利阿斯格·塞勒姆表示，选择使用这些替代测试方法来替代动物测试的公司必须了解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以确保他们的药物是安全的——非临床阶段的数据仍然需要可靠性。

中国政府2007年发布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下称《办法》）中规定，在菌毒种选种阶段制备的疫苗或者其他特殊药物，确无合适的动物模型且实验室无法评价其疗效的，在保证受试者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进行临床试验。到2017年更新一版《办法》中，对非临床阶段的要求未再提到“动物模型”一词。

“中国没有明文要求非临床阶段必须使用动物实验。”丁胜告诉财新，非临床阶段的核心是提供一整套合理的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来支撑候选药物进入人体临床实验，从药物研发的角度而言，并没有限制一定要用什么模型来证明药效。药监改革后，在这一阶段主要为了明确证明药物有效性的主体责任在药物研发机构一方，使用多种合理的模型来判断并降低药物研发风险，也是药物研发机构的目标。

善待动物组织（PETA）高级顾问、灵长类动物学家丽莎·琼斯-恩格尔 (Lisa Jones-Engel)曾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国家非人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高级研究科学家，美国大多数用于科学研究的非人灵长类实验均需从国家级研究中心获取实验用猴。她告诉财新，动物模型的逻辑是其与人类体内微环境相像，因此可以作为人体临床试验前的参照。与人类在进化程度上最接近的是大猿类动物，包括黑猩猩、倭黑猩猩、大猩猩等，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全球有不少实验是用大猿类做的，比如上世纪20年代知名心理学家沃尔夫冈·柯勒的认知实验，直到上世纪末各国陆续出台明文禁令禁止用大猩猩做实验。“过往的实验让人们知道黑猩猩参与实验所受的痛苦，同时替代黑猩猩的办法也在逐渐出现。”恩格尔说。

涉及动物的实验，其在道德伦理与科学发展间的边界一直是科学界探讨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邱仁宗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雷瑞鹏合著的文章《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的伦理问题》中提到，动物所受痛苦的概率和程度是动物实验中尤为值得注意的，论文援引英国一份研究报告称，如果研究引起的灵长类动物痛苦很大，那么惟有受益很大才可被允许。但该报告调查发现，约9%的研究意义不大，引起灵长类动物的痛苦却很大。

与之类似，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领域有知名的“14天原则”，这是因为胚胎发育的第14天会开始出现原胚条，标志着原肠胚开始发育，这其中也包括神经系统发育的开始，而复杂庞大的神经系统正是动物感知“痛觉”的源头。

目前全球已有许多国家在化妆品领域逐步取消了动物实验的要求。化妆品动物实验主要用于做皮肤渗透、皮肤敏化、急性毒性等测试。其中有些测试要在不进行任何疼痛处理的情况下，将兔子的毛剃光涂抹化妆品，进行皮肤和眼球刺激试验，而皮肤和眼球是兔子非常敏感的部位。随着体外模型的成熟、既往实验数据的再利用，以及模拟皮肤等再生领域的突破，“化妆品取消动物测试”的呼声越来越高。1998年，英国宣布全面禁止对化妆品成分进行动物测试。200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批准对皮肤吸收性、腐蚀性和光毒性进行非动物性替代测试。2013年，欧盟全面禁止对化妆品成分进行动物测试。2014年，中国也取消了对普通化妆品（不包括药妆等功能性化妆品）进行动物测试的要求，后在2020年4月进一步修订，完全取消了对所有化妆品的强制性动物实验要求。

对于动物实验的必要性，科学界角度不一、观点不一，目前全球公认用动物进行实验需要遵循“3R原则”，即替代（Replacement）、减少（Reduction）、优化（Refinement），简言之就是有替代就少用或不用动物，采用尽量少的动物获得同样多的实验数据，实验过程中应减轻动物所受的痛苦。

恩格尔认为，按照动物实验的逻辑，现在使用的小鼠、长尾食蟹猴等均不适合做动物实验，“倭黑猩猩跟人类的进化距离差不到300万年，食蟹猴和人类的进化距离超过8000万年，小鼠和其他的实验动物与人类的进化距离更长，没有什么参考意义，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动物实验的结果与人类试验的结果差异那么大。它们除了是活的，跟人类又有什么关系呢？”但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活体微环境是观察药物反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目前动物实验仍然不可取消。

永远复杂的现实

从药品审批的角度，丁胜认为，目前做药品开发，在进入人体之前还是更希望通过动物来做评判，其根本原因是体外实验和体内实验有本质的区别和局限性。一方面因为从体外直接到人体内，对药物研发风险的控制不够；另一方面，漫长的历史中，动物模型积累了足够多的实验数据，尽管不是最好，但早已为人们熟知，药企可能会更倾向于用已有的模型框架进行实验并出具报告，规避在新技术上认知局限的风险，也避免在行政申请流程中对新技术进行冗杂的阐释；而审批者对非临床试验的可靠性进行评判，现有的模型成熟度也会被纳入考量。这是新技术入局的普遍难点。

实际上，即便无法做到完全不用动物模型，与新技术的结合也可以减少对动物的使用。闻丹忆告诉财新，传统PDX模型需要按药物剂量分组，一次实验至少需要用到三四十只小鼠，而结合了类器官的动物模型，一次实验小鼠用量可以减少到两三只。这也是通过技术革新维护动物福利的体现。

何康信也表示，他和越来越多的药企探讨发现，在小鼠身上做的数据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最后还是免不了要做类器官。“动物在药代动力学、血氧浓度反馈方面有一定价值，目前在微环境上比类器官强。但类器官到底是人源培养的，各种反馈都比小鼠更接近人。”他认为，随着器官芯片的完善，未来在仿真性方面类器官也会进一步提高。

另一方面，新兴技术的出现不意味着可以完全规避生命科学发展中的道德伦理问题。在大脑类器官出现后，很多人担心这种体外组织会产生自我意识。多名学者告诉财新，目前大脑类器官与大脑拥有几乎同样的组织，只是不像人类大脑拥有百亿个神经元，大脑类器官一般只有10万个神经元。人类大脑之所以如此高度智慧，很重要的一点是其体量大。技术层面上，在没有血管支持的情况下，大脑类器官最多只能长到一厘米见方。尽管如此，厦门大学医学院生命伦理中心常务副主任马永慧还是强调了其可能带来的风险，比如由于类器官是活样本，且可以无限传代，未来建立类器官样本库大规模用于药筛时，如何对患者数据进行隐私保护和数据脱敏，在研究当中如何对受试者的权益进行保护，未来商业化用于临床试验中，提供类器官的个人有哪些权益应当主张，这些问题很快也应提上日程进行讨论和规制。

丁胜认为，未来5—10年类器官将更多在科学研究方面有快速发展和应用，人们拥有新的模型和工具来研究以前研究不了的东西，比如具备特定生理特征的多种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等，但在商业化的临床实践中，其与动物模型暂时还不是替代关系。

综合多名业内人士的分析，动物模型生物关联性较好且拥有体内微环境，但耗时长且成本极高；细胞系模型的生物关联性相对最低且缺乏微环境支持，但成本低，可重复性强；器官芯片可以模拟组织之间的交互并可以对器官进行共培养，但芯片与芯片之间可能缺乏环境一致性，没有标准的操作模板；3D细胞培养和类器官培养都可以重现复杂的结构，且病人的遗传特征性较高，但培养出的器官大小难以控制，下游分析较复杂；人源组织动物模型可以控制组织移植前的情况并拥有体内微环境，但与人体免疫系统不同，成本也高。

“人们当然希望能有一个简单、便宜、通量高、时间短又准确的模型，但这样的模型是不存在的。以衰老为例，只能活两三年的小鼠如何解答一个能活100年的物种的问题？尤其是很多慢性疾病是随着衰老才渐变为多因素的复杂疾病。现实问题永远是复杂的。”丁胜总结道，“要想完美地模拟，成本是非常高的，可能体外体内以及动物模型都有价值，通常大家会选择用多个模型去平衡回答一系列的问题，而并不局限于某一种模型。”

霍廷加认为，不应仅仅要求将非动物实验与动物实验的结果进行比较，只要有可能，应将非临床数据与人类数据直接进行比较。很多人认为，预测药物在人类身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最佳方法始终是在另一种哺乳动物身上进行测试；但也有很多研究发现，动物研究常常无法预测人类身上可能发生的毒性，或者预测未观察到的毒性，比如某些抗生素对豚鼠有毒，但对人类没有毒性。因此，她建议对现有的动物实验也要进行严格的评估，逐步制定对所有方法都适用的金标准，这样不仅可以使公众和监管机构放心，还能催生更多基于证据而非传统的临床前评估方法。

版面编辑：刘潇

随笔｜美国文学名著的浮沉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现在美国社会深度撕裂，阴魂被符咒召唤归来，极左极右两翼都以禁书来匡正视听，清除污垢。这种古老冲动来自"端正"别家价值观的原始内驱力



纽约最大的旧书店Strand Bookstore，创办于1927年，号称店里的书排列起来长达18英里。

文｜孔捷生
作家

我最饥饿的阅读是在20世纪，只缘少年时天地酷旱，万物枯焦，及至解冻之年，弯曲透过墙隙的微光倏然化为明亮灯窗，让我成为读书狂。

及至21世纪，我已身在异乡，一星浮萍被白浪推上碛滩，在陌生泥土伸出触须般的根系，方知文化融入殊非易事。惭愧得很，我熟悉的仍是美国上世纪的作品。

不永恒的经典

美国高中生英语课必读"老三篇"——莎士比亚的《凯撒之死》、梅尔维尔的《白鲸》、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老美有时蹦出莎士比亚警句，非因学养高深，就像送餐小哥也会脱口而出"谁知盘中餐""每逢佳节倍思亲"，都是童子功。

我儿子在美国读高中是20世纪末期，英文作业是《白鲸》读后感。那是我母亲读过的小说，亦系我的美国文学启蒙之书，轮到他已是三代人的阅读，这就是穿越光阴之作。

然而，经典作品各有命数。到了21世纪，《白鲸》竟经不起岁月淘洗，几年前已从必读书单黯然落榜，就像书中消失在风涛里的鲸鱼。经典并不代表永恒，宇宙间没什么是永恒的，连同我们栖息的蓝色星球。

当年我读《白鲸》，觉得虽欠缺故事性，但悬疑、追逐、血腥、死亡等多元素神秘隐喻交织出阴郁气氛，释出读者的肾上腺素，为天际孤帆与怒海长鲸的命运而焦虑。亚哈船长被白鲸咬断一条腿，他立誓，"谁胆敢对我不敬，哪怕是太阳得罪我，我也会出手痛击。"于是，他追到天涯海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哪怕与白鲸同归于尽，也要一报此仇。

亚哈船长代表着硬汉性格，蛮勇剽悍，锐意进取，快意恩仇。然而，这种典型的美国牛仔精神常会走火入魔。小布什生于康涅狄格州，两岁就搬到得州，在休斯敦长大。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就是一场得州牛仔之战，阿富汗战争亦是一例。当时遭五雷轰顶的塔利班已乞降，却被小布什政府峻拒，非灭了它而后快。结果，牛仔战士继英国人、俄罗斯人之后遁走，在满目疮痍的阿富汗写下"帝国坟场"新篇。

《白鲸》曾洄游穿过几代人，却遭新世代青少年冷遇，原因在于小说本身有基因缺陷。作家梅尔维尔笔下的海洋并非生命之源，全无人类生存有赖于海洋恩赐的现代意识。在小说里，人是大自然的征服者；大海如"幽灵一般""冷酷恶毒"，哪怕水天一色的晴朗日子。在作家眼里，海洋像"大寿衣似的"，起伏舒缓的洋面"隐藏着一种邪恶魔力"，而白鲸形象被喻为"海魔王"，凶残嗜血。

在真实世界中，鲸鱼有撕咬人类的记录吗？没听说。我耕耘文学，觉得作为艺术描写可以接受，当年读它还颇受吸引。然而，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成长和汲取新知。上世纪80年代，我创作中篇小说《大林莽》，将五指山中知

青故事倾注笔端。山林的莽苍气魄，它的狰狞残酷，它的神奇瑰丽，还有它宏大的呼吸，都构成莫可名状的隐喻。

当年“战天斗地”，为了垦殖橡胶而砍伐原始森林。然而，严酷岁月让我从“献身”某种光辉事业的虚妄狂热中退烧，以我的青春血汗为证，砍伐原始森林是人类诸多自残行为之一。热带雨林逾千年而存在，以斧锯放倒它们只需半天；更因当年群峰环抱，交通阻塞，无法将珍贵的热带原木运出深山，只能放一把火就地烧掉了。

说到《大林莽》小说稿的遭遇，正和两辈人观念差异有关。稿子呈送一位我很尊敬的文学前辈，他认真读过后提出异议。前辈曾去过海南岛参观，亲眼目睹新中国这一建设成就，所以他认为开拓野山垦殖橡胶是值得肯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小说被退稿，我改投《十月》发表。

我没有抱怨过前辈，那个特定年代“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改造山河，此种思维源于彼时举目皆敌，万事都须自力更生。开拓、征服、人定胜天，确曾是某个文明发展阶段的时代精神。而我写《大林莽》之时，外部环境大大改观，橡胶已非“备战备荒”战略物资，不再关乎邦国存亡。对昔日的集体迷狂，是时候打开新视窗了。

再后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海南岛国产橡胶不及从东南亚进口来得质优价廉，令昔年抛洒的血汗化为藤蔓宿露，仅存的热带雨林已萎缩成几个保护区，大林莽回不来了。《白鲸》亦如是，它将鲸鱼妖魔化、人类与海洋的对抗宿命化。捕鲸人乘风驭浪，斗志沛然，留下的却是一曲悲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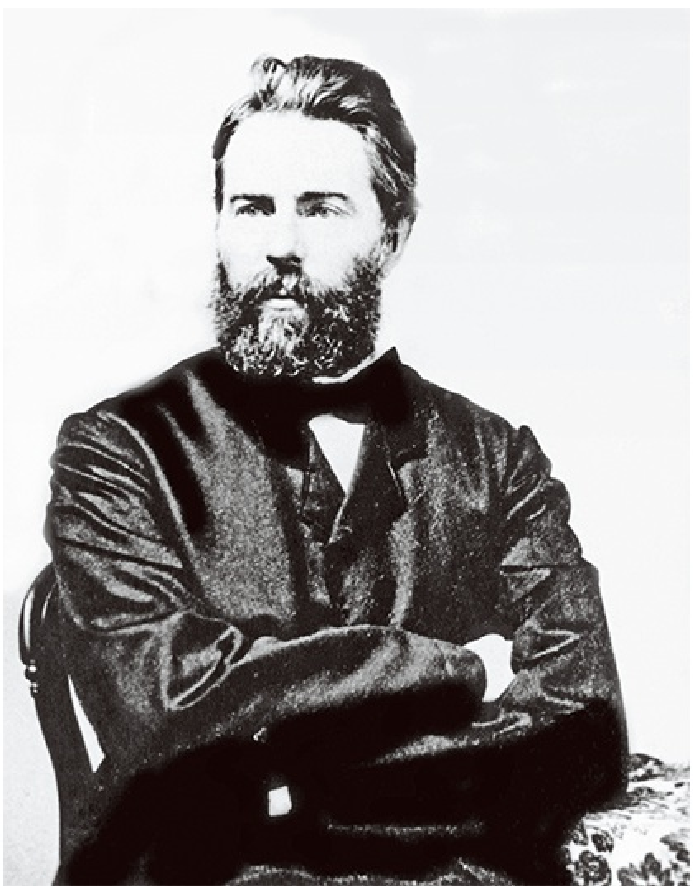
白鲸是海中哺乳动物，生命可长达70年以上。白鲸探出水面，脸部会有丰富生动的表情，还会鸣叫歌唱，声音悠扬，被格陵兰岛土著称为“海中金丝雀”。《白鲸》中捕鲸船用猎杀的鲸鱼骸骨来装饰，全书近半笔墨是如何捕鲸屠鲸炼鲸油。须知鲸鱼自身没有止血功能，只要被鱼炮钢叉戳伤，在劫难逃。当今谁还有兴致欣赏这类血腥的文学描写？

韩裔演员吴珊卓担纲主演的美剧《英语系主任》（The Chair），全因吴珊卓浑身都是戏的出色演技才让我追剧。剧中英语系资深教授讲授《白鲸》，教室门庭冷落，仅得五个听课学生，真让老学究心如死灰。他皓首穷经，研究大半辈子《白鲸》，却成了历史孑遗和语言化石。

老一辈或会为美国早年进取精神的失落痛心疾首，但今人对追猎濒临生存危机的白鲸的行为已生反感。难道不是人类索求无度的“进取”，造成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

随时代变换的勇者

《白鲸》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美国高中荐读书单的空缺，由有畅销小说“天后”之称的克里斯汀·汉娜2021年出版的《四面风》（The Four Winds）来填补。此书写的是上世纪30年代横扫美国腹地的沙尘暴。《四面风》书名来自圣经，有末日天谴之意。我还未读过此书，但读过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这部经典作品写的也是那段暗黑历史。



美国19世纪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1851年创作《白鲸》。



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1900—1949），她创作的长篇小说《飘》1936年出版，次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

我儿子读高中也写过《愤怒的葡萄》读后感，形容这是心灵战栗的阅读。风暴将田野的庄稼和肥沃黑土卷起刮走，没日没夜呼啸，宛如末世景象。这已非农作物与牲畜之劫，人类蜷缩在被狂风摇撼的房子里，无助地看着沙尘从门窗缝隙入侵，屋内灯光变成微茫萤火，摇曳出生命的渺小。这场灾难足以摧毁一切，包括人性。

斯坦贝克写《愤怒的葡萄》之时，沙尘暴还未落定，他的笔端无限接近社会现实。小说主人公是俄克拉何马州农夫，因庄稼颗粒无收，连土中种子都被狂风刮走。农民无力偿还贷款，纷纷破产，惟有举家离开这片赤地。向西部迁徙途中，亲人在颠沛流离中相继死去。总算到了加州，这些外乡人被压榨欺凌，他们便组织工会奋起维权，却遭暴力镇压。主人公复仇手刃凶手，逃亡前立誓：无论漂泊何方都将抗争到底。

《愤怒的葡萄》的警句迄今仍叩响读者心扉：“你怎能恐吓一个人，不但他肚腹空空，他的孩子也肚腹空空？你不能恐吓他——他比任何人都懂得恐惧。”又如，“在饥饿者眼中，愤怒在燃烧。人的灵魂已装满愤怒的葡萄，已经很重很沉了。”



1962年底，根据哈珀·李的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格利高里·派克凭借此片获得第35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这部小说大热畅销，争议随之而来。某些州将其列为禁书，当众焚烧，斯坦贝克被极右翼斥为宣扬共产主义。但这场天灾浩劫和作家的沉痛叙事推动了社会变革。国会立法资助农民，罗斯福新政亦因此契机建立社会福利制度。

19世纪的亚哈船长天涯海角追杀一条白鲸，那是勇者象征；而在20世纪，为人间疾苦鼓与呼的作家是勇者；到了今时，凭怒海孤舟冲向捕鲸船拯救鲸鱼的绿色和平志愿者，他们是勇者。

“政治正确”取代文学评判

说到美国禁书，何止上世纪30年代禁过，麦卡锡主义横行的50年代禁得更凶。那个白色恐怖时期，全美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约有200万册“危险书籍”被下架和焚毁。从作家马克·吐温、斯坦贝克、威廉·福斯特，到记者白劳德、史沫特莱，“黑名单”有75人之多。海明威参加过国际纵队反对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更是无处逃遁。还要加上好莱坞的“十君子事件”，写《推销员之死》的剧作家亚瑟·米勒，以及《罗马假日》《出埃及记》《斯巴达克斯》的编剧达尔顿·特朗勃，都曾在“黑名单”上。

如今美国乱象重来，文化战争狼烟大举，左右两翼都争相设立言论路障。极左“取消文化”大肆攻伐，《飘》被亚马逊下架，激起群情汹汹。虽则此书仅系暂时下架，有待补充背景注释和添加阅读指引后重新上架，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集体愤怒被点燃，霎时蔓延成燎原野火。

《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是佐治亚州人，和黑人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出生于同一城市亚特兰大，两人相隔了30年。玛格丽特并无乡下庄园生活体验，她降生时南北战争已过去半个世纪，她的童年记忆来自祖辈怀旧口述，老人家无限眷恋昔日时光。她坐在祖母膝上听故事，在想象中建构了自己的文学楼阁。

玛格丽特祖上的幸福生活植根于蓄奴制，驱策黑奴在肥沃黑土带种植棉花，俨然南方庄园主的聚宝盆。奴隶主残暴抑或仁慈，都改变不了奴隶是财产而非人这个事实。玛格丽特凭祖辈口述史，以奇瑰想象写出这部小说，情节相扣，笔触精细，舒缓展开一轴绮丽画卷；最后田园牧歌式的景象被北军炮火摧毁，无限悲情交织成凄美挽歌。

在文艺领域，价值观正确与否只是评介参数之一。李后主的词，蔡京的书法，《水浒传》对女性和人命的态度，张爱玲的《色·戒》??谁能以“政治正确”去抹杀这些作品？《飘》亦如是，它是南方蓄奴时代原生态的优秀文本，虽然它屏蔽了奴隶的饮泣。

反观写《汤姆叔叔的小屋》（又译《黑奴吁天录》）的女作家斯托夫人，差不多比玛格丽特早一个世纪。她笔下的黑人保姆、孩子和汤姆叔叔，与《飘》迥然不同，斯托夫人充满人道关怀。林肯总统接见她时说：“你就是那位引发一场内战的小妇人。”意指她的废奴思想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

然而，现今“汤姆叔叔”在非裔族群里已沦为贬称，成了对白人主子百般忠顺的同义词。毕竟“汤姆叔叔”对奴隶身份麻木认命，形同鲁迅笔下的闰土，这是19世纪蓄奴制锻造的一种典型人格。斯托夫人源于生活的描写，亦会被光阴淘洗出内在瑕疵，如同美玉暗斑，却忠实反映出远去的时代。

道学家式的精神清污

前面提过美国高中生必读的“老三篇”，初中生英文阅读也有“老三篇”——《杀死一只知更鸟》《人鼠之间》《蝇王》。第一本书青少年最喜读，而《蝇王》较为晦涩，近年有落榜趋势。

《杀死一只知更鸟》是南方女作家哈珀·李的小说，出版于1960年，同年即获普利策奖，1962年改编成电影并获奥斯卡金像奖。阿拉巴马州是南方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州之一，这里涌现过众多民权活动家，非裔“民权之母”罗莎·帕克斯就来自这个州。哈珀·李从小耳闻目睹的种族欺凌事件，对非裔来说简直稀松寻常。喜欢文学的哈珀·李先后在亨廷顿学院、阿拉巴马大学就读，她为校刊写文学习作，都是种族题材，而这话题在白人校园几乎没人愿提。

作家以6岁女孩史考特的视角，叙述1936年发生在家乡小镇的真实事件。史考特的父亲是白人律师，他为被控强奸白人女性的非裔辩护，力证原告白人父女诬陷。但上世纪30年代南部种族歧视和司法不公是常态，黑人遂被判罪收监，后越狱被枪杀。

小说另一副线是幽灵般的隐形人，被小镇居民视为疯子的怪物遭家人禁闭，却会偷偷出来游荡，化为小镇惊悚传说，亦成了童心想象力源泉。孩子们既会留下礼物给怪物，有时也会捉弄对方。隐形人对恶作剧不以为意，对善意则会留下回馈。

哈珀·李笔法温暖动人，小说力量在于人性启蒙。主人公史考特和哥哥吉姆加上玩伴迪尔，出于好奇混入法庭旁听，孰料判案过程让孩子心碎。成人世界的冷酷扭曲，让迪尔悲从中来。他是弃儿，看到黑人被定罪，原来世间有人比自己更低贱和不幸，不由放声大哭。

小说高潮是史考特和吉姆受到原告醉鬼父亲突袭，吉姆被打断手臂。千钧一发之际，传说中的影子怪物及时现身，拯救了这对兄妹。善恶美丑原来是另一个样子，孩子在故事结束那一瞬间都长大了。

《杀死一只知更鸟》跨越几辈人而畅销不衰，被誉为道德勇气和同理心的文学杰作，是开启青少年爱心与良知的钥匙。美国有此说：读完《杀死一只知更鸟》，初中即可毕业。

哪知世道翻覆，当世国脉紊乱，文化战争火星四溅，右翼保守派之禁书狂热不输极左派。南方多个州"精神清污"，2021年，全美学校图书馆奉指令下架1597种书籍，《杀死一只知更鸟》居然也在被禁之列。

南方保守派对种族主义黑历史既不愿正视，亦难于启齿，下架《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理由是强暴描写。何不将高中必读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同禁掉？毕竟该书写到嫖妓。强暴笔触儿童不宜，美化南方叛乱和蓄奴制难道老少咸宜？

回到旧时代，确有道学家劝诫：男不读红楼，女不读西厢，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这几部名著均有诱奸、通奸、双性恋、杀戮、肢解、吃人肉之类。我高小就读过《西游记》《水浒传》，初一"文革"停课时读了《红楼梦》。就算那个年龄对此类笔墨有好奇心，但我的阅读并没有沉溺于那些描写，也不见心灵被污染。须知美国未曾有过封建时代，莫非跌到了封建道学家的水平？

坑灰从未冷却

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也掀起"精神清污"运动，声讨学校教育，指教师工会被渗透，以腐朽、颓废、淫秽、反基督的思想毒化孩子，灌输颠覆传统价值的性教育。今日美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又重拾锈迹斑斑的旧兵器，大打文化战争，要把青少年拖回老朽们心中的美好年代。

我居住在大华府郊区，属弗吉尼亚州。本州有一个郡的教育监事会（相当于教委）要禁一批书，更有人提出烧掉这些书，幸而被郡政府否决。去年9月，美国图书馆协会和国际特赦组织联合在华盛顿特区公共图书馆举办"禁书周"活动，鼓励公众阅读和讨论在美国部分地区被禁的书籍。

禁书榜上，有女性漫画家玛雅·科巴比（Maia Kobabe）的回忆录《性别酷儿》（Gender Queer），记录她的性别与身份认同的困惑、成长和奋斗。还有得奖儿童读物《三口之家》（And Tango Makes Three），描写一对雄性同性恋企鹅的感情世界，与它们收养的一只鸡蛋。同性恋现象在动物界很常见，故事也非常感人，孩子都哭得稀里哗啦。这两部均遭下架的命运。卡通绘本读物首次获得普利策奖，是1992年出版的《鼠族》。此书以老鼠的叙事角度讲父母在纳粹集中营的苦难，最近被保守南方州下架，理由是画面对儿童太过残酷。

禁书展览在图书馆内厅，公众讨论在室外。我在草坪听华府公共图书馆系统主管发言，澄澈秋阳把他的白发镀上金色，便以为他年纪很大。他说自己在图书系统工作近30年，从未见过听过和想到过禁书焚书、禁锢思想、限制阅读自由这种事！原来他年纪没那么老。当时心想，只缘他未领略过我经历的年代，也没见识过麦卡锡主义。现在美国社会深度撕裂，阴魂被符咒召唤归来，极左极右两翼都以禁书来匡正视听，清除污垢。这种古老冲动，来自"端正"别家价值观的原始内驱力。

从遥远秦朝到纳粹德国再到麦卡锡主义时期，坑灰就从未冷却。它会复燃为烛天大火吗？

版面编辑：刘潇

专栏｜电影院成了夕阳产业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一场电影三个中老年观众，也许这仍然是例外？年轻人几乎都有Netflix，为什么还要再花一份钱进电影院？



2023年1月28日，福建龙岩，电影院内观众看电影。图：视觉中国

文｜王芫
作家

三年没进电影院，但我是几个流媒体的订户，并不缺少娱乐。最近读《呼啸山庄》，碰巧一部艾米莉·勃朗特的传记电影在上映。在久违电影院之后，我第一次感觉需要看最新上映的电影。

我的思维还停留在疫情前，担心电影院满座，提前在网上订了票。到了电影院，在订票机上取了票之后，就朝放映厅走。入口竟然没人检票，东张西望一阵，见没人阻挡，我就径自进去了。偌大个放映厅，里面只有一个观众，左手拿着眼镜，右手拿着手机凑到眼前看。几支广告过去，进来一对老年夫妻。广告终于放完了，灯暗下来，这时又进来一个老太太，双手扶着带轮子的走步器，弯着腰一步步慢慢往前蹭。

电影院经营困难不是新闻。先是疫情冲击，之后流媒体趁机兴起，改变了人们的娱乐习惯。疫情后，电影院恢复开放，但已风光不再。从数字上看，2022年全美票房收入是74亿美元，而2019年是113亿美元。但这场电影一共五个观众，且都是中老年人，还是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感性认识：电影院成了夕阳产业。

事后，我仔细看地图，发现那个电影院边上有一栋养老公寓。心想，也许这次观影经验是个例外？

过了几天，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西线无战事》的介绍。虽然Netflix上就有播放，但因为片长两个半小时，我打算等放春假的时候再看。春假第一天，一个学电影的朋友告诉我，电影院连锁品牌Regal Cinemas会在奥斯卡颁奖礼前，集中一周放映奥斯卡提名电影，票价才6美元。她又说，《西线无战事》这部电影去电影院看效果更好。

虽然我买了Netflix会员，可一想到电影院快要倒闭了，就产生了莫名的情怀。为了尽绵薄之力支持电影事业，我计划借春假和奥斯卡之机，轮流光顾圣地亚哥地区的Regal电影院。

旧思维总是很顽固。这次我照旧在网上订了票，结果在影院取票操作失败。我放眼一瞧，百米外站着个穿制服的姑娘，于是请她帮忙。她张口就说，你要下载App。我说我不想要太多App。她就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邮件里的订票号，字母中间有空格，我又回去试了无空格的键入方式，还是失败。又读了遍邮件，发现也可以刷订票用的信用卡。拿出信用卡再试，还是不行。只好再找那个姑娘，她也不知道怎么对付坚决不下载App的顾客，就用对讲机联系主管。主管指示她直接放我进去。

放映厅一个人没有，银幕上广告轰轰烈烈而又寂寞地放着。灯慢慢暗下来，我开始担心如果只有一个观众放映会取消。好在灯完全暗下来之前，又进来两个互相搀扶的身影。

一场电影三个中老年观众。也许这仍然是例外？年轻人几乎都有Netflix，为什么还要再花一份钱进电影院？

为什么电影院会赔本放电影？学电影的朋友说，可能是制片方在贴钱。这部电影是Netflix投资的，已经在线上放了五个月。因为提名了奥斯卡，按规定必须在颁奖前一个月在院线放映。

第三次，我去看斯皮尔伯格的半自传电影《造梦之家》（The Fabelmans）。这次我有经验了，知道没必要提前买票。真正到了影院，我才注意到，建在外面的售票厅已经完全废弃了。如今，购票全部在大厅里的自助售票机上

完成。我原以为大厅里摆的只是取票机，实际这取票机兼具当场售票功能。大厅里只需要一个人远远地看着机器。如果有人在售票机前一通操作，这人就是买了票。如此说来，虽然票房收入少了，但是工资支出也少了，大概影院还是能维持？又想到那个一问三不知的员工，估计培训也很简单，就是让顾客下载App，以不变应万变。

斯皮尔伯格还是有些号召力，这场电影有20来个观众。电影有些喜剧效果，不时传来阵阵笑声。想起一部老电影《天堂电影院》，那里面的剧场总是座无虚席，每每情节牵动人心之时，观众就会一起发出笑声、嘘声或者叹息。与陌生人同喜共悲，就是进电影院的吸引力之一。

黑暗中，我不禁回想起那些消失的售票厅。有个电影院前有高大的椰子树，夏天排队的时候，我总希望在树荫下多站一会儿；有个电影院建在坡上，黄金时间的购票队伍会一直从台阶上排下来??这些盛况都已经成了历史。

第四次去电影院，买票时我注意到广告——成为会员，每月23.99美元。有意思，电影院也学会玩订阅经济了。23.99美元是两场电影的价钱，一个月两场，按说不多，可是一年能有24部值得看的电影吗？还有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成为会员就必须下载App。

正犹豫着，电影开始了。这部讲爱尔兰生活的电影，有一大半对话我听不懂。不懂就罢了，背后还传来一阵阵笑声，更增添了我的焦急??要是在家看流媒体就好了，起码有字幕。不懂可以停下来，上网查字典。

我打消了成为会员的念头，到底还是没有下载App。

版面编辑：刘潇

专栏丨英伦小球会炙手可热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隐于英国广袤足球沃土的古老球会，像文玩一般被美国人入手。作为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伦三岛俯首即是跨越三个世纪的俱乐部



《足球教练》（Ted Lasso）第三季海报。

文丨张斌
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

IMDB高分剧集《足球教练》（Ted Lasso）近日在洛杉矶举办第三季也是最后一季首映礼。据说当年之所以有此创作冲动，完全源于NBC倾力转播英超联赛而掀起的足球热潮，以喜剧方式给美国公众做足球启蒙，老少咸宜。前两季异乎寻常热播，获奖无数，其播出平台Apple TV+也大举入局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几乎成为赛事最大金主，实实在在成为有价值的运动。

虚构的《足球教练》红火，非虚构的《欢迎来到雷克斯汉姆》作为一部多集纪录片也得分不低。如果说文艺源自鲜活的生活，后者的即时感会更加强烈。出演过《刀锋战士》和《金刚狼》的影星瑞安·雷诺兹及其好友罗布·麦克亨尼，三年前买下创建于1872年、威尔士历史最悠久的足球俱乐部雷克斯汉姆队。身为演员、导演和编剧身份的两位投资人品牌营销手段多样，俨然是大球会的曝光度。1月展开的足协杯对战，BBC特意将转播车开到了雷克斯汉姆。球场附近餐馆的老板自豪地宣称，大牌主持、名宿莱因克尔已经提前定位，小城终于因为足球开始闪耀。看过纪录片的美国球迷跨越山河来此观赛，两位明星场边神采飞扬，1万多小城球迷涌入翻建的主场，为花费了几十万英镑转会费壮大起来的球队呼叫。

足球投资从来都是丰俭由人，名门曼联、利物浦和切尔西已是美国资本囊中之物，格拉泽家族已将作为提款机的曼联待价而沽，活脱脱的价值投资样本。美资当然不仅是在英超活跃，第三等级联赛EFL的24支球队中有近三成是美资底色，三支第五级别联赛球队投入美资怀抱，12支苏超球队中有四分之一受益于美国投资人。林肯城队、克拉雷城队、沃尔萨尔队、诺斯郡队和沃金队这样隐于英国广袤足球沃土上的古老球会，像文玩一般被美国人入手。来自于大西洋彼岸的投资者们心中的共识是，如果你是美国人，想投资足球俱乐部，那没有比英国更好的市场了；作为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伦三岛俯首即是跨越三个世纪的俱乐部，而获得这些小球会控股权的成本，最低的不过六位数。很多狂热爱着足球的投资人，都会饶有情趣地下场一试身手。

约翰·卡茨自认为是价值投资的高手。2016年，他在伦敦看了一场热刺队的比赛，自此便迷上了英伦足球。他辞掉美国的工作，在领英网站上发出了40封求职信，终于在伦敦找到了一份与足球相关的工作，随即不断四处出游考察小球会，直到相中了沃金俱乐部。身居第五级联赛的沃金俱乐部诞生于1889年，俱乐部球场更是百年建筑，随处可见岁月留痕。卡茨的足球哲学中渗透着鲜明的房地产价值法则，“不要买你附近最贵的房子，而是找到最便宜的房子，改造之后，卖个高价。”显然，沃金队便是美国投资人眼中最便宜的房子，只要善加投入，充实球队，聘请合适的主教练，在底层联赛中即可迅速进入上升通道；而去年该队也终于实现了135年来第一次荣耀晋级，总算跃升到了英冠联赛，价值增长已成现实。

成立于1890年的伯恩茅斯俱乐部一飞冲天的传奇更具有鼓动性，2011年至2015年间，经过六个赛季的三次晋级，从第四级别联赛荣升至英超，价值陡然增长。那些拥抱古老小球会的美国投资人都梦想着复刻伯恩茅斯奇迹，且能常居英超，博得至少10倍的投资价值增长，而这在没有升降级的美式职业体育联盟中，以小博大是很难实现的。即便不能快速实现价值增长，根据英国政府最新颁布的“白皮书”，英超世界之外的四级联赛球队会获得更多的媒体收益分红，以确保这些流淌着英伦足球古老传统血脉的球会可以保持收支平衡，健康存续。因此，已经入场的海外投资人会有更为实在的安全感，毕竟挣钱才是硬道理。

诞生于1877年的巴恩斯利俱乐部如今是在美国的太平洋媒体集团旗下。虽然近来只能徘徊于第三级别的英甲联赛中，但是集团对于俱乐部资产的投入已经不仅限于英伦，而是辐射到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丹麦和瑞士等国，规模达到七家俱乐部，以此集群卫星俱乐部的模式，为核心的巴恩斯利俱乐部配置更优质的球员资源，也让投资配置更趋合理。

最近几年，足球在美国发展势头迅猛，自身的职业大联盟（MLS）的球队价值动辄10亿美元，女足大联盟球队也势头不弱，少则5000万美元，多则1.5亿美元。对于一些心怀足球热情但是实力稍欠的投资人而言，门槛显然越来越高了，反倒不如跨过大西洋，在英伦找到希望的种子。

渴望改天换地的古老小球会最缺的就是甘霖般解渴的投资，往往几百万英镑便能立竿见影。如果能从英甲升入英冠联赛，那俱乐部价值便会有5倍增长；再从英冠攀至英超，那又将迎来至少6倍的价值暴增。这不仅是价值增长的纸面推演，而是英伦职业足球实实在在的价值法则。

版面编辑：刘潇

月谈鲁迅丨狐狸的鼻子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鲁迅在道理上是明白的，说要止于嘲笑和热骂，“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如此避开了卑劣，却没避开刻薄



2023年1月24日，厦门鼓浪屿，名为《横眉冷对》的鲁迅先生雕塑。图：视觉中国

文丨刀尔登
诗人

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人的好奇心，可恶和可贵之处，都常常于不“正当”的地方发生。比如我住的地方，大门明晃晃地敞开着，却有居民望着有着兵器般尖梢的铁栅胡思乱想：“不知翻过会怎样？”我翻过，也不怎么样。

以下两种由鲁迅文章引发的好奇，应是正当的吧？第一种，来自一直收在中学课本中的《拿来主义》，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我好奇的是，中学教师讲到这里，对“做了女婿”云云，会解释吗，会怎样解释呢？——我读中学时，老师似乎没有解说，也许解说而我忘记了。

第二种好奇，源于鲁迅《文床秋梦》中的一段话：“而捐官的办法，又早经取消，对于‘大权’，还是只能像狐狸的遇着高处的葡萄一样，仰着白鼻子看看。”

这个??为什么是白鼻子？为什么要特别写出鼻子的颜色？

中国的狐狸，大抵是赤狐，下唇、下巴及以下，是白色的，而鼻子的颜色，和狐狸上半截脸及背部的毛色一样，介乎红黄之间，鼻尖则是黑的。此处借用的是伊索的寓言，希腊的狐狸，也是赤狐，鼻子也与我们这里的一样，是深色的。至少我看到的插图，都是如此。中国另有两种狐狸，都出没在大西北地区或高原之上，我不相信鲁迅写到此处时，会神游得那么高远。何况那两种狐狸，鼻子也不是白的。

是鲁迅格物有疏吗？人人知道狐狸，见过真身的可不多，有些地方，比如我的老家，曾以狐狸为大仙，不敢直视，再说那东西总是一闪而过，不会像诗经里说的“绥绥”地蹓跶，更不会像模特般坐定，给我们机会来研究它的鼻子。我猜想，鲁迅所见狐狸，不是在图画中，就是在动物园里，不管出处何在，总不该有白鼻子的。

这两处描述，和邵洵美有关。

鲁迅和邵洵美结怨，是后来的事。一开始，他只是看邵有些不顺眼。何以见得？他们初见，是在给萧伯纳接风的宴会上，鲁迅记录道：“此后是将赠品送给萧的仪式。这是由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研究者通常认为这是中性的描述，诚然，但中性也是有宽度的，如“戴望舒先生远远的从法国给我们一封通信”，“远远的”也是中性，但在这里味道就有些可疑。又如鲁迅文中称呼胡适，只要一加上“博士”二字，后面接的准不是好话，其余如“徐诗人”之类，都是这样，严重者则如“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说的都是实情，然而谁会觉得“中性”呢？

哪怕是真诗人如徐志摩者，被鲁迅徐诗人徐诗人地一唤，心里也是不舒服的，只是有苦说不出，因为鲁迅并没有捏造什么，也没有恶言相向。在鲁迅这里吃了哑巴亏的人，只好在背后，有时也在文章里，说鲁迅的刀笔功夫如同绍兴师爷。说得堂皇些，则叫春秋笔法。

“美男子”的可疑味道是轻微的，还没到揄揶的程度，因为此时鲁迅只是与邵洵美的作风不合，并无其他。后来因另一件事生恨，攻击也就升级。他给邵洵美起的花名之一，是“雪花膏”；“白鼻子”一段，前面的话是：“现在皇帝没有了，即使满脸涂着雪花膏，也永远遇不到公主的青睐；至多，只可以希图做一个富家的姑爷而已。”既然说到雪花膏，可怜的狐狸，鼻子不白也得白了。

说到鼻子，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鲁迅对顾颉刚的态度。且说顾颉刚的鼻子有些红，鲁迅先是在私下的通信中，继而在正式发表的文字中，一再挖苦，甚至简称为“鼻”，至有“鼻来我走”之宣言。七八年后，还在小说《理水》中兴致勃勃地写：“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读者都知道是在讽刺哪一个。

我小的时候，第一种阅读材料是报纸，上面的文章，若要驳斥什么人，先从相貌入手。那时不以为非；我不以为非，全民不以为非。鲁迅曾把希望寄于“大众语”，然而大众的语汇和倾向，来路也复杂得很，比如获得对于历史的见识的一个途径是听书，我听过的评书一类，还没有一种说到反角不是先将其相貌诋毁一番的。长大后再读鲁迅形容梅兰芳“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便想，鲁迅也有不讲究的时候。

若要为鲁迅辩护，第一，鲁迅虽有人身攻击之语，并不借此来立论。一句话是对是错，与说话的人身份无关，也与说话的人是否能够践行自己的话无关。鲁迅自己，就明确反对“坏人不能有好话”之类的逻辑谬误。不过他也难免有违犯这条原则之处，只是程度尚轻，须知，在他的时候，在他身前的时代，以及在他身后的时代，包括我们的时代，“打倒”一个人仍是“批倒”一种观点的不二法宝。

第二，鲁迅的性情，用《新青年》同人的话说，是有些滑稽的。这里的“滑稽”是古典用法，指的是他爱说怪话，常以有趣为旨归，往往说得口滑。在他那里，有些挖苦话是“涉笔成趣”，未必有恶意。然而不得不说，他老人家自己说着好玩，却忽略了对方的感受。

第三，鲁迅在道理上是明白的，只是难以自制。他批评说：“然而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但自己又常将对手的鼻尖涂白。他说要止于嘲笑和热骂，“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如此避开了卑劣，却没避开刻薄。他曾在通信中说：“近来心粗气浮，颇不易为；一涉笔，总不免含有芒刺，真是如何是好。此次偶一不慎，复碰着盛宫保家婿，然或尚不至有大碍耶？”这是个有趣的例子。鲁迅知道自己的毛病，但在自责的同时，又写出“盛宫保家婿”这样的话来——这里说的又是邵洵美，因他是盛宣怀的孙女婿。说起来，鲁迅本是反对在“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上做文章的，只因邵曾写过嘲讽穷文人的文章，鲁迅便捉住不放，先是女婿女婿地叫，后来又说是赘婿，其实邵何尝入赘，但说得口滑，也不管了。

我不知道鲁迅写下“赘婿”“赘郎”这些字时，有没有联想到东汉末年陈琳的骂曹操的“赘阉遗丑”。陈琳后来改换阵营，为曹氏骂孙权，张口便是“孙权小子，未辨菽麦??譬犹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陆梁放肆，顾行吠主”，所谓犬吠非主，据说是一时之宜，就算是这样，为什么要“吠”，为什么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

鲁迅常忏悔自己身上的旧时代的印迹，因袭的重担。不过，人身攻击这件事，就算不是每下愈况，也未必能随着时间进步。我读到过“反右”时期读书人的互相“批判”，除寥寥数字外，都把话说得十分难听，但与后来相比，这又不算什么；我又读到过“文革”时期的类似文本，如果说十年前还有些文绉绉，此时则多是破口大骂了。据说，愈是说粗话，越是贴近劳动人民云。如果这时还操着陈琳的腔调，几乎是不打自招没有改造好。

我要承认，不要看我写起字来酸文假醋的，日常生活中经常是骂骂咧咧的。总有些人，总有些事，令人感到语言的无力，不骂不足以平己愤——按理说，这是一种退化。语言上的退化只是标志，藏在后面的是意识的退化。至少，在骂人的时候，我们不努力了，放弃追求复杂和精确。那些粗话，就像神经中的捷径，借用郭沫若的一句诗，骂人像“在神经上飞跑”，何等方便和痛快。但道理归道理，我还是经常纵容自己，心里想，我一不做评论员，二不做发言人，骂人又怎样，不讲理又怎样，耍混账又怎样，先痛快了再说。比如驾驶的时候，还计较什么“斯文”，理会什么“慎独”，开一千里，骂一千五百里，那也是人生之一种动力啊。

鲁迅曾说：“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原则上，我是不赞同的。丘吉尔曾说，不要与猪打架，因为它会拖你到泥坑里，而它是很享受那种处境的——这个例子举得不好，因为丘吉尔这话，本身就很有泥坑味，他一边讲大道理，一边将人比作猪，偷偷地在骂人了。

人也会享受泥坑的。比如，在某些处境中，越是不讲理，越是会得到喝彩。某种控制术的窍门之一，是专与人的缺陷打交道，一是利用人的缺陷，一是激发人的缺陷以便利用。人之有缺陷，不管嘴上如何说得高昂，如何否认，如何声称“这是我的特色啊”，心里总该有些隐隐的惭愧。还以混不讲理为例，有人当作取胜之法，说得人人辟易，自己便得意，如同蒙一身秽物上街，大家都躲开，他便以为人都怕了他——即使如此，若说这样的人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我是难信的。但若能消除其惭愧，甚而建立一种环境，使不讲理成为美德，成为强悍，成为可骄傲的事，那样的世界，也是挺有趣的。

语言的退化，若放在社会幅度上考察，我是没有学力来做的。曾在电脑中建一个文件，记录些自己不喜欢的词，只记了数十个就中辍了。此时寻出一看，立有九斤老头之感，那些词，从“第一时间”“近距离”“负能量”“逆增长”之类，再到“三观”“真香”“大美”之类，再到“整个人都不好了”“我就放心了”“厉害了”之类，谁能说不是我们时代的“风景线”呢？谈论当代语言，也许最适当的年纪是中年。我读书少，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专著，如果有，“我就放心了”。

说回到人身攻击，我现在的态度是，向鲁迅学习，时常纵容自己骂骂人，而同时自知这是不好的毛病。过而不改，按说不应该。不过与化权为常，为了替自己辩护，硬将缺陷说成美德，或寻出无数借口来，以证其正当，从而一次消灭掉一种原则相比，总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版面编辑：刘潇

显影｜安塔基亚震后余生

摄影｜财新周刊 丁刚
撰稿、视频｜财新周刊 张芮雪

大震后的安塔基亚，一群不愿离去或无处安身的人从废墟中抢救家当，在帐篷中等待重建

夜幕降临，搜救灯光不再闪烁，惟有猫咪的眼睛散发微光，废墟下的安塔基亚漆黑一片。 土叙地震后，距震中约16公里的安塔基亚市被完全摧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表示，截至2月21日，地震造成的破坏已导致土耳其南部150万人无家可归。政府和公益组织安排灾民迁往附近城市安家，也有部分投靠农村亲戚。



城市广场中央是一组2021年12月揭幕的铜像，位于中间的是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四周三个雕塑形象分别拿着火炬、橄榄枝和鸽子。2023年2月20日余震后，雕塑上的橄榄枝被震落。



安塔基亚市区，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清真寺在地震中被损毁。

然而，仍有一群人留在原地，他们或是无处可投靠的单亲母亲，或是残障人士，也有叙利亚难民，他们忍受着余震和瘟疫的威胁、露营生活的不便，滞留在熟悉的街区。

安塔基亚的城市广场曾是个热闹的地方，Salahatin坐在轮椅上说："这个地方棒极了，音乐家会来这里演奏，大家很开心，夏天的时候尤其舒服。"广场位于城市南部的十字路口处，中央铜像是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四周三个雕塑形象分别拿着火炬、橄榄枝和鸽子。如今，这里被帐篷、灰尘和失魂落魄的老邻居们填满，雕塑上的橄榄枝在余震后脱落，焚烧垃圾的味道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清晨，马赛克水池里沾满了废弃的番茄豆汤。

丢掉生计的单亲妈妈

白天，安塔基亚的阳光热辣刺眼，6岁的Eslem蜷缩在闷热的救灾帐篷里，用手机刷短视频。一身粉色的她留着卷曲的棕发，两颗门牙刚掉不久，嘴里嘟囔着逝去小朋友的名字——

"阿西死了，阿雅死了……"



Sabahat背着包冒险回家抢救物资。房间里墙体开裂，各种生活物品散落满地。

母亲Sabahat　Duman穿着肥大不合身的淡紫色毛衣坐在一旁，眉头紧锁、眼神呆滞。Sabahat离婚后独自带三个孩子，靠卖花为生，租住在附近的一所公寓内，每月租金600土耳其里拉（约合221元人民币）。

穿过满地碎石块的楼道，Sabahat的家就在一楼。这间三室一厅的底层公寓光线暗淡，墙体开裂，苹果、橘子混合着陶瓷碎片散落满地。没卖完的康乃馨也斜躺在地上，天气寒冷，即使十多天过去了，红白相间的花依旧艳丽，只有透明包装纸上蒙了一层薄灰。

Sabahat用力顶开变形的铁门，门框被挤压得吱吱作响，这次冒险回家，她带走了几件换洗衣物、一双塑料鞋和一袋番茄酱，更多的家当被永久留在了屋内——冰箱、电视、洗衣机等值钱物品，也包括没卖出去的鲜花。



Sabahat带着女儿Eslem和前夫冒险回家拿了些物资出来，准备搬去灾民营。震后，前夫来探望子女们，顺便帮帮忙。



震后，Sabahat家卧室的床上落满碎石。她租的公寓位于一层，三室一厅，每月租金600里拉。

震前的每天清晨，Sabahat会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照料，然后出门卖花，平均每天的收入在200里拉左右。无论生意如何，她会在中午时分结束工作，赶回家中，从邻居家接回孩子。如今，安塔基亚满是废墟，没了买花的人，Sabahat失去收入来源，但她不愿搬到别的城市。她没有积蓄，陌生城市意味着更多花销，需花更多时间投入工作，却没了靠得住的邻居帮忙看孩子。

“现在也不确定最近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就希望能洗个澡，然后给孩子们洗个头发，不知道。”Sabahat垂着头嘟囔。大多数时间里，她什么也不干，静静地坐在帐篷里，等待发放物资或领取食物。如果说有什么期待，就是希望政府能把救灾帐篷换为铁皮安置房，可以一直住到新房子建好。

小女儿Eslem比往常更文静了，她寸步不离地与母亲待在一起，即使睡觉也紧贴着。两个儿子则喜欢在街道上奔跑，他们与带枪的军人一起踢球，或是研究无人机玩具的驾驶，11岁的大儿子还学会了向外国记者要钱，“给我钱……我要钱……”他要钱买房子。Eslem点开手机里一栋带泳池的别墅广告说，“我们去这里好不好？”广告显示，该房子每周的租金为两万里拉，相当于母亲卖花三个月多的收入。



Sabahat在灾民营帐篷里打扫卫生。



Sabahat带着女儿Eslem去救助点领取物资，Eslem领到了一些玩具，很开心。



在灾民营帐篷里，Sabahat和孩子们准备吃饭，身后坐着的是她前夫。



Sabahat 从地震中带出来一只小鸟住进了灾民营。邻居前来借鸟食被她拒绝，“买食物的钱都没了，更没法支付多余的鸟食”。

瘫痪的父亲与怀孕的妻子

地震发生时，Yusuf就躺在客厅里，巨大的震动将他摇醒。他听见儿子带着怀孕7月有余的儿媳夺门而出；他听着楼房倒塌声、屋外的叫喊声和雨声直到天亮——他瘫痪多年，难以自理，灾难面前，听天由命。



Yusuf瘫痪多年，难以自理。回想起地震时的情形，哭出声来。

好在Yusuf的公寓买在了顶楼，虽然底层塌陷、房屋倾斜，但顶层结构尚完整，他活了下来。“你看我已经这样了，我有什么好害怕？”38岁的儿子Garip则带着妻子逃往屋顶，与邻居们躲在一块铁皮下，熬了过来。

Garip是当地一家鸡肉卷饼店的外卖员，生意好的时候，他骑着摩托车一天能送50余个鸡肉卷。为了照顾瘫痪的父亲，他每取上一份外卖后，都会先绕道家中，帮助父亲翻身、挠痒痒、上厕所等。去年和妻子Aylin结婚后，他曾以为生活就要好起来了。妻子怀孕后，他们买齐了所有宝宝需要的用品，还在上个月花1万里拉购买了洗碗机，花掉了大部分积蓄。

现在，他的洗碗机和摩托车被困在了危房和废墟里。

为了挽回损失，Garip总带着妻子往废墟跑，从危房里抢救出物品。除了大件家具和已损坏的物品，他几乎把公寓搬得空空荡荡，甚至把洗碗机拆了，用绳子绑住后，一点一点吊到楼下。长时间在危楼里攀爬让他的手指漆黑，裤脚被灰尘和泥土染成土黄色，脚上的球鞋也磨破多处。他也数不清一共几次钻进危楼，即使余震仍不时来袭。



Yusuf的儿子Garip站在已是危房的家里窗前打电话。他让怀孕的妻子在楼下等候，自己冒着余震的风险连续多趟回到屋内，想多搬些东西出来。

于这个家庭而言，每抢救出一项用品，都意味减少一分未来可能的花费：Garip暂时干不回外卖员了，摩托车救不出来，新的需要5万里拉；妻子接下来要前往震区外的私立医院生孩子，花费不菲；周边城市的房价在俄乌冲突后业已高企，随着数百万地震灾民涌入，租房价格还会进一步上涨……

因为父亲行动不便，设施保障难以到位、转移困难，Garip只能先把妻子送到姐姐家养胎，自己一边留在临时帐篷里照顾父亲，一边去废墟里抢救物品，“对我来说，只要有面包有水喝，我就很知足了”。



Garip和妻子用垃圾袋掂着抢救出的物品，走在回亲戚家的路上。

残疾人与叙利亚难民

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Salahatin都守在灾民营的入口，相比其他回家抢救物资的邻居，他的活动范围仅为这个城市广场台阶上的部分——他生活在轮椅上。

Salahatin眼神严肃，不苟言笑，鲜与士兵或志愿者们寒暄。他不关心物资的领取，总是在大部分人就餐完毕后才前往领饭。因为行动不便，他只在睡觉时才费力把身子挪进帐篷，其余时间里都待在户外，脸庞和一双大手呈现出饱经风霜的黑。已经一个月没洗澡的他身上开始不舒服，相较于健全人，他很难在缺乏残障友好设施的澡堂或没有他人协助下洗澡。他的妻子是一位叙利亚人，同样患有腿疾，只能跛足行走，而且不懂土耳其语，也很少与周围人交流。

56岁的Salahatin曾是一名机械师，精通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在外漂泊工作11年，因一场意外失去了行走能力，这才回老家安塔基亚安定下来。他在这里认识了如今的妻子，还迎来了自己的女儿——Sela。地震前一个月，一家人专程为Sela拍摄了影棚写真，放大成比本人还大两倍的尺寸，装裱进相框。震后，妻子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中，冒险取回了这张巨幅肖像，放在了帐篷中央最显眼的位置。



Salahatin一家人从帐篷里拿出女儿Sela的巨幅肖像。这是地震前一个月，一家人专程为女儿拍摄的影棚写真。震后，妻子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中，冒险取回了这张巨幅肖像，放在了帐篷中央最显眼的位置。

地震后，Salahatin曾考虑搬到一个海边城市，但妻子更愿意留下，这里离她的祖国叙利亚只有一山之隔。安塔基亚始建于公元前300年，曾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大城市之一，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包括叙利亚战争难民在这里聚居，形成了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如果你不想去，我也不想去。” Salahatin说，他们最终坚定地留在了城市废墟中央。

“没有人愿意离开。” Salahatin说，“如果国家说必须要走，我们就走，否则我们不会离开。” 他开始试图在灾民营地找回曾经的生活，和失去了所有亲人的老邻居一起晒太阳，晚上共同烤火，“我不觉得无聊。如果我想喝茶，我就喝茶；如果我想抽烟，我没有烟，但我会向警察和士兵要到一根，我就抽”。



Veysel的儿子在地震中不幸去世，他在等待儿子遗体的挖掘过程中，帮朋友从危房里拿出一些物品。



Veysel的儿子下葬后，一家人坐在位于山上的老家空地上休息，后面的棚子是他们搭建的临时避难所。



Veysel来到家族墓地看望儿子。因为此次地震，这片家族墓地增加了七座新坟。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近2600万人受土叙地震影响的民众中，超过500万人被认为是特别脆弱的群体，其中包括近35万老年人和超过140万儿童，记者走访灾民营发现，震区的应急响应尚未考虑到脆弱群体所需的包容性和无障碍性，搬迁和安置方案亦未考虑到该群体可能存在的不便和困难；在哈塔伊省，已出现多起叙利亚难民被房东赶走以接纳本国灾民的案例，难民的灾后安置也成为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诺在一年内重建家园，但考虑到重建计划速度过快，难以保障房屋质量，对生活在城市广场的人来说，或许他们的帐篷生活才刚刚开始。



另一座城市政府援助的餐车里，工作人员为灾民和救灾人员准备晚饭。



灾民们排队领饭，一个孩子突然哭了起来，他的母亲拥抱着他给予安慰。


灾民营里，几个孩子聚在一起玩耍。



灾民营临时医疗点的一位护士。她的家就在附近，可地震发生以来她都在坚守岗位，一直没时间回家看看。



灾民营里最大的帐篷，一部分用作卫生室，另一部分打了许多地铺，供人们过夜。



安塔基亚靠近地中海岸，昼夜温差大，2月的晚上仍然寒冷，灾民们在营地四周生火取暖。

2月底，天气逐渐转暖，抵达安塔基亚的物资也逐渐丰富。Sela获得了崭新的彩色铅笔，Eslem甚至拿到了一只大熊猫毛绒玩具，Salahatin说除了香烟，现在他什么也不缺。在城市广场，Sela跳着蹦着，帽子上的粉色毛绒球左右摇晃，让人暂时忘却了地震的忧伤。因地震和战争，安塔基亚曾多次被摧毁和重建，或许正如这座城市的历史所揭示的，过去的2000余年里，“这座城市的历史是一段过渡和重生的历史。”田纳西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兼系主任Christine Shepardson说，“也许在世界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再次这样做。”

（本文Eslem、Yusuf为化名）

废墟上遇见受灾华人

摄影/撰稿 | 财新周刊 丁刚

2月19日下午，距离6日的强震已过去13天，安塔基亚老城区一个小巷内的挖掘机轰鸣依旧，空气中弥漫着粉尘和尸体的气味。一群鸽子落在裸露的钢筋上张望着，人们沉默地盯着挖掘机。房间内，时间仿佛定格在了13天前的强震时刻，客厅中的沙发地毯电视，卧室内的床单被褥，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阳台上的花草和晾着的衣服，都一铲一铲粉碎在废墟之中。



地震废墟里发现的林时珠一家人的中文识字本和两本相册。

“Qin！Qin！” 一名当地工人递给我一个满是褶皱和尘土的黄色笔记本，指着里面手写的汉字用土耳其语说。我知道在土耳其语发音里“Qin”的意思是中国，接过笔记本，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汉字很惊奇——这里怎么会有中国人呢？我仔细翻阅笔记本，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学习笔记，有关于如何剪辑，如何跟儿童做活动，如何做志愿者……

“我来自广西南宁，目前住在哈塔伊，2016年7月来的土耳其。” 这是笔记本中惟一一段可以确认主人身份的信息。我一开始猜，这个笔记本的主人可能是一位给中国救援队做翻译的志愿者落下的。可随后我又发现了一本孩子的中文识字本，两本相册，其中一本淡蓝色的相册记录着孩子的成长、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中母亲明显是华人长相，戴着眼镜的脸上洋溢着笑容，至此我才判断这里曾生活着一位中国女性。然而她是否平安？现在何处？我和同事决定找到她。

寻找的过程竟出奇顺利，我们联系了一个当地的华人群，很快就传来消息有人认识她，她叫林时珠，一切平安。不一会儿，一位她的邻居也证实了在震后见过她，说她没事。我们心里的石头落了下来。



变形的墙体牢牢挤压着门框，林时珠和丈夫几经尝试也未能进入家里。



林时珠的丈夫在楼梯间发现了自己的自行车，想方设法把它推了出去。

据林时珠后来介绍，地震那晚凌晨4点17分时，她还没有睡觉，正在用手机看着小说，突然间房屋颤动起来，她立刻叫醒了老公和孩子，一家三口披着一块毯子蜷缩在客厅的沙发角落里避难。地震停止后，她去卧室拿重要的物品，却发现整个卧室已经坍塌，丈夫想开门逃生，却发现门框已经变形打不开，最后是儿子发现墙边有一道裂缝，一家人钻了出来，从倾斜的四楼直接爬到了地面，虽然幸运地劫后余生，也变得一无所有。

随后，我把相册的照片发给林时珠，她发来语音说：“感觉好突然，有点幸福感，但又有点紧迫感，我有点失而复得的感觉。”那时，她和家人正在另一个叫梅尔辛（Mersin)的城市避难，距离安塔基亚有三个小时的车程。收到我们的消息后，她决定和老公Acip回来寻找一些重要的证件和物品。

晚7点，林时珠和老公开着面包车赶到时天已经黑了，挖掘已结束，无人的小巷内漆黑一片，贸然进去太危险，他们决定在车上睡一晚。我们把褶皱的相册和笔记本交到她手上时，她激动不已，说那是儿子两岁前惟一的记录了。

第二天一早，林时珠夫妇开始往家的方向走，以前熟悉的巷子变得如末日的景象一般，还有一群流浪狗在四处游荡。他们再次见到自己的房子：四层楼只剩三层，一楼的理发店和婚纱店完全没了；四层的客厅还在，墙上画着的竹子和熊猫还在，可卧室已完全垮掉。虽然卧室里的重要物品已经散落在了废墟中，夫妇俩还是决定冒险上楼，看能不能进入客厅，取回存着许多文件和资料的旧电脑。

我随他们进入了这栋震后的残屋，楼下邻居家的洗衣机里还有未来得及晾晒的衣服，没了玻璃的窗帘在随风摇曳，错乱的裂纹，斜歪的地面，让人产生了强烈的眩晕感，变形的墙体牢牢挤压着门框，我们几经尝试也未能进入，只把楼梯间一辆自行车推了出去。



林时珠夫妇在废墟里找到的十字绣枕套，上面写着“我爱你，是唯一不变的承诺”。



林时珠的丈夫在废墟里找到了几张破碎的现金，他觉得那可能是他的钱。地震当晚，他去银行取出来许多现金，准备去兑换外币应对通货膨胀。

林时珠和丈夫有些不甘心，又在废墟里翻找了很久。悻悻而归前，我在路口为他们拍了张照片，画面里他们推着自行车，手里拿着废墟中捡到的一包孩子小时候的衣服，两本残缺的相册，一个孩子爷爷的小包，一个写着“我爱你，是唯一不变的承诺”的十字绣枕套——这些可能是他们能抢救出来的仅存家当了。

别过当晚，安塔基亚再次发生了6.4级余震，为防止余震和危楼坍塌造成危险，他们家那一片已经禁止人员进入，或许，这成了他们最后一次回家。现在，夫妻俩仍借住在亲戚家，正在重新寻找工作，也因此陷入焦虑。林时珠说，不管是“内卷”还是摆烂，所有的前提都得活着，有命在，才有后续的焦虑。

寻找林时珠

图片编辑 | 董德

开篇图说：2023年2月20日傍晚，土耳其安塔基亚老城区漆黑一片，只有城市广场的灾民营亮着灯。

逝者｜基因工程奠基人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13日第10期

保罗·伯格（1926—2023）生物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



罗·伯格（1926—2023）生物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

文丨财新周刊 徐路易

2023年2月15日，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伯格（Paul Berg）逝世，享年96岁。伯格创造的重组DNA（rDNA）深刻影响着现代医学发展，奠定了基因工程的基础，也让人类从此打开了关于DNA的"潘多拉魔盒"。他的后半生经常为基因工程的伦理问题而奔走。

俄罗斯犹太裔的伯格1926年生于纽约。他的父母都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移民到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为伯格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成长环境，让他有很大的自由度去探索。伯格积极参加当地的足球俱乐部，并结识了许多亲密的朋友。

两本书最初激发了伯格对科学的兴趣：一本是美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讲述医学科学家故事的小说《阿罗史密斯》，另一本是微生物学家保罗·克鲁伊夫介绍十多位杰出微生物学家的传记《微生物猎人》。伯格高中时，管理实验室的老师苏菲·沃尔夫总在课后科学俱乐部鼓励学生自主进行实验，这进一步培养了伯格对科学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16岁高中毕业后，伯格一度陷入迷茫。彼时正值"二战"，他本来在纽约城市学院学习化学工程专业，但后来决定应征入伍去当海军飞行员。在参加飞行训练、等待征召期间，他又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习生物化学。一年后，他中断学业，到一艘潜艇上服役，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护送船队。1946年，他回到学校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后进入西储大学（现凯斯西储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读博期间，他证明了动物如何利用维生素B-12和叶酸合成蛋氨酸，此前人们认为蛋氨酸只能通过饮食获得。

完成学业后，伯格全身心投入生物化学领域，先后在哥本哈根细胞生理学研究所、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从事科研，1959年起进入斯坦福大学工作。早期他解决了代谢化学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而发现了DNA和RNA指导生物系统中蛋白质合成的机制。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限制性内切酶的发现使科学家们首次完成了对基因的切割。1972年，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里，伯格用这项技术打开了猴空泡病毒40的环状DNA，将包含有大肠杆菌半乳糖操纵子和λ噬菌体的DNA片段插入，并通过填补重新形成了一个新的环状DNA分子。他随即发表了一篇论文，表明利用限制性内切酶这把上帝遗落在人间的"DNA剪刀"，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对DNA的重组，也从此打开了其在植物改良、动物育种、疾病诊断、蛋白疫苗生产、小分子药物开发等领域的应用。

伯格终其一生没有为这项技术申请专利，科学家们得以自由用这项技术开展更多创新。伯格认为，科学研究的自由不应受到政府的议程限制，他曾联署公开信指责布什政府错误的科学政策。同时，他也强调"科学家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重组DNA的发现公之于世后，不少科学家对这种做法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也有许多科学家担心是否会有人制造出新的致命病毒，或造成一些环境及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基因灾难"。伯格也对自己的发现可能导致的潜在问题感到担忧，他积极组织相关讨论，被后辈们认为是质疑基因工程伦理意义的榜样。

1973年夏天的戈登会议上，伯格等140名科学家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对重组DNA研究进行风险评估和调查。197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呼吁全美科学家先暂停重组DNA技术的研究；同年，伯格与10位同事签署了一封信，呼吁国际科学界共同解决重组DNA新技术中的伦理问题。1975年，伯格在重组DNA会议上再度聚集专业人士，共同讨论该技术的潜在危害，并制定了规范其使用的准则。1976年夏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正式发布准则，重组DNA研究才再次开启。

曾有人质疑伯格如此保守是想阻碍科学的进步，但与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这出自他个人的责任感。伯格的学生、研究员罗伯特·马戈尔斯基评价他——“才智超群、洞察力敏锐、道德标准极高”。

1980年，伯格与沃尔特·吉尔伯特、弗雷德里克·桑格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们“对核酸生物化学的基本研究，特别是对重组DNA的研究”。同年，伯格还获得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1983年，伯格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2018年，伯格受邀为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发表致辞。他称医者所遇到的机遇和挑战都十分独特，总要在第一线面对疾病与生死，同时也总能第一个做出对人类健康有深远影响的发现。他笑言，从医“不适合胆小的人，因为它需要调动你的每一分耐心、理解和同情心”。同时，伯格也没有忘记强伦理与行业调查的必要性，他告诫毕业生“对公认的确定性持怀疑态度，最重要的信仰就是坚守事实”。

版面编辑：刘潇